

第六部

鄧小平
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
1976–1998

毛澤東時代的遺產

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贏得全國政權後曾許諾要進行兩場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及跟隨其後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統治者在短短的時間裏，完成了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遺留（實際上尚未開始）的資產階級革命。1950年代初，共產黨人迅速將腐朽的、四分五裂的舊中華帝國改造成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億萬中國人有了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社會責任感。隨著1952年的土地改革運動的結束，長期停滯的土地革命劃上了句號，最終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消滅了腐朽的地主階級，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從傳統形式的經濟剝削和社會壓迫中獲得了解放。共產黨實現了國家領土的統一，建立了強大的中央政府和統一的國內市場，廢除了農村前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為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前提條件。遼闊國土上蘊藏的巨大人力和物質資源，現在可以用來實現落後的、停滯不前的經濟發展，向現代工業經濟的轉變。

國民黨的創建人、有「國父」之稱的孫中山先生在二十世紀初曾提出他的奮鬥綱領：國家統一，民族獨立，「耕者有其田」，發展現代工業。人民共和國初期取得的成就，正是孫中山為之奮鬥的目標。共產黨完成了孫中山未竟的事業，他們可以當之無愧地宣佈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這位最傑出人物的合法繼承人。1950年代初，毛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正如毛在1949年自豪地宣佈的，長期（直到不久前）置身於最悲慘、最貧窮的國家之列的中國，確實在上世界上「站立」起來了。今天，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強大的和迅速現代化的國家屹立於世界。

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階段，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革命的傳統模式。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在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目標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下進行的，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在中國大陸的成員，既不是這場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是受益人。此外，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典型特徵，是創造有利於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而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並非如此。城市的「國家資本主義」和農村的個體農民所有制，無論在規模和存在的時間上都受到限制，這些限制是由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目的是廢除私有財產——統治的國家強加的。在北京的共產黨領導人認為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的歷史任務已經基本完成（現在看來為時過早）後，他們毫不遲疑地開始了第二場革命。1953年，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剛剛四年之際，便開始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但這是在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物質匱乏和貧窮的條件下開始的過渡。在毛時代其後的二十多年裏，在「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他們同步進行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的建設。

許多研究者認為，毛時代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是追求工業現代化的手段與社會主義目標的統一。毫無疑問，這是毛的目標，也是毛主義的主張。但是到最後，毛澤東在經濟現代化上的成就遠遠勝過他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成就。當然，這種看法與現在流行的觀點是不一致的，流行的觀點是，毛為了「意識形態的純潔」而犧牲了「現代化」發展，毛晚年為了無謂地追求社會主義精神烏托邦，忽視了發展經濟。然而，這種觀點不符合歷史事實，歷史記載表明，毛時代是一個迅速工業化的時代。在毛後時代對毛時代的經濟發展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其經濟發展中的缺陷，而不是肯定其成就。批評家們承認，在毛時代，工業總產值增加了38倍，重工業增加了90倍。儘管中國的工業基礎原來就十分薄弱，由於外敵入侵和內戰的破壞，工業產量在共和國成立時不及常年的一半。但是，從1952年（工業產量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國工業產量以年平均11.3%的速度遞增，在現代世界歷史上，與任何國家在類似的發展階段上相比，中國的發展速度都是驚人的。¹ 在毛時代，工業產值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農業產值的比重從58%下降到34%，² 正如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亞經濟學家所說：

工業份額在國民收入中如此迅速增長（幾乎是30%）的現象在歷史上是罕見的。在工業化進程的最初40至50年中，英國的工業產值的比重僅僅上升了11%（1801—1841）；日本是22%（1878/82—1923/27）。在戰後新興的工業化國家中，也許只有台灣在這方面的發展速度才可與中國大陸相媲美。³

中國從一個基本的農業國轉變為一個相對的工業化國家，反映在與現代化相關的產品的生產大幅度增長上——至少是在「信息社會」前。從1952年到1976年，鋼產量從130萬噸增加到2300萬噸；煤產量從6600萬噸增加到4.48億噸；發電量從70億千瓦/小時增加到1330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幾乎是零到2800萬噸；化肥產量從20萬噸增加到28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加到4900萬噸。⁴到1970年代中期，中國能夠生產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和遠洋輪船，中國還能夠製造原子彈和洲際導彈，在成功地進行了首次核試驗六年後，中國於1970年發射了人造衛星。

工業化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毛時代，雖然仍有佔人口的75%、約四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但工業勞動力從1952年的300萬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5000萬，這一數字包括在農村小工業化政策指導下，成為社辦或隊辦工廠工人的2800萬農民。此外，在與工業關係密切的交通與建築領域中，有2000萬工人。⁵中國還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技術知識分子隊伍，中國的科技人員從1949年的區區5萬人（1952年為42.5萬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萬人，1979年達到500萬人，其中99%是1949年後培養起來的。⁶毛時代還興建了巨大的灌溉和水利工程，這些工程對1980年代初期農業生產的發展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 * *

毛的工業化建設也出現了許多嚴重失誤，在工業化進程中確實存在著毛的繼承人批評的「不合理」和「失調」的現象。像大躍進這樣的嚴重失誤，殃及全國，造成重大物質和人員損失。在共和國歷史上，毛時代一些失誤（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至少是在實踐中）還導致中國經

濟出現周期性的波動，毛採取的糾正措施和思想工作對此也無能為力。最嚴重的失誤莫過於農村生產增長緩慢，這對毛一貫強調要重視農業的思想是個諷刺。從1952年到毛時代結束，中國的工業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長，但農業產量年平均增長速度只有2.3%，⁷勉強跟上人口年均增長2%的速度——在毛時代的25年時間裏，中國人口增加了一倍。

中國工業部門本身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毛的政策雖然有助於減輕斯大林式工業化造成的不平等現象，但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在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來的蘇聯模式的工業結構。因此，在毛時代結束時，中國工業面臨著與蘇聯及東歐國家的工業類似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是導致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的部分原因。浪費、低效、人浮於事、官僚機構膨脹、生產率低下以及腐敗等現象成為中國工業領域的頑疾。為了增加重工業投資，不惜以犧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代價擴大積累的比例。長期不重視貿易、服務業和消費品工業的發展。勞動階級缺乏生產積極性。雖然在毛政權的最後十年（除了多災多難的1976年），工業產量以年均10%的速度遞增，但這種增長速度卻是以忽視產品質量為代價，依靠國家不斷加大對現代工業經濟的投資維持的。積累率（即限制消費而用於擴大再生產的投資比例）從1960年代初期的23%增加到1970年代初期的33%，1978年竟然達到了36.7%的高峰值。⁸在毛時代，國家資金主要用於支持重工業的發展，用於發展農業的投資只有12%，用於消費品工業發展的資金僅僅有5%。⁹這些政策雖然有助於保持非常高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但抑制了消費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技術落後也加劇了工業中存在的問題。自力更生的政策限制（但不是完全阻止）了接受國外的先進技術，文化大革命又使高等教育和基礎研究受到損害，打擊了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因此，在毛政權的最後年代，1950年代建立，技術已經過了時的工廠得不到及時更新改良，科學家和技術力量嚴重不足。

然而，儘管有這些失誤和挫折，歷史的必然結論是，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代。1950年代初期，中國從較比利時還要弱小的工業基礎起步，到毛時代結束時，長期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

已經躋身於世界前六大工業國家之列。從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了五倍，從600億元增加到3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工業產值增長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計算為基礎，國民收入的指數（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從1949年的100（1952年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達到440。¹⁰在毛時代的最後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的繼承者對這一時期評價最低），即使把大躍進造成的損失也考慮在內，在這個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裏，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63%，總量翻了一番多。¹¹

無論毛時代的經濟發展還存在那些不足，它仍然是一個為現代工業化奠定了基礎的時代。事實上，與德國、日本和俄國——這三個國家是後起工業大國中成功的範例——早期工業化的進程相比較，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更快。從1880年到1914年，德國經濟的增長率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43%。¹²蘇聯在1928年到1958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54%。而中國從1952年到1972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64%。¹³這種經濟發展速度，當然不是像西方記者錯誤地告訴讀者的是什麼「蝸牛速度」。¹⁴

考慮到中國的經濟成就幾乎是在毫無外來援助和支持的條件下、在極其弱小的工業基礎上通過中國人民的自力更生實現的，這樣的成就確實令人刮目相看。除了蘇聯在1950年代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中國在1960年代中期就還清了這筆費用，包括利息在內）外，毛的工業化是在完全沒有外國貸款和投資的條件下進行的。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國還處於一個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陷於孤立狀態，奉行的是神聖的「自力更生」原則。在毛時代結束時，中國既無外債，國內又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獨一無二的。

儘管現在談論毛澤東時代的成就會受到非議，但是，歷史事實說明，毛的政權在使中國實現工業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下取得的。沒有毛時代的工業革命，後毛時代舉世矚目的經濟改革就無從進行。

對中國人民來說，毛的工業革命要求他們進行艱苦的勞動和自我犧牲，正如日本和俄國工業化早期的情況。由於國家把大部分剩餘產品都用於擴大現代工業部門的發展，人民的消費和生活水平很低。簡

單地說，國家通過剝奪它統治的人民、特別是農民，建立重工業基地，支撐日益龐大的統治官僚機構。但是，情況決非像某些市場經濟的熱心擁護者所說的，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在毛的工業化年代沒有任何改善。誠然，中國的國民收入迅速增長，但為此付出艱辛勞動的人民群眾的收入沒有獲得相應增長。由於沒有及時實行有效的計劃生育政策，新增國民收入的一部分被用於迅速增長的人口，但大部分社會剩餘產品流入國庫（從這裏轉向現代工業部門和官僚機構），在毛政權的後20年時間，只有很少部分用於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收入。在毛時代後期，國家職工、包括全民所有制工廠的工人的收入有明顯增長，1957年後，佔勞動人口總數75%的農民的收入基本上沒有什麼增長。¹⁵ 但是，一些對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至關重要的成就，很難用經濟統計的數字體現。人們應該注意到，在毛時代，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學校數量大幅度增加，人民受教育的機會普遍增加。大規模的文化掃盲運動成就顯著。建立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相對普及的醫療衛生體系。在毛領導下的四分之一多世紀裏，中國的人均壽命增加了近一倍，從1949年前的35歲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65歲，這些成就，是共產主義革命給中國絕大多數人民帶來的物質和社會利益的最有力的證據。

偉大的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H. Carr）在結束他宏偉的多卷本蘇聯歷史著作時曾警告說：「危險並不在於我們要去掩蓋革命歷史中的巨大污點，去掩蓋革命帶給人類的痛苦代價，去掩蓋在革命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危險在於我們企圖完全忘卻並在沉默中無視革命的巨大成就。」¹⁶

卡爾的話值得研究當代中國歷史以及蘇聯歷史的學者深思，因為革命本身很難有助於自己獲得公允的評價。最典型的是，巨大的社會動盪喚起了巨大的難以實現的期望，當希望破滅後，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長時間的幻滅感和虛無主義情緒，而革命取得的實際歷史成就則被忽視或遺忘。只是在革命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成為遙遠的過去——通常需要幾代人的時間——之後，革命的歷史畫面才會真實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正是毛時代的污點、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深深地留在當代的政治意識和歷史意識之中，人們不能夠也不應

該忘記這些事件的巨大失誤及其帶給人的生命代價。但是，未來的歷史學家在看到這些污點和罪行的同時，無疑會把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毛澤東時代（無論他們對此作出的其它評價是什麼）作為世界歷史上最宏偉的現代化篇章，作為中國人民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和個人的利益的歷史階段。

* * *

比較毛澤東作為一個現代化奠基者的歷史地位來說，他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創始人的形象（或失色的形象）更加複雜。如果說毛主義為中國現代工業革命的奠定了基礎，那麼，它是否實現了對中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一個曾一度大力宣揚的、至今尚有許多人肯定的看法——特別那些在今天認為後毛時代的中國是放棄了「社會主義」才走向市場經濟的人。此外，曾備受推崇的毛主義的「向社會主義過渡」又產生了什麼樣的社會結果？

無論人們如何寬廣地定義「現代化進程」這一概念，都不應該簡單地把毛時代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變革理解為這一進程的翻版。現代化畢竟不是以廢除私有制為標誌的。在1949年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後，在短短幾年時間裏，就徹底廢除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公有制構成了中國社會的根本特徵。到1956年，城市經濟中殘留的私有成分實現了國有化，農村經濟實行了集體化。如果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以及「按勞分配」的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當時北京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這樣定義社會主義的，那麼，中國早在毛時代初期就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了。1956年，當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中國領導人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之際，中國的「社會主義」事實上與蘇聯沒差到那裏。

和蘇聯的情況一樣，中國在實行了國有化和集體化的同時，開始全力以赴地實行工業化，而工業化當然是現代化概念的本質。但是，完全在國家領導下進行的人民共和國的工業發展，最初只是被當做實現社會主義目的的手段，工業化本身不是目的。蘇聯和中國的共產黨政權都是把建設社會主義和實現工業化放在同步進行，放棄了（以不同

的方式) 社會主義必須以工業資本主義為前提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教條。但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毛的中國比蘇聯在許多方面更加積極。毛與列寧和斯大林不同，他不願意把社會主義的未來單純寄希望於非人的現代技術力量上。毛主義要求，經濟發展不能脫離對社會關係和人的思想進行根本變革的進程(實際上以此為前提)。毛告誡說，在建設馬克思所說的物質前提的過程中，必須創造社會主義的社會關係和共產主義的價值觀念。毛否定了生產力會自動地保證共產主義的實現這種簡單的蘇聯教條，他認為，在此時此地，就應該實踐現代經濟手段與社會主義目標的統一。毛主義的新理論是，新社會以新人為前提，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培養社會主義新人與建立社會主義技術基礎同樣重要。因此，毛認為，不能單純以經濟發展水平來衡量社會主義的發展，而要以是否縮小了「三大差別」來衡量，即是否朝著經典馬克思主義提出的縮小長期存在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工人與農民、城市與農村的差別的目標前進。

然而，毛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意圖(雖然在許多方面引人注目)，最終為毛的現代化目標與他的社會主義雄心之間的內在矛盾所吞噬。馬克思主張，社會主義只有建立在資本主義提供的物質和社會基礎上才能取得成功，毛的實踐為支持這一理論提供了新的歷史證據。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工業化有自己內在的規則，它產生了與社會主義理想不相容的新形式的社會不平等。隨著工業化的發展，還出現了官僚和技術精英集團。在「原始積累」的過程中，為了工業化城市的利益而剝奪農村。經濟理性和官僚專業化的工業價值觀念支配社會的準則，而工業化為之服務的社會主義目標反被降到了次要的地位。與蘇聯的情況相比，毛主義的政策緩和了社會不平等現象，但不可能阻止這種趨勢的發展。工業化要求不斷增加勞動的專業化分工，但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別的國家，專業化分工只會擴大而不會縮小「三大差別」，它不會因為毛主義的理論主張或意圖而改變。¹⁷ 縮小城鄉差別是毛主義最重要的目標之一，但在毛時代，無論是從相對量還是絕對量來看，中國城鄉實際的經濟差別越來越大。從1952年到1975年，農村人口的人均消費水平從62元增加到124元人民幣(按照現在的價格)，而非農業人口的人均消費水平從148元增加到324元人民幣。¹⁸

毛的社會主義事業中存在著一個更為嚴峻的問題，即共產黨國家與中國社會之間的矛盾。1949年革命勝利後的一個明顯結果，建立了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和一個日益龐大的官僚體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說（雖然與斯大林主義的邏輯一致），中國越來越「社會主義」，國家卻越來越居於統治地位。由於沒收了有產階級的財產，實現了工業的國有化和農業的集體化，國家不僅成為社會的政治主人，而且成為它唯一的經濟主人。雖然毛主席的理論家推崇群眾的自發性和創造性，但毛主席的國家機器卻日益脫離它所統治的社會，國家的官僚機器日益膨脹，越來越異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分裂越來越明顯，社會匍匐在國家腳下。面對政治權力任意支配社會權力的弊端，除了讓人民對號稱是人民意志化身的領袖人物頂禮膜拜外，毛主席並無良策。對毛的個人崇拜，是歷史上社會權力異化為政治權力崇拜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到頭來，所有屹立著的毛雕像都成為巨大政治失敗的奇異象徵。

毛時代雖然為社會主義創造了一定的社會經濟前提，但它決不是一個為社會主義創造了根本政治前提的時代。社會主義不僅僅意味著消滅私有制和建立國有化的工業。社會主義意味著——如果它有真正的含義——這樣一種制度：政治權力由全體勞動群眾行使；允許生產者自己控制勞動條件和勞動產品。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徵不是國家所有制，而是馬克思說的「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所有制」。毛時代常常求助於「無產階級專政」來論證政治專制的合法性，但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無產階級專政是這樣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裏，被國家篡奪了的社會權力全部歸還給社會，國家轉變為馬克思稱之為「生產者的自治政府」。在毛的中國，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沒有這些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基本概念。毛主席是一種在面臨（儘管它沒有解決）協調現代經濟發展手段與社會主義目標的矛盾中產生的理論，但毛主席始終未能認識到，普遍的民主既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手段，又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之一。

在毛時代，曾經有兩個重要的時期，明確地提出並試圖解決共產黨國家與中國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在雙百運動中，毛本人主動提出了「領導」與「被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問題，而運動本身就要求實行政治

民主和思想自由。但在隨後的反右鬥爭中，這些要求受到壓制。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依然沒有解決。文化大革命對黨和國家官僚是一次全面的衝擊，最初曾允諾要按照馬克思巴黎公社的原則對政治權力進行民主改造，但這一期望很快就化為泡影，文化大革命以列寧主義政黨的全面恢復統治而告終。毛澤東發動了雙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所以他要對未能實踐允諾，未能將國家從社會的主人變為社會的僕人負上主要責任——還要對這兩場失敗的運動所造成的人類痛苦負責。

從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許多年中，毛主義者把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反面教員」，但是他們卻未能從蘇聯的歷史經驗中汲取最顯而易見的教訓：沒有自由和普遍的民主，就不可能「向社會主義過渡」，不可能永遠把落後的經濟條件和敵意的國際環境作為不實現這些權利的藉口。在可預見的未來歷史，「國家自行消亡」的馬克思舊夢不過是烏托邦希望，但是，中國人民享受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這樣一些基本的民主自由的要求，決不是烏托邦式的要求。沒有回應這類並不過分的素求，無論怎樣高喊「社會主義民主」一類的口號，都不過是為了使國家能繼續操控社會而提出的空洞借口。在毛時代，卻沒有給人民民主自由的訴求得到一絲的曙光。

* * *

因此，毛澤東留給他的繼承人的是一份複雜而矛盾的遺產，它的標誌是毛政權取得了進步的社會經濟成就與其倒退的政治特徵之間的深刻矛盾。一方面，如鄧小平所說，毛「締造了國家」，在人民共和國創建初期，完成了國民黨失敗的資產階級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為建設社會主義創造了部分前提條件，開始了中國的工業化革命，廢除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創造了雖不充分但卻是必要的條件，保持著對社會主義未來的信念（在革命勝利後，這種信念持續的時間比一般預期的要長得多）。另一方面，毛主義又保留了斯大林官僚政治統治的基本方式，製造了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和新的正統觀念與教條，鎮壓所有思想和政治上的不同政見者。誠然，毛澤東把共產黨官僚政治

看作是巨大的弊端，但他能夠採取來遏制自己創造出來的官僚體制，唯一措施，是依靠自己的個人聲望和個人力量。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毛的遺產都沒有包括反對官僚統治的體制保證。

所以，在毛時代終結時，中國處在一個由官僚支配社會的歷史迷霧王國裏，它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由於缺乏一個更好的詞來形容，故且稱中國為「後資本主義」或簡單地稱為「後革命社會」。毛的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因為它已經廢除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前提，即廢除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它也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因為勞動群眾，即工農大眾，沒有權力支配產品和他們的生產條件，也沒有支配國家的手段，國家作為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管理者，日益凌駕於勞動群眾之上。毛政權成功地完成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但它沒有能夠實現它宣稱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在毛時代結束之際，中國彷彿

徘徊在兩個世界之間，
一個已經死亡，
另一個又無力誕生。¹⁹

如果毛澤東和毛主義的生存時間能夠再長一些，那麼，不是沒有可能打破這種困境，社會主義也不是沒有可能興旺發達。然而，在毛去世以前，毛主義就已經耗盡了它曾有過的巨大創造力。毛主義發展現代工業的方式是剝削農村，如果不使農民貧困化，這種方式就難以為繼，而農民曾是共產黨力量的主要源泉。毛發動的最後一場群眾運動是文化大革命，運動沒有實現其聲稱的目標，留下的只是潰散後對政治冷漠的人民，冷漠之後是虛無，一個厭倦了的民族冷眼旁觀1970年代發生在上層的拜占庭式的政治鬥爭和宮廷陰謀，這些鬥爭和陰謀沾污了毛時代政治歷史的最後篇章。面對這些普遍的政治不滿和可能發生的經濟危機，毛主義已無力再提供有效的補救措施。一個逐漸玩世不恭、對政治冷漠的民族，已很難再為陳舊的革命口號和思想說教所打動。在毛時代的最後歲月，中國需要一條新的道路，但是，日益衰老的毛澤東和教條化了的毛主義，已經沒有能力為革命的振興提供所需要的理論和動力了。

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毛主席為自身的滅亡播下了種子。被奉為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形成於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裏的最落後的農村地區，正是在毛主席的旗幟下，農民組織起來進行了一場最偉大的革命。在取得政治成功後，勝利的革命者在他們統治的這片廣闊土地上，開始了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建設。作為現代化者，他們取得了許多令世人矚目的成就，特別是考慮到他們所面臨的任務是如此艱辛和巨大。他們創造了一個現代的國家，建立了一套現代教育體制，開始了中國發展現代工業和現代科學技術的進程。

但是，毛主席的政治手段和意識形態，依然是它所形成的那種落後環境的許多特徵的反映。歲月流逝，越來越多的新一代中國人遠離那曾經孕育了革命和老一代領導人思維方式的原始農村環境。毛主席的手段和思維方式越來越不適合現代化中的中國的時代需要。毛主席的許多方面，依然留有它極力要克服的落後胎記。毛的政權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是成功的，但它與現代化中的中國環境越來越不協調。因此，在人民共和國創始人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中，毛的繼承人早晚將不可避免地拋棄最典型的「毛主席」的許多內容。

註釋

1. 馬洪、孫尚清主編，《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第1卷（北京，1981年），頁25-26。拉迪，《中國現代經濟中的農業》，頁3。
2. 郭益耀 (Y.Y. Kueh)，〈毛的遺產與中國新工業戰略〉（“The Maoist Legacy and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中國季刊》1989年9月第119期，頁421；拉迪，〈中國現代經濟中的農業〉，頁1。其他統計方式表明，工業產值在國民總產值中的比例從30%上升到72%，參見馬洪、孫尚清主編：《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第1卷，頁25-26。
3. 郭益耀，《毛的遺產與中國新工業戰略》，頁421。
4. 資料源引自美國中央情報局：《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手冊》；美國商業部，《中國經濟與外貿展望》（*The Chinese Economy and Foreign Trade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C., 1977）；國會經濟聯席委員會，《中國：經濟評估》（*China: Reassessment of the Economy*, Washington, D.C., 1975），賽爾登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獻材料》（*The People's Republic of*

-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The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表13、14, 頁135-136。
5. K.C. 葉 (K.C. Yeh), 〈中國經濟在調整時期的宏觀變化〉 (“Macroeconomic Change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During the Readjustment”), 《中國季刊》1984年12月, 第100期, 表2, 頁716。
 6. 童大林 (Tong Dalin)、胡平 (Hu Ping), 〈科學技術〉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於光遠 (Yu Guangyuan) 主編, 《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84), 頁644。
 7. 拉迪, 《中國現代經濟中的農業》, 頁3。
 8. 董輔弼 (Dong Fureng): 《論中國發展中的積累與消費關係》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Accumulation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s Development”), 提交於1980年11月21-24日在威斯康星召開的「美中經濟戰略選擇」學術年會論文, 頁26。轉引自瑞斯金 (Carl Riskin), 《中國的政治經濟: 1949年後發展的探討》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頁271。
 9. 拉迪, 《中國現代經濟中的農業》, 表3-7, 頁130。
 10. 前揭書, 表1.1, 頁2。
 11. 前揭書。
 12. 顧志耐 (Simon Kuznets), 《各國經濟增長: 總產值與生產結構》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表4, 頁38-39。
 13. 羅茲曼 (Gilbert Rozman), 《中國的現代化》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 表10.2, 頁350。
 14. 這一詞常被用來形容毛時代的經濟史, 例如伯恩斯 (John Burns) 在1985年3月31日《紐約時報》E版的文章。
 15. 已有的關於集體分配收入的資料表明, 在毛時代最後20年人均收入明顯增長。但是考慮到其他事實, 特別是1966年後對自留地和自由市場的種種限制, 多數研究者同意拉迪的以下結論: 「從1956、57年到1977年, 農村的實際人均收入增長十分緩慢。」有關判斷事實真偽的難度, 參見拉迪: 《中國現代經濟中的農業》, 頁160-163。
 16. 引自塔裏克·阿里 (Tariq Ali), 《斯大林主義的遺產: 對二十世紀世界政

治的影響》(*The Stalinist Legacy: Its Impact on Twentieth-Century World Politic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84), 頁9。

17. 有關毛對勞動分工的觀點，參見邁斯納，《馬克思、毛澤東和鄧小平論歷史上的勞動分工》(“Marx, Mao and Deng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History”)，載德力克與邁斯納主編，《馬克思與中國經驗》(*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89)，頁79–116。
18. 瑞斯金，《中國的政治經濟：1949年後發展的探討》，表10.8，頁241。
19. 亞諾德(Matthew Arnold)，〈甜釀之詩章〉(“Stanzas from the Grand Chartreuse”)，阿駱特(Kenneth Allott)編，《馬修·亞諾德詩集》(*The Poems of Matthew Arnold*,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s, 1965)，頁288。

鄧小平的復出 與對毛主席的批判

後毛時代是在毛主席的外衣下開始的。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在領導「一舉粉碎四人幫」後，¹立即就任了中國共產黨的新主席。據說這是毛澤東生前在病床上作的「安排」，這也是華國鋒繼任主席的唯一合法性根據。官方輿論反覆宣傳病危的毛給華的一個便條，上面筆跡潦草地寫著「你辦事，我放心」幾個字。在短暫的任期內，華國鋒在政治風格和個人外表方面，都極力模仿他的前任。華的畫像與已故主席的畫像並列地懸掛在所有的公共場所中。新領導人耗鉅資在天安門廣場建了毛的紀念堂，毛的防腐遺體被放置在水晶棺內，永久安放在紀念堂中，使「廣大人民群眾能夠瞻仰毛主席的遺容」。

為了表明毛經濟政策的連續性，華主持召開了一系列關於農業工作的會議——華正是在1955-1956年的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中」嶄露頭角的。農村工作會議是在「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下進行的，大寨大隊是毛樹立的一個平均主義和自力更生的典型。1977年初，華以及其他毛主席者匆忙地作出了一個保證：「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華的政治對手不久就給這一誓言的倡導者起了一個「凡是」派的稱呼。

但是，華國鋒是有選擇地遵循已故主席的「指示」的。在毛主席精緻的政治外表下，華緩慢而又謹慎地開始放棄毛時代晚期的政策，逐漸返回到1950年代的毛主席。首先改變的是文化教育政策，這是如今身陷囹圄的四人幫影響最大的領域。在恢復了毛的「百花齊放」政策後，新政權放棄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蒙昧主義政策，被禁演的戲劇、

歌劇和電影重新出現在舞台和銀幕上，1966年後停刊的文學和學術期刊重新出版，越來越多的新雜誌問世。文化解凍最引人注目的結果是出現了一大批年輕作家寫的短篇小說，描寫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經歷，因此被稱為「傷痕文學」。借助於毛曾提倡的「洋為中用」的口號，政府開始促進與國外的文化交流，出版了一批新譯的西方文學名著，逐漸消除了在過去十多年窒息著藝術生活的對外國「資產階級」毒害的偏見和恐懼。文化大革命中和之前被關押和被送到偏遠農村勞改的知識分子或保持沉默的知識分子，在1977-1978年悄然恢復了名譽，重新返回城市工作崗位。

除了文化解放外，政府還採取了新的教育政策，更確切地說，恢復了舊的教育政策。華在講話中雖然還繼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但他開始取消動亂中實行的平均主義的教育改革，逐漸全面恢復了1950年代的精英教育體制。政府特別重視大專院校和高等研究機構的恢復和發展，其規模和水平很快便達到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新的文化和教育政策旨在贏得知識分子對華政權和「四個現代化」的支持，在新制定的黨章和憲法中，都莊嚴地寫上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但是，由於華國鋒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還披著毛主義的外衣，因此，他在政治上缺乏支持者。不過，他的政策確實使城市知識分子恢復了元氣，其中大多數人懷有反毛主義的情緒，這種情緒不久便釋放了出來。

華政府努力緩和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1977年10月1日，在建國28週年之際，國營企業工人的工資增加了10%，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實行更加嚴格的「科學管理」和勞動紀律的補償。在理論上，毛的大寨還是學習的榜樣，但在實踐中，國家新的農業政策允許農民擴大家庭自留地，生產農副產品，鼓勵農村集市貿易。

華國鋒試圖以一個經濟現代化者留名於人民共和國歷史。華的經濟政策點綴著大量的毛主義詞藻，他特別重視毛在大躍進前的著作中提出的經濟建設思想。周恩來的形象得到大力宣傳，以使現代化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但是華的經濟綱領主要依據於鄧小平在1975年為國務院起草的政策文件，當然，鄧的作用在當時是得不到承認的。1977年，鄧小平在兩年前就提出的建議得到實施，華政府大規模從先進的

資本主義國家引進現代技術，以出口煤炭和石油創匯支付費用。迅速發展科學技術、培養科技人才的工作得到高度重視，為此，全面恢復了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等教育體制。政府還制定了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發展綱要。工廠中實施的嚴格勞動紀律與給工人更多的物質獎勵的結合，使勞動生產率和工業生產迅速提高。

1950年代的經濟計劃者（在毛時代後期他們一直默默無聞）的復出，也反映了當時的發展趨勢。其中在政治上最著名的是陳雲，他是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的制定者之一，提倡用市場機制作為國家計劃的補充。

華國鋒在他的十年規劃（1976–1985）中——但只到1978年2月才公佈，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設想。這個規劃在大體上是國務院在1975年（在鄧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文件的修訂版，與第一個五年計劃相似，其重點是強調大力發展重工業。規劃提出，到1985年，要建成120個左右的大型工業項目，其中包括龐大的鋼鐵聯合企業、油氣田、煤礦、發電廠、鐵路和港口。²到2000年，華預言，中國的工業將接近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的水平。但是華沒有解釋如何籌措新工業化所需的龐大的資金，他也沒有提出如何解決毛時代留下來的比例失調及其他經濟問題。華的現代化規劃因為在財政上不可行而很快就被放棄了。

十年規劃的失誤是導致華在政治上倒台的因素之一，另一個因素是受到人民擁護的鄧小平的權力日益增長。鄧小平在政治上第三次上台（第二次復出）後，決心將後毛澤東的時代變為後毛主義的時代。

鄧小平的勝利

鄧小平是著名的五四運動產生的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最後一位重要成員。³早在1920年代初期，他就是黨的積極分子，他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作出的重要貢獻以及他作為毛派的成員，使他在新中國成立後身居要職。1956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和劉少奇一起，分別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和政治報告（1949後的這次代表大會的精神和理論，在鄧小平時代又發揚光大），同年，他又

被任命為黨的總書記，直接控制著黨的組織機構，進一步加強了他與黨和軍隊領導人戰爭年代形成的密切關係。但在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成了「中國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下放到遠離北京的江西省一個拖拉機廠勞動。1973年，在周恩來的保護下，經毛澤東同意，鄧小平回到北京，恢復了領導職務——沒有按通常的慣例，要求他對過去政治錯誤作出坦白交待。不久，他就成了病危的周恩來總理的當然接班人——但在周恩來去世後幾個月，就被作為「不肯改悔的走資派」、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的煽動者再次打倒。⁴在毛政權最後陰霾的幾個月裏，由於四人幫的迫害，鄧小平到了南方，受到在軍隊的故交的保護。鄧小平有著堅強的政治意志，據說，為了重返北京，72歲的鄧小平曾考慮如果必要的話，不惜訴諸內戰。⁵但是，1976年9月毛澤東的逝世和10月「粉碎四人幫」，為鄧小平的第二次政治復出鋪平了道路。

鄧小平回到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層，不久便獨攬大權，成為中國事實上的「最高領袖」，已經沒有必要維持與四人幫鬥爭時形成的政治聯盟，這一不穩定的聯盟是由華國鋒領導的。華領導了1976年10月的政變，成為中國共產黨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正式成為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的接班人。導致鄧小平權力上升和華國鋒逐漸失勢的進程持續了兩年，鄧小平熟練而無情地操縱著這一進程，沒有引起他不願意看到但有可能發生的「大規模動亂」的政治和社會鬥爭。

鄧小平的成功不僅有賴於他的個性和高超的政治技巧，他得到了大多數高層領導人的擁護，其中許多人是他的多年故交，同樣重要的是，他得到了軍隊將領的廣泛支持，這得益於他在革命戰爭年代與紅軍建立起來的密切連繫。鄧小平堅決主張共產黨要堅持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強調提拔幹部要「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上」，不能坐「直升飛機」。鄧的觀點迎合了黨和軍隊老幹部的思想及其既得利益。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和後果之後，恢復官僚秩序和社會穩定對黨政軍各界領導人有著特殊的吸引力，他們越來越把鄧小平視為當然的領袖。

除了老幹部和軍隊將領等高層官僚的支持外，鄧還得到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擁護。自從黨的八大以來，鄧一直是知識分子社會利益的維護者。⁶在1975年起草的國務院文件中，鄧特別強調知識分子在實現

四個現代化中的特殊重要作用，提出要給知識分子更高的待遇和更大的專業自主權。因此，許多知識分子認為鄧是受人尊敬的周恩來的合法繼承人。

鄧小平的政治抱負是建立在強有力的廣泛的社會和政治支持的基礎上。但是，鄧的政治聯盟的動力來自文化大革命——來自幸存的受害者要求伸張正義和復仇的強烈情感。鄧本人就是動亂的受害者之一，而且兩次受害，這使他贏得成百上千萬過去十年的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羞辱和被「打倒」的黨員幹部、沉默和受到迫害的知識分子、被毛變幻的政治路線出賣的「迷失的一代」的往昔的紅衛兵、數百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以及更多的遭受不同形式的肉體和精神迫害的普通群眾，所有這些人都寄望於鄧能夠「撥亂反正」。

* * *

華國鋒與鄧小平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鄧擁有巨大的政治資本，而華則背負著沉重的政治包袱；鄧得到了中國最有權勢的軍隊和黨政官僚機構領導人的支持，而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躍居上高位，支持他的只是官僚機構的下層官員——這些人是動亂的受益者，多數是由基層幹部組成的烏合之眾；鄧要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因而贏得人們普遍的支持，至少是在城市裏如是；而華既沒有在官僚機構中的真正權力基礎，又缺乏社會的普遍支持。實際上，華在毛去世後，恰恰是因為缺乏權力和聲望，方成為能被不同利益集團的官僚派別接受的領導人，並在華的統領下，粉碎了可能對官僚集團利益構成威脅的四人幫。他雖然接替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位置，但他既不是革命家也不是政治家，缺乏擔任這兩個職務的才幹。為了保住他幸運地得到的最高領導職務，他只能依靠維護毛的權威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在此時，毛的光環已經褪色，人們對文化大革命開始進行公開的批判。晚年毛澤東的遺產，是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根據，也是令他進退維谷的根源，在後毛時代，沒有這份遺產，他失去掌權的合法性，執著於這份遺產，他又不可能繼續掌權。

華國鋒本人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誤也加速了他在政治垮台。直到1976年12月底，他還不識時務地堅持開展最初由四人幫發動的批判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運動，而這場運動在當時已明顯地成為時代錯誤。在粉碎四人幫後，他開始清查所謂四人幫的「隱藏的追隨者」，因此，削弱了自己在黨政官僚機構中的基礎。華的「百花齊放」政策，幫助了在城市裏強大的反毛主義（親鄧）輿論的出現。因為不切實際而放棄的十年發展規劃，暴露了他的無能。他本人平庸的個性和政治上的優柔寡斷，與他最高領導人的地位毫不相稱。因此，他沒有能力抵抗黨內領導層和日益強大的公眾輿論讓鄧小平復出的要求。1977年夏季，鄧小平正式恢復了他在1976年4月第二次被打倒前擔任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不久，他又與華和國防部長葉劍英一起，成為中國三位最高領導人之一。

一旦躍居權力中心後，鄧小平就不再願意與華國鋒分享權力，這毫不令人奇怪。鄧不會忘記，正是在自己受到批判和打擊的文化大革命中，華被提拔到中央領導層。現在，鄧決心要捍衛自己的最高權力地位。在「安定團結」的表面文章下，鄧式風格的「實踐派」打著雖然迂腐但政治上管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旗號，與華領導的被譏諷為「凡是派」在政治局內展開了新的角逐。

1978年，鄧小平的權力和威望不斷提高，對官僚機構內「極左分子」的持續清洗，為鄧的新老政治盟友騰出了位置。他許諾為知識分子提供更多的物質利益和更高的社會地位，解除對他們政治上的懷疑，迅速發展科學技術，給知識分子在專業上更大的自主權、在現代化高等教育體系中更大的發言權，從而成功地贏得了知識分子的支持。⁷ 他還表示要實行徹底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民主化。

1950年代曾擔任領導職務的老幹部又先後回到領導崗位，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毛的許多政治對手也都陸續被「平反」，老幹部的行列越來越壯大，信心也大增，這進一步加強了鄧小平的權力。獲得平反的還有自1957年反右鬥爭後被關押或在政治上被打倒的十萬名政治犯，他們中有知識分子、黨的幹部及其他類型的人。⁸ 1978年，他們被悄然解放出來。沒有人公開指責鄧小平就是1957年反右鬥爭的主要領導人。

在1978年「撥亂反正」中，最有政治意義的是黨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公開平反。這一事件當時被官方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成為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第二次剝奪他的權力的藉口。但是在1978年秋季，當時下令民兵進入天安門廣場鎮壓的北京市長吳德被解除了職務，天安門事件成了「革命事件」。官方媒體現在大力宣揚兩年半前天安門廣場示威者的英雄主義精神。在黨的兩次結論之間的時間裏，天安門事件作為人民要求民主、反對專制的反映，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由年輕的不同政見者在1976年發起的備受尊崇的「四五運動」，在1978年初以大字報的形式再次出現在北京的街頭。青年活動家們（多數是過去的紅衛兵和青年工人）呼籲「第五個現代化」即民主化，黨對天安門事件平反一事使他們的行列迅速壯大。鄧小平及其盟友對他們的明顯支持使他們深受鼓舞。1978年下半年，他們在北京市中心的街道上多次舉行政治集會。一些大字報對毛時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尖銳的批判，要求清除還在政治局中「毛主義者」，要求人權、社會主義法制和民主政治體制。這是一個令人振奮和充滿希望的時期。

* * *

民主運動（人們後來這樣稱呼）在天安門廣場一帶如火如荼發展之際，在俯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裏，黨的領導人正在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18-22日舉行。這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次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會議。

三中全會是鄧小平和「實踐派」的一次決定性（即使不是全面的）的勝利。一大批鄧的支持者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使鄧能有效地控制這兩個機構，進而控制全黨。「凡是派」的大多數成員雖然還暫時保留著黨內的正式職務，但他們原來負責的政治和經濟工作已轉手他人。1978年12月三中全會上華國鋒依然是黨主席，但他除了這一頭銜外已沒有了實權。在全會上，華被迫作了「自我批評」，此後，他所作的只是在鄧小平的指示下履行儀式上的職能，直到1981年，在放棄權力的三年後，他又不得不放棄了黨主席的頭銜。

三中全會最重要的決定是「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社會主義現代化不是一個新名詞，但卻有了新的含義。簡單地說，就是所有的工作都要服從現代經濟發展的任務。相應地，中共中央作出了結束階級鬥爭的決策，或至少是結束「急風暴雨」的「群眾」鬥爭，希望從此建立一個有利於四個現代化建設的社會和政治穩定局面。全會還提出了把「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相結合的方針。這樣，就為資本主義式的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依據，這種改革成了鄧小平時代的主旋律。

* * *

繼在北京的三中全會的勝利之後，鄧小平於1979年1月成功到美國進行訪問，這次訪問標誌著在人民共和國成立30年後，兩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七年前，毛澤東和周恩來（與尼克松和基辛格一起），開創了務實政治外交，鄧小平成為這一政策的政治受益人，中美建交進一步增加了鄧小平在國內外的聲望。不過，令人不敢恭維的是鄧小平傲慢地威脅說要「給越南一個教訓」。2月17日，在鄧訪美回國不久，中國軍隊侵入越南。動武的藉口是越南侵佔柬埔寨，推翻了中國支持的殘暴的波爾布特政權。經過幾星期血腥的但沒有取得預期結果的戰鬥後，中國軍隊撤出了越南。中國對越戰爭給雙方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損害了鄧新政權在國際上的形象，這場入侵的唯一教訓是發現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作戰能力大幅度下降。⁹

1978–1981年的民主運動

鄧小平很快發現，除了越南以外，他在國內也有敵人。曾在1978年下半年幫助鄧小平鞏固權力的民主運動，其人數和號召力在1979年上半年迅速增長。民運中的許多成員是已近30歲或30歲出頭的從前的紅衛兵，他們是「失落的一代」中堅持自我教育的成員，從事的職業三教九流。民運基本上沒有學生參加，老知識分子也沒有參加這場運動或公開對運動表示支持。然而，在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

主義法制」的鼓舞下，年輕的活動家們表現出非凡的思想號召力和組織能力，他們迅速建立了自己的準政治社團，出版了越來越多的涉及內容廣泛的刊物。民主運動迅速從北京擴大到其它大城市和省會城市。

1978年，雖然民主運動的多數成員支持鄧小平的權力，在1979年初也還寄望於鄧開始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但後毛政權的主要列寧主義領導人並不打算鼓勵一場不受黨組織控制的民主運動。他們更不能容忍反映社會各界不滿情緒的獨立社會組織的存在，特別是在面臨數百萬沒有工作、怨氣沖天的下鄉知青非法返回城裏之際。與那些在當時的文化和思想解放中受益的老一代知識分子不同，多數年輕的民運積極分子表現出不妥協的反權威精神，他們批評黨對政治權力的絕對壟斷，否定黨在思想上絕對正確。一些人還重新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時的「極左」理論，認為中國被一個特權「官僚階級」所統治。

1979年春季，政府開始鎮壓民主運動，查禁了所有非官方的刊物，開始逮捕民運的領導人。魏京生是第一批被捕的人員之一，他是《探索》雜誌的主編，他對鄧小平和毛澤東都提出批評，是著名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這篇大字報的作者。除了政治和思想罪名外，他還被指控向外國記者提供解放軍對越作戰的軍事情報。實際上，魏京生是當時中國少數反對中國入侵越南的公民之一。1979年10月，經過一天的審判，魏京生被判處15年徒刑。在其後兩年裏，許多魏的支持者都被捕入獄。

已經牢牢地鞏固了自己「最高領導人」地位的鄧小平，在鎮壓過程中，譴責他昔日的民主盟友是無政府主義者，是罪犯，指責他們恢復了文化大革命邪惡的政治方式。相應地，鄧小平要求禁止「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毛澤東的提議下，這四大自由曾被寫入1975年1月的國家憲法中。儘管憲法中的這些權利在實踐中很少得到遵守，但即使是紙面上的東西也令鄧小平如芒在背，聯想起文化大革命對黨的攻擊。¹⁰ 即便是在黨為了證明要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化」、開始制定和頒佈新法律條文的1979年和1980年，官方宣佈，許多參加民主運動的活躍分子在政府的命令下被送到了勞改農場。

鄧小平用「四項基本原則」代替了毛澤東的「四大自由」，前者是「堅

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¹¹ 鄧強調說，在這四項中，最重要的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事實證明這是唯一能堅持下去的原則。

到1981年春季，曾一度蓬勃發展的民主運動銷聲匿跡。民運的多數領導人被捕入獄，少數幸存者轉入地下活動，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實際上，這次民主運動並沒有得到群眾的普遍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後毛政權推行的社會生活非政治化政策的結果。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導致社會上普遍的虛無主義，在群眾中產生了思想和政治信仰危機，鄧小平政權不是靠提出新的社會和政治理想去填補真空，而是簡單地誘之以利，鼓勵群眾去百貨商店購置更多的新消費品，或是根據取代了革命口號的廣告牌去選擇自己需要的東西。大眾對民主運動的鎮壓漠然置之，更談不上舉行抗議。民主運動是國家鎮壓和民眾冷漠的雙重犧牲品。

* * *

在鎮壓下層民主運動的同時，鄧小平著手鞏固他在上層對黨和國家政權機構的控制。他有條不紊地撤換了領導層內所有被認為忠誠於毛的人，換上了自己信任的人。在1980年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凡是派」剩下的基本成員都被撤職，其中包括原8341部隊的負責人汪東興，正是這支部隊當時執行了逮捕四人幫的任務，以及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提拔到中央政治局的農民領袖陳永貴。文化大革命中被當成「右派」的黨的資深領導人取代了「左派」空出來的位置。最集中地反映當時潮流的是為劉少奇平反，中國共產黨隆重地舉行追悼會，恢復這位中國共產黨最出色的列寧主義者的黨籍，鄧小平在追悼會上致辭。文化大革命對劉少奇的清洗，被稱為「我們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

在政治上埋葬華國鋒是以一種彬彬有禮、但重實效的方式進行的。作為對華政治合作(以及團結象徵)的回報，在實際權力已經轉移到鄧小平手中後的幾年裏，華從毛澤東和周恩來繼承下來的頭銜還繼續保留著。不過，1980年9月，他被迫辭去了國務院總理一職，讓位

於鄧在同年1月提拔進中央政治局的趙紫陽。¹² 還是在1980年，鄧小平決定恢復中央書記處作為黨的領導機關，1950年代，鄧就是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因而也是黨的正式領導人)，毛後來廢除了這一機構。鄧任命胡耀邦擔任總書記，¹³ 這樣，華本來就有名無實的黨主席職務，現在只剩了一個純粹的空名。1981年6月，華默默地辭去了徒有虛名的黨主席職務，在同一會議上，中共中央還對毛澤東作出了正式評價。一年後，華又離開了中央政治局，但在由348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上，保留了華中央委員的資格，這是留給毛澤東的第一位、也是十分平庸的接班人的榮譽位置。

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黨員人數已增加到4000萬人)正式確認了三中全會後建立的新政治秩序，鄧小平稱這次代表大會是1945年(當時確認了毛的領導權威)以來黨的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會。大會主要是批准了鄧的新經濟政策(下一章將討論這一問題)和黨的領導層的人事變動。胡耀邦繼續擔任黨的總書記，取消了已經顯得多餘的黨主席一職。大會非同尋常地強調要加強列寧式的中央集權組織結構和對黨員的紀律約束，認為黨的基層幹部中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左」的傾向。「左」的概念更加寬泛，凡是對新政權的經濟改革政策持消極態度都是「左」的表現。雖然鄧小平寧可垂簾聽政，安排自己的門徒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但在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毫無疑問地(也沒有人敢提出質疑)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毛的問題與對「毛澤東思想」的新詮釋

鄧小平要建立後毛時代的秩序，不僅需要清除左派對手，起用忠誠於他的幹部，還要破除對毛澤東的神話。幾乎與毛本人支配他那個時代的政治生活一樣，毛的幽靈也支配著新時代的政治意識。鄧小平政權主要領導人物都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過迫害，只有削弱發動清洗的已故主席的神人地位，鄧政權的合法性才能得到保障。一旦證明了毛也不是一貫正確，那麼再放棄毛的政策和理論就相對容易得多了。

對毛澤東和毛時代重新作出評價，不僅是出於復仇的渴望或是權

力的實際需要，對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特別是知識分子和黨的官僚來說，這是一種告慰死難的朋友和同事的精神需要。它不僅表現為給死者「平反昭雪」，還要昭告世人，黨已從災難中吸取了歷史教訓，毛時代的災難將不會重演。毛曾預言，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但是，他的繼承人決心證明，不會再有第二次了。

然而，對毛澤東的歷史作用進行嚴肅的評價，是一項非常棘手的政治事業，這不僅因為已故主席的形象在群眾心目中依然是神聖的，更重要的是，後毛時代的領導人，無論在思想和血統上，都與毛本人有著深深的淵源。不管他們個人對前主席懷有什麼樣的感情，如果歷史上沒有毛澤東，也就不可能有他們在政治上的今天。畢竟，毛既是中國革命的列寧，也是斯大林，雖然他的思想、政治實踐和個性與這兩位俄國領袖有很大的差別。像列寧一樣，毛被公認是中國革命和新社會的締造者；像斯大林一樣，他在四分之一的世紀裏是勝利後的國家最高的統治者。如果簡單地像赫魯曉夫在1956年對待斯大林那樣，譴責毛是暴君和篡位者，不僅會動搖共產黨國家的政治合法性，而且也會令產生這個國家的革命的道義合法性成為問題。赫魯曉夫在譴責斯大林時，可以借助於列寧的名義。但對毛的繼續人來說，除了毛本人外，中國沒有一個列寧。正是基於這種根本的政治和歷史原因，在1980年夏季起草對毛的評價的官方文件時，鄧小平說：「要把毛主席的像永遠掛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徵，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¹⁴

鄧的評價表明，黨對毛澤東的評價不僅涉及到黨的政治合法性問題，而且事關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精神。因為毛不僅是共產主義革命的領袖，而且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愛國英雄。正如鄧小平說的，他締造了新中國，使長期受壓迫受欺侮的中國「在世界上站起來了」。此外，作為革命家和民族領袖，即使是在他去世後，他生前享有的巨大聲望也長久地留在人民群眾、特別是在農民心目中，千百萬農民依然把神話了的毛澤東作為崇拜的對象。在中國共產黨黨員中、特別是那些曾在毛的領導下在革命戰爭年代出生入死的老幹部中，在數百萬在文化大革命中響應毛的號召造反的青年積極分子中，毛也同樣備受尊崇。

鄧小平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政治生活的這一基本事實。在一次很能反映他的政治實用主義的講話中，鄧在談到要對毛的功績作出「恰當的評價」時，警告說，否則的話，「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繫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¹⁵ 在起草對毛進行評價的正式文件時，鄧的助手們認識到，他們在政治上必須慎之又慎地進行這一工作。

早在1981年6月黨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作出正式評價之前很久一段時間，由於發生了一系列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事件及人們思想上的變化，毛的聲望就已經受到損害。雖然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放棄了毛的許多觀點和政策，明確地開始了後毛主義的時代，但全會並沒有對毛或毛時代作出任何正式評價。實際上，全會閉幕後發表的公報還煞有介意地借助於毛的著作的權威，並且宣佈在未來「適當的時候」再對文化大革命作出評價。但是，全會確實號召全面「平反冤假錯案」，給許多毛的舊政治對手平反了，其中最具有政治意義的莫過於給彭德懷平反。毛於1959年打倒這位深得人心的元帥一事，被普遍認為是毛時代最大的冤案之一，在近二十年時間裏，許多人都要求糾正這一冤案。彭德懷於1974年含冤去世，但彭德懷案是中國政治生活中最令人難堪的瘡疤之一。根據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共中央於1978年12月25日為彭德懷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鄧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詞，讚揚已故元帥是一位偉大的革命英雄，恢復了他在1959年以前的歷史地位。這種儀式具有重要的政治含義，因為，給彭德懷以如此殊榮，意味著毛並不是在任何時候上都是值得尊崇的。讚揚彭德懷，就是對大躍進運動的批評，彭正是因為堅決反對大躍進才受到清洗。

在三中全會以後的1979年，官方的出版物上出現了含蓄地批評毛的潮流，而民主運動的積極分子則在非官方的出版物和街頭的大字報中，公開地對毛提出批評。隨著大批在毛時代後期被打成「右派」和「走資派」的人的平反，以及那些被清洗的幹部和知識分子重新回到政治和文化生活，大城市中批評毛的輿論呼聲越來越高。被平反的著名人物包括保守的官僚彭真，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被打倒的黨的高層領導人。鄧安排彭真負責起草新的法律條文。在全黨開展的反對「極左思潮」的運動，促使對毛的批評不斷升級。「極左」一直是鄧小平時代主要

的(但不是唯一的)思想和政治異端。反對極左運動表面上是批判早就死去的林彪和關在監獄裏的四人幫，實質是針對毛統治的最後20年中普遍的極左現象。一大批學者和黨的理論家提出了導致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根源。¹⁶ 1979年10月，德高望重的葉劍英元帥在紀念人民共和國成立30週年發表的講話，給批判極左和毛的晚年時代進一步提供了政治動力。在這篇事先經過中共中央批准的講話裏，葉劍英把大躍進災難的原因歸結為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的「左傾錯誤」，譴責文化大革命是那些實行「極左路線」的人帶給中國的長達十年(1966-1976)的一場災難。¹⁷ 按照當時官方流行的政治提法，葉劍英把罪責歸因於林彪和四人幫，但是，很顯然，其他人也要對文化大革命負責，毛澤東要承擔主要責任。

官方在1979年和1980年對毛主義進行批判時，一直沒有點毛澤東本人的名字。實際上，在涉及其他政治或政策性事務時，出於權宜政治的考慮，官方還常常有選擇地引用毛的著作以增加權威性。但對「個人崇拜」的批判越來越嚴厲，「個人崇拜」這一術語當時在中國與25年前在蘇聯反斯大林主義時一樣，是一種委婉的提法。官方為克服「個人崇拜」、有時也稱為「現代迷信」造成的惡果而採取的措施，是堅持「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雖然這些大力宣傳的原則並沒有影響到權力完全集中在鄧小平手中。不過，「集體領導」的精神在官方對「毛澤東思想」重新定義時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刪去了毛澤東思想中激進的內容後，毛澤東思想現在變成了全黨智慧的結晶，而不單是毛個人的創造。中國共產黨60年的歷史也作了相應的修改，強調在毛時代歷史教科書中被忽視了的其他老一代革命家的貢獻。到1980年代中期，雖然有關毛本人的歷史地位還有待於公開作出結論，但已故主席最後20年的統治已經成為公開批判研究的對象。

1980年11月，在四人幫被捕後的四年，為了降低毛在群眾中的聲望，新政府開始對四人幫進行審判，審判情況由電視轉播。在兩個月的時間裏，四人幫和毛過去的秘書陳伯達，在北京公安部的一所建築裏，接受由35名法官組成的特別法庭的審判。另一個特別軍事法庭同時開始審判與林彪1971年反毛陰謀有牽連的五名解放軍將軍，兩個審判之間的關係沒有明確的界定。長長的起訴書列舉了48條罪狀，包括

陰謀推翻政府、企圖謀害毛澤東、非法拘押、逼供信以及對70萬人進行迫害，導致其中3.4萬人死亡等。¹⁸雖然這次大張旗鼓的審判是依據新頒佈的現代法律條文進行的，但審判當然是政治性的。法官與其說是聽命於法律，不如說是按中央政治局的旨意行事。從開始審判到最後判決，中央政治局自始至終指揮著審判的每一個細節。

對外國觀察家來說，對四人幫的審判並不足以令人信服鄧小平政權已經接受了國際公認的法律準則，實際上，這種審判不禁令人想起斯大林式的作戲審判，但審判卻達到了它所期望的國內政治目的。高度公開的審判本身，就是對毛時代最後十年政治生活的有力批判。電視在晚間播出了有選擇的一些證人出庭的審判片斷，他們詳盡地控訴了文化大革命中酷刑和死亡的恐怖事件。對那些在現在被稱為四人幫「封建法西斯」統治下受過迫害的城市知識分子和工人來說，能夠目睹戴著手銬的江青和其他人被關進鐵牢，接受審判，正應了「因果報應」，憤恨情緒得到發洩。對鄧小平和他的同僚來說，審判不僅是一樁令人快慰的政治復仇行為，而且有助於繼續在黨政軍官僚機構中清除「極左分子」。北京的公審是一個榜樣，各省市也先後對「四人幫的追隨者」進行了一系列的審判。但是，這種大張旗鼓的審判的最重要的政治目的，是要提出毛澤東在這些事件中——他的妻子和一度的同志因為這些事件而被指控犯罪——的歷史作用問題。

當然，從審判四人幫一開始，毛澤東就是不言而喻的被告。在審判過程中，桀驁不馴的江青一直利用他已故丈夫的權威來為自己辯護，無意中（但可以預料地）在政治上正中鄧小平的下懷。在一次申辯中，江青甚至說道：「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讓我咬誰我就咬誰。」在審判長宣讀的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最後陳述中，說中國人民「十分清楚，對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難，毛主席負有責任。」¹⁹

但是，鄧小平的目的不是要在歷史上把毛與四人幫一視同仁，他恰恰是要通過把毛與四人幫區別開以挽救歷史上的毛，作為像普通人一樣也可能犯錯誤的毛得到了挽救，但毛的歷史地位和思想權威卻受到了損害。除了把毛與四人幫區別開以外，鄧在1980年夏天還提出，要把「政治錯誤」與「犯罪行為」區別開。在審判四人幫前後，官方報刊都採用了這種提法，反覆強調「毛澤東的錯誤與林彪、江青及其同夥的

罪行是有原則區別的]。²⁰按照這種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是模糊的區別，由黨控制的法庭對四人幫進行了有罪判決，五個月後，黨又公佈了對毛作的正式歷史評價。

關於毛澤東評價的決議

1981年6月27日，在接受華國鋒辭去黨主席後的第二天，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早在人們預期之中的對毛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的正式評價。「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文件準備時間長達15個月。據說有4000名黨的領導人參加了文件的起草工作，並按照鄧小平提出的具體「建議」反覆進行了修改。鄧小平的許多意見都是強調，除了批評毛的政治和思想上的錯誤外，要充分肯定他對革命事業作出的貢獻。儘管多數黨的高級領導人（他們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都渴望向毛的幽靈復仇，但鄧小平認為，保留毛作為革命和國家合法性的象徵是政治需要。

在鄧小平的堅決主張下，決議最後對毛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的領導作用，對毛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改造」中的「不可磨滅的功績」，作出了高度的評價。在稱讚毛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和現代化者的同時，決議還嚴肅地批評了已故主席在他統治的最後20年犯的錯誤。這些錯誤中包括1957年決定擴大反右運動的規模，導致許多無辜幹部和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儘管決議還提出這場運動（在鄧小平領導下進行的）最初是「必要的」和「正確的」。決議尖銳地批評了毛的「左傾」錯誤，認為大躍進的經濟災難主要是由左的錯誤引起的，當然，決議也承認黨的其他領導人（包括鄧小平和劉少奇）也曾滿腔熱情地支持大躍進。此外，決議還指責毛在晚年實行「個人專制」，鼓勵「個人崇拜」，破壞了列寧主義的「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決議嚴厲地抨擊了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左傾嚴重錯誤」，文化大革命被籠統地稱為十年動亂，它「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雖然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罪責都被歸於林彪和四人幫，但毛也難辭其咎，決議的結論是：「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²¹

黨所批判的年邁毛澤東這種全局性的、危害極大的「左傾」錯誤，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上說的「烏托邦」和「非科學」的思想潮流，決議對此有詳細的敘述。根據這一官方評價，毛「誇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在理論和政策上「脫離實際」，在經濟十分落後的條件下，提出了共產主義烏托邦即將來臨的完全不現實的期望，違背了他的繼承人（他們是更為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說的歷史「客觀規律」。然而，決議雖然對毛的左的錯誤和其它方面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但在對毛的總的歷史評價上，決議的結論是，「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因為他對革命事業長期的偉大貢獻，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的領袖和導師」。在決議公開發表以後，對毛的評價形成了一個普遍的公式，即毛是三七開：三分錯誤，七分正確。

許多知識分子和後毛時代黨的領導人私下裏對毛的評價，要比1981年6月決議中的評價低得多。但是，官方決議在對毛的「左傾」錯誤進行批評的同時，又對毛作了高度評價，絕不僅只是黨的新領導人為了保持革命的連續性和政治上的合法性，它還反映了幸存的老一代黨的領導人對早期毛澤東由衷的尊敬欽佩（即使不包括感情色彩）——作為革命領袖的毛，作為中華民族解放者的毛，作為經濟現代化建設者的毛，即是在犯「左傾錯誤」以前的毛澤東。曾受到批判甚至迫害、如今又重返崗位的黨內老幹部，十分留戀他們早期革命生涯時作為黨的革命領袖的毛澤東，留戀在1950年代初期領導新中國建設的毛澤東——他們心目中的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對鄧小平和他的許多同僚來說，他們對毛的讚揚，決非僅僅是出於實用主義的政治考慮，他們努力要恢復1957年前的毛主義，即毛在陷入有害的激進的烏托邦觀念之前的思想。

1981年的決議，至少從官方的角度來說，正式解決了毛的問題，其後幾年，對毛個人崇拜的殘跡也逐漸從公眾視線中消失，不過，在通俗文化和非官方的政治生活中，很快又出現了令人稱奇的對毛的崇拜。但是在1981年，在官方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生活中，毛只是一位革命家，一位民族主義者和現代化的象徵。當然，這樣做的目的，是通過把後毛的政權與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歷史密切聯繫在一起，強化其合

法性，而毛當然是革命歷史中長時間起著決定性作用的領袖。相應地，官方的出版物繼續經常引用毛的著作，當然也是有選擇性的。在後毛的歲月裏，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已故主席非激進的形象也常常出現並受到頌揚。

然而，除了把毛澤東作為政治象徵外，最重要的也許是同時否定了毛時代後20年的社會和思想激進主義，把毛從神降為一個也會犯錯誤——也會犯「全局性的錯誤」——的領導人，這為放棄毛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實行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準備搞的市場取向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理論保證。

註釋

1. 有關四人幫的倒台，參見上述第20章。
2. 華國鋒，〈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工作報告〉（“Reports to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1978年2月26日，《北京周刊》1978年3月10日。華的報告描述了十年規劃的總體輪廓，政府隨後又宣佈了更加具體的建設項目和目標。有關這一規劃的詳盡分析，參見鄭竹園（Cheng Chu-yuan），〈中國工業的現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Industry”），鮑瑞嘉編，《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新技術革命》（*China’s Four Modernizations: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0），頁21–48。
3. 鄧小平於1904年出生於四川一個富有的地主家庭，鄧小平也算是五四一代的成員。五四運動爆發時，鄧小平還非常年輕，當時激進的政治觀念和思想潮流對鄧小平的影響很深，1923年，他赴法國參加「勤工儉學」，在法國加入了由周恩來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法國支部。
4. 參見本書第20章。
5. 據說，鄧當時曾對他的支持者說過這樣一番話：「要麼接受任人宰割的命運，讓黨和國家變質，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用心血創立的國家毀在這四個人（即四人幫）手裏，……要麼我們與他們鬥爭……如果勝了，那所有問題都解決了。如果打敗了，我們還沒死，那就上山，或者跑到別的國家裏等機會。現在，我們至少可以用廣東軍區、福州軍區和南京軍區的力量跟他們鬥爭。」轉引自加塞德，《復活：毛後的中國》，頁130。

6. 參見本書第17章。
7. 有關鄧小平關於知識分子問題講話的原文，參見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之一，著名作家丁玲的作品對此進行了生動感人的描寫，參見史景遷，《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81），特別是頁335–369。
9. 有關對這次入侵的原因和結果精練而深入的敘述，參見杜達拿（Daniel Tretiak），〈中國的對越戰爭及其後果〉（“China’s Vietnam War and Its Consequences”），《中國季刊》，第80期（1979年12月），頁740–767。
10. 鄧小平是在1980年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廢除「四大」的。參見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鄧小平文選》，第2卷，頁239–273。1980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大正式從憲法中刪去了「四大」，同時刪去的還有工人有罷工自由的條款，這是一項本來就未曾認真實行過的「權利」。在1980年12月25日的中央會議上，鄧小平再次尖銳地抨擊了民主運動中，特別痛苦地否定了中國是由一個特權「官僚主義階級」統治的說法。參見鄧小平，〈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鄧小平文選》，第2卷，頁366。
11.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80年3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頁158–184。
12. 趙紫陽（1919–2005），在共產主義革命最後十年裏在紅軍裏擔任政治幹部，共和國成立後，在官僚行列裏迅速得到提升，1960年代初期任廣東省委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他是1970年代初期經毛批准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的許多老幹部中的一員。1970年代末期，當他任四川省委書記時，他實行的市場取向的改革引起了鄧小平的注意，隨後被調進了北京。
13. 胡耀邦（1915–1989），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鄧小平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作政治工作。1949年後，他一直是鄧的追隨者，他在政治上的浮沉與鄧的興衰息息相關。他在1978年的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4. 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鄧小平文選》，第2卷，頁347。
15. 鄧小平，〈對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頁298。

16. 有關對中國共產主義歷史上這一問題的深入分析，參見威廉·約瑟夫：
《中國對極左思潮的批判，1958-1981》。
17. 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1979年9月29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葉劍英是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葉是委員長）和國務院發表講話。華雖然仍是黨的主席，但由葉來發表30週年講話，這在當時是有著政治含義的。
18. 起訴書原文，參見《北京周刊》，第48期（1980年12月1日），頁9-28。
19. 江青與張春橋均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兩人都死於獄中。江青患有喉癌，據說於1991年5月在獄中自殺。王洪文被判處無期徒刑，1992年死於肺癌。姚文元被判20年徒刑，於1996年出獄。
20. 例如，參見《北京周刊》，第1期（1981年1月5日），頁4。在審判四人幫前就已劃定了這一區別。例如，鄧小平在〈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中提出的看法。
21.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官方版本，參見《北京周刊》，第27期（1981年7月6日），頁10-39。

市場改革與資本主義的發展

1978年底，鄧小平以提倡「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形象登上權力高峰。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承諾，對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和城市工人階級，有著巨大的吸引力，鄧小平因此而贏得了城市的民心。鄧的政權將領導一場在世界歷史令人嘆為觀止的經濟改革運動，這場改革將使中國人民走上相對（且不論貧富懸殊）繁榮富裕的道路——但是，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民主的諾言，在鄧的中國都沒有兌現。

鄧第一個背棄的諾言是民主。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過去三個月，鄧便著手對付擁護他上台的政治聯盟中最脆弱的成員——民主運動中年輕的活動家。正是他們，在西單民主牆上的大字報中寫下了充滿熱情的政論文章和動人心弦的詩篇，他們為1978年下半年支持鄧小平的運動注入了最大的熱情和活力。1979年3月，以魏京生被捕為信號的對民主運動的鎮壓，預示了後毛時代未來中國社會的特點。

誠然，在鄧小平的統治下，總的來說，黨和國家對社會的統治比過去有所鬆動，釋放了成千上萬名政治犯，意識形態的控制也比過去寬鬆，這當然是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的重要收穫。但是他們的民主權利卻受到了嚴格的限制。新政權反覆強調，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還要進行「政治改革」，然而，鄧小平的政治改革並不是指他曾許諾的、許多人以為是鄧的目標的民主化進程。他的政治改革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任務，是恢復中國共產黨的列寧主義組織原則，這種原則和紀律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第二，是指通過黨的幹部隊

伍(用鄧的話說就是)「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¹使黨的統治更加制度化和規範化。簡單地說就是，無論經濟改革走得有多遠，黨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根本的變化。要保持用列寧主義思想改造和武裝的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保留斯大林主義的政治體制。

如果說鄧的「社會主義民主」中還有一些民主的內容，那麼他說的社會主義最多也只是一絲影子。從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初，當鄧小平和他躊躇滿志的同僚開始實行經濟改革政策時，他們熱衷於經濟權力下放，對嘗試用市場手段打破僵化的中國那種蘇聯式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興趣日濃，但對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改造卻毫無興趣，因為這種改造將使生產者獲得支配他們的生產條件和產品的手段。

為什麼不使用社會主義手段來解決問題，其原因值得人們深思，對社會主義的定義不清是其中原因之一。在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中，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社會主義」的概念都被扭曲，衡量社會主義的標準是國家對生產的支配程度。對於把中國經濟中的問題歸結為高度集中和官僚化的中央計劃體制的改革者來說，這種社會主義毫無吸引力。社會主義是直接生產者、而不是國家對生產進程的支配。但是，即使那些對社會主義有這種正確認識的人，也不願意訴諸於社會主義的手段解決問題。因為這種真正的社會主義手段以政治民主為前提，因而是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直接挑戰。確實，真正的社會主義是雙重的挑戰，它既威脅到原有的經濟體制，也威脅到共產黨官僚的政治權力。此外，以工人和農民支配為形式的社會主義，是歷史的新生事物，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沒有過先例。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使人們感到恐懼。無論中國的改革者最初有多大的氣魄，他們也只能在實際存在的經濟模式中進行選擇。

所以，在三中全會時，政治上取得勝利的鄧陣營裏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在對改革進行探討中，沒有認真考慮過用真正的社會主義選擇取代指令經濟模式。只有在現存政治體制中能被接受的改革措施被提到了議事日程，這些措施包括各種下放經濟權限的方式和引進市場機制。市場機制對黨的領導人和理論家有著特別的誘惑，因為當時在全世界，正是新自由派把「市場的魔力」捧到登峰造極程度的時刻。

在人民共和國歷史的早期，曾有過經濟管理權限和決策權限下放的實踐(特別是在1958-1960年的大躍進期間，激進的下放措施導致災難性的結果)，並沒有對黨的領導造成威脅——當然，在具體方案上，權限下放會使某些官僚部門受益，削弱或影響其他部門的利益。市場也並非像許多外國觀察家認為的那樣，會對共產黨的政治體系構成道義上的威脅。有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成功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認為，中國也可以利用市場機制提高工農業產品的數量，改善產品質量，同時又不會削弱黨的權力或國家對經濟「指令高度」的控制。總的來說，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共產黨的國家在政治上依然居統治地位，在經濟上依然掌握著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要部門。此外，許多在最初對市場關係持懷疑態度的黨政官僚(一方面出於意識形態原則，另一方面因為既得物質利益)，很快就感到市場經濟能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好處。當然，很多官僚迫不及待地為自己謀利，大撈一把，這個問題下面將作簡要敘述。

* * *

在現代世界歷史上，無論是從經濟、社會還是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市場當然地是與工業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的。² 市場經濟必然地產生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導致出現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現象，對此，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十分清楚。但是，鄧小平和他的改革派同事沒有設想中國未來要走資本主義。雖然一些充滿熱情的改革者，像卡爾·瑞斯金(Carl Riskin)形容的，熱衷於「散佈一種關於市場奇迹的天真觀點」，³ 但內在的價值觀又使他們中的多數人不可能鼓吹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政權，相反，他們把市場機制當成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手段，作為打破僵化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加速現代生產力發展的最有效的方式，進而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奠定根本的物質基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市場社會主義」經驗，進一步增強了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信心。但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市場經濟所取得的有限成就，被西方持同情態度的評論家大大誇張了。

為了給使用資本主義的手段和方式實現未來社會主義目標尋找理

論根據，鄧時代的理論家求助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這與毛時代不同。鄧的理論家們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必須以資本主義為前提的觀點，正是這一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區別於19世紀其他社會主義理論。馬克思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只能建立在資本主義創造的物質和社會的基礎上，只能建立在大工業及與此相應的成熟的無產階級——它是未來社會主義不可缺少的代表——的基礎上。所以，馬克思認為，無論資本主義在社會上具有怎樣的破壞性和非人性，它都是人類歷史發展上的一個必然的和進步的階段。實際上，馬克思的許多經典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在內，都可以理解成（中國現在實際上也是這樣理解）是對資本主義創造的巨大生產力的讚揚。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改革者援引馬克思的權威作為選擇資本主義手段的依據，他們也常引用列寧的話，特別是列寧的這一類著名觀點，如「我們不能設想，除了以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以外，還有別的什麼社會主義。」⁴

在從馬克思主義中為市場改革政策尋找理論根據的過程中，鄧的理論家們特別強調中國封建傳統的有害影響。他們認為，由於資本主義在中國歷史上的失敗，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生活和意識形態中，依然存在著前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封建主義殘餘」——因此它也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發展的長期的最大障礙。毛澤東短暫的不徹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封建思想」在人民共和國依然根深蒂固，這是毛時代後期的錯誤、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錯誤的主要原因之一。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本主義是封建主義的歷史大敵，所以，資本主義在中國仍然是需要的，起著進步作用。至於他們提倡的資本主義方式與他們追求的社會主義目標是否一致這個棘手問題，改革派基本上緘口默言。

市場改革政策的另一個準馬克思主義的依據，是鄧小平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來的命題。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上，鄧提出，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即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完成，階級差別（和階級鬥爭）最終也不復存在，所以，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不再是對立的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

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⁵當然，解決辦法就是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力，建立與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社會「上層建築」相適應的經濟基礎。

毛澤東對八大的這種提法不以為然，不久即否定了八大的觀點，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但是，1978年鄧小平大權在握後，他在八大提出的觀點重新成為後毛時代初期的主要思想原則，根據這個原則，所有的社會考慮（以及社會主義的考慮）都要服從於迅速發展經濟這一根本任務——使用一切最有效的方式，包括資本主義的市場手段來完成這個任務。如我們將要談到的，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的這一命題經過精心雕琢後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一個經濟決定一切的理論（在老生常談的馬克思主義外表下），為把國民經濟發展放在首位提供了理論根據，絲毫不顧及可能產生的社會代價。⁶

* * *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籠統地提出了把「市場調節」和「計劃調節」結合起來的方針，正式批准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計劃，1979年，經濟改革正式啟動。這種籠統的提法，既照顧到市場改革提倡者的要求，也使那些堅持以中央計劃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人能夠接受。不過，最初的改革是為了糾正毛時代遺留的經濟領域內比例失調的問題，主要靠行政措施解決，基本上沒有涉及到採取市場機制的問題。1979年春季，新政府把華國鋒的十年規劃拋在一邊，開始大幅度削減對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投資，增加對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政府還採取措施，有效地降底了「積累率」，即國家為擴大生產能力而調撥的社會產品的比例。積累率在毛時代越來越高，在華國鋒執政時達到最高峰，嚴重地抑制了消費，這種趨勢現在得到扭轉，政府大幅度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農民按規定上繳國家糧庫的糧食價格提高了20%，超出定額的糧食收購價格提高了50%。此外，農民可擁有的自留地從佔可耕地的5%增加到15%，國家對農村集貿市場的交易也不再過多干預。國營工廠實行了新的獎金和分紅制度，根據勞動生產率進行分配，城市工人也成為改革的受益者，不過他們的受益程度遠遠比不上農民。

鄧政權最初的改革政策促使農業和輕工業生產大幅度提高，與此

同時，農村和城鎮人民的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消費能力大增強，這又促使消費品的生產和進口空前繁榮。1980年代初期，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消費品亦呈購銷兩旺形勢，這是1979年政策調整的直接結果。

雖然消費的增長主要是由於收入增加，但在鄧小平政府大力鼓勵下，以驚人速度蓬勃恢復和發展起來的城鄉私有企業也起了很大作用。1980年代初期，除了農村集貿市場迅速繁榮發展外，在城市街道上，出現了越來越多出售各種商品和食品的攤販，私人飯館和旅店紛紛開張，各種零售業、服務業雨後春筍般湧現，從理髮鋪、美容店到電視修理店應有盡有。在鬆散的集體所有制管理下，傳統的手工生產也得到恢復。匆匆建立起來的街道小廠生產著各種家庭日用品，新建立的來料加工制使婦女在家裏就可以製作衣服。

政府所以鼓勵這些私人或所謂集體企業的發展，原因之一是要填補經濟中長期處於空白狀態的零售業和服務業。在毛時代的後期，私人商店和集貿市場都被視作「資本主義尾巴」般割掉，居民常常要走很遠的路到國營商店去購買生活必需品，與那些冷冰冰的國營商店服務員（通常是超員）打交道。政府鼓勵私人企業發展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減輕城市失業的社會壓力。根據官方數字，到1984年，在城市日益繁榮的私人企業中就業的人數有400萬，在城市「集體」企業就業的人數超過3200萬，這種集體企業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逐漸都採用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⁷隨著政府不再限制私人企業可以僱用的人員數量，在私人企業中就業的人數成倍增長。到1980年代中期，私人 and 「集體」企業是城市經濟中發展最迅速的成分。

改革開始後一位著名的市場機制倡者的一番話，典型地道出了在私人企業中自我就業或就業對政府的吸引力，他坦率地評論說，對於這些工人，「國家不用再給他們發工資了」，⁸ 國家也用不著再給數量越來越多的家庭傭人發工資了。在毛時代，傭人並不新鮮，只不過他們基本上都是在機關或黨政高級幹部家中工作的政府僱員。在後毛時代，技術精英、知識分子、中層幹部以及比較成功的中國新資本家和在華的外國人家庭中，僱用女僕、廚師、園林匠和保姆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鄧小平時代初期，私營個體戶的出現為中國的城市增添了活力，外國人熱衷於把這種情況與毛時代清苦和單調的城市生活進行對比——即使那些在毛時代從未去過中國的外國人對這種比較也樂此不疲。不久，豪華賓館、夜總會和奢侈品專賣店——還有乞丐和妓女，取代了街頭的小攤小販和露天食攤。進而，中國的城市逐漸與世界上其他大多數城市沒有什麼不同，供人窮奢極侈的財富和赤貧現象形成顯明而令人痛心的對比，這正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最典型的特徵。

1980年代初期，許多西方觀察家把中國城市中出現的個體戶稱頌為充滿活力的中國資本主義誕生的跡象。當然，實際上不乏這樣的企業家，他們響應政府的號召，白手起家最後「致富」，然後被中國和外國的媒體大肆宣傳。但是，大多數這樣的個體戶和私人企業日子並不好過，有些只能勉強維持生存，這種情況與第三世界其他國家的情況十分相似。中國資本主義的真正起源不是城市的小商業資本主義，而是起源於在鄧小平「開放」政策下進入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的外貿和投資——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國家和控制開放通道的官僚。

開放政策

1975年1月，周恩來宣佈「四個現代化」目標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認識到，要實現周恩來提出的宏偉經濟目標，需要大幅度擴大中國的對外貿易，從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引進最新的技術，也許還需要借外資，這就意味著要放棄——或是令其名存實亡——毛的「自力更生」國策。

「自力更生」的原則在毛的中國有著神聖的地位。不過，自力更生實際也是中國不得已而為之的原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孤立政策，使中國在長達二十多年時間裏被排除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之外。1950年代後期與蘇聯交惡後，中國在共產主義世界中也陷於孤立狀態，在毛時代的多數時間裏，中國別無其他選擇，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毛主席的革命遺產，特別是延安時期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的思想，⁹也許給自力更生增添了一層神聖的色彩，並且無疑提供了理論上的根據。毫無疑問，一些黨的領導人，當然包括毛澤東在內，為

了使社會主義中國免遭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有害影響，願意為自力更生付出經濟上的代價。無論其是否自覺地意識到，毛和他的同僚們採納了19世紀末期弗裏德裏克·利斯特 (Friedrich List) 為普魯士制定的保護主義戰略，這一戰略旨在使工業經濟落後的德國實行相對孤立政策，直到其有能力與工業化的英格蘭競爭為止。不管是出於有意還是無意，中國在1970年代末期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其條件之有利，較之1950年代進入有天壤之別。¹⁰

但無論其自覺的戰略或原則是什麼，在機會來臨之際，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立即作出反映，使中國進入國際貿易和金融的資本主義世界。這一行動開始於毛時代的最後幾年，始於中美關係接近及尼克松在1972年2月對北京和上海的訪問之後。從1971年到1974年，中國的對外貿易額增長了兩倍多，多數是與非共產黨國家進行的貿易。¹¹ 在過渡的華國鋒政府領導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的步伐大大加快，如已經提到的，華流產的「十年計劃」號召大量引進外國資本和技術。鄧小平的市場導向發展戰略及其「開放」政策，使中國迅速與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接軌。從1978年到1988年，中國的對外貿易額增加了三倍多，在其後的六年裏又增加了三倍，日本、香港和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總的來說，對外貿易的繁榮發展是建立在中國所說的「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可以說交易的各方在每筆生意上都獲得了自己的利益。引起中國人擔憂的不是貿易上的「開放」，而是中國向外國資本開放——為吸引外資而創造的環境和實踐，令人不安地回憶起半殖民地時外國勢力統治下的通商港的情況，這種現象最典型地反映在「經濟特區」中。1979年，政府在靠近香港和台灣的中国南部沿海建立了第一批四個經濟特區，隨後又建立了其他經濟特區，在十年時間裏，中國的所有沿海地區和一些有選擇的內陸地區都對外「開放」了，就是說，這些地區為外國資本家剝削中國勞動力、迅速致富創造了有利的環境——並且給外國人提供他們在準殖民地環境裏期待的舒適生活方式。¹²

無論是從社會主義還是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經濟特區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令人尷尬的事物。當時，北京政權還感到有必要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特區的經濟是赤裸裸的真正資本主義，更加難以自

圓其說的，是政府還曾宣佈，特區是中國所有城市進行「改革」的榜樣。此外，特區還是外國資本家剝削中國工人的地方，是中國人為有特權的外國人提供各種服務的地方，特區是政府官員腐敗的溫床，不僅當地政府受到腐蝕，黨政高級官員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力在進出口貿易和其他交易中為自己謀取私利，而且他們的那些有經商頭腦的子女也因此受到了反面影響。

然而，除了對特區在經濟上是否真正成功仍有待爭議外——即是說，特區生產出的資本是否比中國政府對環境的投資數量要多——可以比較肯定地說，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從總體上帶來了預期的經濟利益：為工業企業和各種其他現代化建設項目注入了外國資金，周期性的缺乏外匯狀況得到緩解，能夠從日本和西方國家中引進先進的科學和工業技術，減輕了中國工人就業的壓力。

「開放」政策最重要的成果當然是積累了生產投資所需要的資金。鄧小平政權領導下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奇觀之一，就是最初積累的資金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政府中的貪官污吏。例如，一個典型的現象是，中國後革命時期的新「資產階級」中的部分成員就是地方官員（及他們的朋友和親戚），他們能夠用國家規定的低價買進商品和物資，然後再轉手以高額市場價格賣出。同樣突出的事例，特別是在大眾的政治意識中，是高幹子女在1980年代初期由於政治上的有利位置，能夠在外國資本家和中國國有企業中充當賺取巨額利益的買辦。無疑，這些腐敗官員和高幹子女賺的錢有一部分會流向秘密的瑞士銀行賬戶，如傳言的那樣，但大多數資金投入到國內各種能賺到高額利潤的金融和工商企業，大大加快了資金積累過程和經濟發展速度。

外國資本對生產企業的投資數量也十分可觀，而且在整個1980年代基本上保持穩定增長，然後是1990年代初期，在利潤驅動下，投資急劇增長。僅僅在1994年一年時間裏，中國吸引的外資（340億美元）就相當於到1989年底為止的前十年的總和。¹³ 中國的外資主要來自海外的華人投資者，他們的投資渠道主要是通過香港。雖然存在著政治上的障礙，但到1990年代中期，僅台灣資本家在大陸的投資就達250億美元，台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福建省。

中國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不單純是能提供無數的廉價勞動力，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廉價勞動力（甚至常常更便宜），它的吸引力在於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是一支有著嚴格紀律性的、受過相對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大軍。對潛在投資者來說，另一個十分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中國政府禁止工人自由組織工會，中國政府還在其他方面提供了「和平勞動」的保障。鄧和他的繼承人強調「安定團結」——對列寧主義專制的委婉表述，這也深得外國投資者的青睞。吸引外國投資者的還有直接進入中國國內市場的可能性，中國正在發揮它長期存在的巨大潛力，逐漸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市場。

當然，鄧小平的「開放」政策獲得的明顯經濟利益是需要代價的。代價之一就是中國從一個沒有債務的國家成為一個主要的債務國——雖然中國的外債在絕對數量上是巨大的，但用國際標準來衡量，從人均的基礎上或是中國的經濟規模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外債數量還是適度的。¹⁴當然，中國對國際資本市場波動（它對發展中國家並不總是仁慈的）的依附程度越來越深，而且要受到「國際」（但卻是由美國控制的）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此外，「開放」為政府和非政府的腐敗創造了新的機會——雖然如上所述，在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特殊條件下，官僚腐敗也是資金積累的主要源泉。另一個代價是在一定程度上（難以定量統計）失去了民族自信心，毛的自力更生政策，無論其付出了什麼經濟損失，卻使人民群眾形成了一個堅定的信念，即中國人民依靠自己的努力能夠創造光明的未來。在一個長期受到西方列強支配和欺侮的國家裏，這種民族自信的意義怎麼估計都不過高。這種信念在毛政權的最後幾年開始動搖，但是，在後毛時代的領導人把西方資本主義的手段和技術當成醫治中國問題的萬能良藥後，民族自信心受到致命的打擊，客觀上導致了西蒙·雷斯（Simon Leys）嘆息的「對西方盲目崇拜的突然再生」。¹⁵「盲目崇拜」可能導致它的反面民族主義，可以預見，在以後的年代裏，民族主義的情緒會越來越強烈和極端。

然而，埋葬毛的自力更生政策，並不像有些人擔心的那樣，實行「開放」政策意味著開始一個新的依附於人的時代。與1949年前的中國不同，在野心勃勃的外國列強與中華民族之間，是一個由具有強烈民

族意識的領導人領導的強大的國家，他們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有能力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一個獨立的中國，無論其在社會和政治方面還有什麼缺憾，將永遠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之一。儘管如此，中國正在與之接軌的國際資本主義市場，已經是（還將繼續是）對中國經濟進行資本主義改造的一股強大力量。

農業的非集體化

正是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居住和勞作的農村，最早感受到市場經濟的經濟活力和帶來的消極社會後果。從1979年和1980年起，鄧政權開始進行農村改革，改革最初似乎是要回到1960年代初期劉少奇為克服大躍進的困難而制定的「調整」政策上，但是農村改革很快就成為一場全面變革的洪流，1950年代和其後建立起來的集體化組織在這股洪流衝擊下紛紛解體。到19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已不復存在，個體農戶生產取代了集體農業生產。

農民勞動與生活方式根本性轉變的速度之快，遠遠超出了北京領導人的預期，這與過去二十多年的農村人口大起大落的流動情況相似，只不過這次轉變的動因不再是受新的社會理想的驅動。農村改革的動因依然是為了使國家能夠從農村獲得足夠的剩餘產品，為國家現代經濟的發展——現在以四個現代化為名——提供資金。在毛時代，國家對農村的剝削是資本積累的主要途徑，在鄧小平時代，情況依然如此。但是，毛的繼承人清楚地意識到，由於日益增長的人口壓力和農業生產率的下降，現在的農業經濟提供不出國家必須的資金。因此，最根本的第一步，是要調動農民大幅度增加農業產量的積極性，為現代經濟發展籌措資金。用新的手段實現舊目的，就是在國家指導下使農村經濟商業化。

三中全會後，國家馬上採取措施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些措施包括大幅度提高國家對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定價，放開農村集貿市場，在毛主義的農業體系框架中，這些「調整」措施都不難實現——但中國的市場改革家的目標遠不止於此，他們認為，中國的真正問題恰恰在於毛主義的體制，而不只是一個簡單的體制運作方式問題。所

以，在1979年對政策進行調整的同時，為鄧小平改革出謀劃策的改革知識分子，對集體農業進行了全面公開的批判。

按照這種批判的說法，在1955年和1956的所謂「社會主義高潮」中，毛澤東忽視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的基本理論，在十分薄弱的經濟基礎上強行建立準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此外，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幹部對「中農」採取強制措施的現象十分普遍，打擊了農村中最有效率的生產者，使農業生產在二十多年時間裏停滯不前，從1950年代中期到1970後期，農民的人均收入基本上沒有提高，導致社會主義在多數農民心目中失去信譽。除了對集體農業從總體上進行批判外，過去曾大力宣傳的毛時代自力更生和社會平等的典型大寨大隊，現在被官方說成是「左傾」產物，大寨的領導人陳永貴也被從中央政治局除名。黨對大寨的批判，包括說大寨虛報生產數字、財務違規等，對於熟悉這個曾被廣泛宣傳學習的典型的歷史的人來說，似乎不足為憑。¹⁶

在批判集體化的同時，黨的理論家把鄧小平1956年提出的公式奉為經典，即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對立的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鄧的這一命題成為迄今為止經濟發展壓倒一切作法的根據，以使生產力與「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但是，對農業合作化的批判是對鄧這一公式的曲解，似乎只有退回到合作化前的社會組織形式，才有助於解決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明顯不相適應的矛盾，所以，他們提倡退回到家庭農業形式，認為建立在個體農民所有制基礎上的商業化資本主義體系，不僅更適合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而且能夠激活市場的能量，加快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1980年9月，中共中央推廣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正式開始在中國農村進行重大體制變革以發展資本主義。根據「責任」制，個體農民與生產隊簽訂關於使用隊裏一定數量的「集體」土地的合同，合同中規定農戶應將一部分產品交給生產隊，除用於上繳國家的稅收和定購的糧食外，其餘作為生產隊依然承擔的集體福利項目的開支。過去屬於集體的傢具和牲畜也都分給了農戶，農民們又開始了個體農業生產。除了上繳生產隊的部分外，農戶可以自由地在

這塊土地上做他想做的事，可以選擇任何方式處理他的剩餘產品。

雖然在早期有各種各樣的「責任制」試驗，一些地區的農民甚至自己作主分了土地，但直到1980年秋季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後，這種體制才迅速為各地所採用。儘管最初規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要本著自願的原則，並主要適用於集體化搞不下去的貧困地區，但實際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很快就成為強制性的，在1980年代初期就迅速在全國普及。地方農村黨員幹部生怕被當成「極左分子」而受到排擠，十分賣力地貫徹新政策（有時強迫不情願的農民執行），以顯示自己對鄧政權的政治忠誠。到1983年底，全國98%的農戶都採用了不同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1955–1956年的集體化運動十分相似，非集體化也是採取「一刀切」的方式完成的，這種作法曾被認為是左的錯誤，因地制宜的政策原則完全被置於腦後。

瑞斯金將最初取代集體農業經濟的體制稱為「生產隊和國家為地主的佃農制」，¹⁷這是十分貼切的。但是，佃農已不再是耕種著等份土地、彼此之間毫無差別的農民，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農村的發展，農民中的經濟與社會差別也以驚人的速度發展。造成新的社會經濟差別的情況十分複雜：首先，並不是所有在承包責任制下簽訂的合同都是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在政府關於發展專業戶和促進農村市場發育的政策鼓勵下，許多農民致力於從事有利可圖的行業，如種植經濟作物、搞糧食加工、開辦小工廠或修理店，還有一些農民把精力放在貿易和交通運輸領域中的各種新生意上；總的來說，比起那些依然守著土地、種植糧食和其他基本農產品的普通農戶來，這些所謂的「專業戶」和各種生意人日子要過得更好。第二，1983年，政府為了解決農戶缺乏勞動力的問題，特別是為了鼓勵那些雄心勃勃、有企業家經營頭腦的農民——他們是提供資金積累的大戶，允許出租承包的土地、僱用付薪的勞動力。隨著政府放寬並最終放棄對剝削的限制後，¹⁸新的二手承包人和僱工大量出現。那些擁有良好技能和經營頭腦、一有機會就全力施展的人，證明了鄧「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這句名言的真理性，這句話現在是日益增長的不平等現象的官方理論根據。

最後但也許是最重要的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別，是由於農村黨員幹部在新的商業化經濟中佔有特殊的有利條件。許多農村幹部最初堅決反對回到個體農業經濟，原因之一是他們擔心失去自己的權力和收入。然而，許多幹部很快就發現，他們的政治地位和影響是為自己謀取經濟利益的獨特法寶。許多黨員幹部在領導解散集體經濟的進程中，首先確保他們自己和親朋好友分到最好的土地和農機具。他們原來的政治關係有助於他們獲得緊缺的商品和物資，在越來越興旺的黑市中進行非法交易以謀取暴利。¹⁹

解散人民公社對原有集體企業的非集體化起了主要作用。1982年底通過的新憲法，把原來人民公社的行政職能移交給鄉鎮或縣政府，即中央政府的下屬基層部門。公社的政治權力被取消後，它原來行使的集體經濟和社會福利職能或是不復存在，或是轉入私人之手，由個人、家庭或一些人合夥經營，以賺錢為目的，²⁰甚至醫療和教育機構在農村商業化的浪潮中也未能幸免。到1980年代中期，農村許多地方出現了私人醫生和私人學校，只為能出得起錢的人服務。

中國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土地使用的私有化，儘管正式的所有者是誰這一問題一直懸而未決。個體農戶最初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通過與生產隊（集體化時期留下的一種農村組織結構）簽訂短期承包合同獲得土地，在法律上土地還是集體財產。為了消除農民關於新體制可能是臨時的這一擔心，使他們不致對土地進行掠奪式使用，1984年，政府頒佈政策，允許把土地的承包期延長到15年。很快，土地承包期又延長到50年，這就意味著在一般情況下土地可以由後面幾代人繼承。這在事實上是把土地推向了市場。承包的土地可以轉租、買賣和抵押，就好像是可完全轉讓的私有財產一樣。

1980年代初期，新的農業政策產生了引人注目的經濟成效。從1978年到1984年，農業總產值以每年平均9%的速度增長。²¹農村的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農民的人均收入在六年時間裏翻了一番，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主要表現在許多農民蓋上了新房，消費品購買力大幅度提高，飲食結構有了顯著改善。農業經濟發展的高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業經濟的市場化，從而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更主要的原

因)是1979年國家大幅度提高了糧食收購價格、放寬了此前對農業經濟施加的壓力,但是,這兩者都是在集體經濟的舊制度的體制框架內發生的。耐人尋味的是,農業生產高潮始於華國鋒政權時期的1978年(增長8.9%),1979年繼續增長(8.6%),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則是在1980年代初期以後才普遍實行的。²²但無論是什麼原因,也不論地區間發展還不平衡,鄧小平時代毫無疑問將被作為經濟發展最成功的時期載入中國農業歷史發展史冊。

然而,農業生產的進步卻未能一直持續。1985年,糧食產量突然大幅度下降,從前一年的4.7億公噸猛跌到3.39億公噸,在中國社會引起經濟和心理上的巨大震盪。這是自從大躍進以來糧食產量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令人回想起了饑荒年代的恐懼,也是在中國經濟越來越走向市場的情況下發生的糧食短缺和農產品價格的大幅度波動。對那些辛辛苦苦真正在農田耕作的農民來說,市場給他們的回報越來越少。這種狀況在許多農村地區又加劇了幹部和農民之間長期緊張的關係,幹部要完成國家的定購合同,他們常常在拿到農民糧食後只打一張「白條」代替現金。農民的稅收負擔過重,1980年代後期,腐敗的政府官員又發明名目繁多的收費項目攤派給農民,農民對幹部的抵觸情緒越來越深。無論如何,自從1985年後,農業生產陷於停滯狀態,勉強跟上相對比較低的人口生育率。

1980年代中期後,維持農民收入及部分農村地區繁榮局面的,不是由於農業產量或農業生產率的增長,而是以「鄉鎮企業」形式出現的農村工業的飛速發展。農村的工業化,是毛在大躍進時期實行的一項重要政策(第十二章已作了交待),它的目標是為了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充分利用農村的閒置資源。同時,農村工業化也是為了實現更宏偉的社會目標、特別是縮小城鄉差別的手段。毛時代的農村工業化是比較成功的。到1970年代中期,在採用比較原始技術的社辦工廠和隊辦工廠中就業的人數達到2800萬人,幾乎佔農村勞動力的十分之一;不過,直到市場改革時期,農村工業才真正成為中國經濟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在鄧小平政權的鼓勵和資金的湧動中——資金分別來自地方政府、私人資本、外國投資以及各種各樣的合作團體,各種門類和技術程度不等的農村工業企業,在數量和規模上以驚人的速度發

展。1980年代，鄉鎮企業的產值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長，在1980年代末的短暫緊縮後，1990年代又以年均30%的高速度發展。到1995年，在鄉鎮企業中就業的工人達到1.25億人，鄉鎮企業成為中國經濟中發展最快的部份。正是這些在鄉鎮企業中工作的農家子弟的工資（雖然很低），成為中國農村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

政府把鄉鎮企業界定為中國經濟中「集體企業」的一部分，鄉鎮企業成為集體企業（其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中的主力軍。然而，大多數農村的工廠企業的所有者和管理者都是個體資本家和當地政府，所有的企業都是建立在國內和國際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基礎上運行的。鄉鎮企業到底具備不具備人們說的社會主義性質是一個疑問——也許是一個至今還懸而未決的問題。²³

鄧小平時代的農村經濟政策付出了社會的和其他方面的代價——也為未來的發展製造了新的障礙。非集體化的消極後果之一是1980年代初期農村人口生育率大幅度增長。個體農業經濟使農民希望多生兒子，既為了以後地裏有勞動力幹活，也為了長遠的養兒防老。這是農民對非集體化和返回個體經濟的本能（也是十分傳統的）反映，但卻與政府出於經濟發展的考慮制定的獨生子女政策發生矛盾，政府的目標是到2000年，把人口規模穩定在12億。政府官員強制農民墮胎，絕望的農民溺死女嬰，無論如何要生個兒子，這是人類的悲劇。國家利益與農民個人利益的衝突造成了這種悲劇，而衝突本身則是政府自相矛盾的政策引起的。1985年，政府對獨生子女政策作了調整，實際上允許農村育齡夫婦可以有兩個孩子，緩和了政府與農民的緊張關係，但卻又破壞了在廿一世紀實現人口零增長的目標。

非集體化還損害了其他長期發展目標和規劃。由於分田到戶，使農村土地支離破碎，特別是在那些根據土地等級不同劃出相應比例進行分配的村莊裏，這種現象更為突出，導致許多地區無法使用大型農業機械進行耕作，嚴重地妨礙了中國農業機械化長遠目標的實現。此外，在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為主，由市場驅動的社會取代後，集體資金化為烏有，原來照顧農村老弱病殘的集體福利隨之萎縮。許多地區原有的大隊醫療診所先後關閉。農村學校的數量和質量都大幅度下降。由於家庭成了生產單位，農民需要把孩子留在家裏幫助幹活，學

生的人學率也下降了。沒有了公社和大隊，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從事大規模的公眾設施工程也變得十分困難，例如興修和維護水利灌溉工程和大壩。這是1998年華北和華中遭受特大洪水災害的原因之一。

非集體化也給中國的生態環境帶來了嚴重的影響。例如，由於各地農村都毫無計劃地大興土木蓋新房子，需要大量木材作為建築材料，亂砍濫伐森林（以及由此造成洪水氾濫）成為中國的一個嚴重問題。由於回到個體農業經濟，以及一些村莊相對比較富裕，農民把積蓄主要用於蓋房，大量佔用了可耕農田，使從1957年開始的可耕土地面積的減少已經到了警戒線。²⁴

集體組織的解體，當然也瓦解了農民曾有過的集體價值觀念，傳統的風俗、信仰、迷信和禮儀很快填補了意識形態的真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四個現代化旗幟下進行的「農村改革」，卻使最典型的「封建主義」思想得到復活，而鄧小平和他的市場改革理論家們，一直批判封建主義的歷史危害，認為它是導致毛時代的政治錯誤和經濟失誤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與這些舊思想舊觀念的復活相比，政府更擔心的則是農民在婚喪嫁娶方面的「鋪張浪費」——把本來可以用於改良土地、購買農業設備和保水保商的資金都揮霍一空。對農業缺乏長期投資，是自1985年後農業發展停滯不前、越來越依賴進口糧食的主要原因之一。

非集體化的最嚴重社會後果，是農村中經濟不平等的急劇發展，出現了新的農村階級差別。中國農村的的不平等現象一直就有，但在毛時代，這種不平等主要是地區差別，即由於歷史上形成的生態環境條件及其他差異造成相對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之間的差別，在同一地區內的經濟差別是很小的。²⁵在鄧小平的改革時代，地區間的差別日益擴大，特別是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的差別，使自毛時代就存在的這種現象更加嚴重。鄧時代的創新，是在同一村莊、鄉鎮和地方出現的富裕家庭和貧困家庭之間越來越大的明顯差別，進一步驗證了鄧小平「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預言。

率先致富的人所佔農村人口的比例並不大，但其絕對數量仍是一個龐大的數字，他們善於利用新的市場機制獲取利益。這種體制有利於有經濟頭腦、有野心、身體強壯、有技能、頭腦靈活的人以及勞動

力多的家庭，那些掌握政治權力或是有政治途徑的人在這種體制內更是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正是那些當地的黨員幹部，在拋棄了自己原有的社會主義思想的限制後，從集體財產私有化中謀取了最大的利益，為自己及親朋好友撈到最好的土地、掌握最有利可圖的經營項目。農村黨員幹部是農村新資產階級的核心，他們控制著各種不同種類的賺錢企業的經營。這個新階級包括的人有：較為成功的各式「專業戶」的帶頭人——他們採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付薪僱用勞力在自己的土地或工廠裏工作；各種服務業、商業和企業的老闆或承包人；鄉鎮企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掌握著鄉鎮企業的地方黨政官員，他們從事一切能賺錢的事，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新的二手土地小承包人，他們把土地轉手租給貧困農民，後者才是真正在田裏勞動的人。雖然這是一個複雜的階級，是一個由不同集團的成員組成的正在形成的農村資產階級，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基本點，即自己基本上不從事體力勞動，依靠剝削他人的勞動生存。這樣，在一個日益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環境中，他們承繼和延續了最古老的社會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

與農村新資產階級相對應的，是最古老的人數最多的農村社會階級——農民。農民中的約二億勞動力依然在田間耕作，大多數都是個體農戶。他們之間的收入和社會地位差別極大，從「新富裕農民」（主要是政府說的「專業戶」）到農村中連溫飽都難以維持的赤貧家庭。貧困農民被迫出售或抵押自己承包的土地，加入佃農和打工的行列，或是失業。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絕大多數人口依然生活在農村，但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越來越少。在毛時代後期，人民公社至少為農村絕大多數人口提供了起碼的社會福利，但是自19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散後，農村的約四億勞動力中有近一半是多餘勞動力。在新近商業化了的農業經濟條件下，這兩億農村勞動力已經無法依靠土地生活，其中一億人在迅速發展的鄉鎮企業和其他在農村的非農業企業中當工人，其餘的一億人（雖然人數隨經濟形勢的情況而波動）變成了新的遊民無產階級，一些人在農村打短工，還有一些人被迫走上犯罪道路，但大多數人最終成為到處打工的「流動人口」，他們從一個城市漂泊到

另一個城市，尋找任何他們能幹活的工作。他們住在貧民窟裏，拿著可憐的一點工資，幹的是建築工這一類令中國城市人看來是十分現代和繁榮的艱苦工作。

這樣，非集體化和市場經濟的迅速擴展使農村出現了新的社會結構，由四個差別日益明顯的社會群體組成：第一個群體包括各種商業和企業事實上的所有者組成的資產階級精英、地方黨政官員、職業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第二個群體是依然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他們的數量在減少，但人數仍然眾多；第三個群體是工薪階層，主要在鄉鎮企業工作，他們的人數越來越多；第四個群體是下層的流動勞動力。這種社會結構對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十分有利——也有助於傳統意義上的農民的消失。²⁶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雖然鼓勵農村經濟的商業化，並對其經濟成就感到歡欣鼓舞，但他們有時也考慮到（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重新實行農業生產的集體化問題。²⁷ 他們強調，農業生產的集體化，不能通過行政命令實現，而是「客觀經濟規律」和生產發展的自然結果。²⁸ 實際上，在1990年代中期，有來自北方一些省的報道說，農民們開始把村裏的財產收歸集體所有，重新走集體農業經濟的道路，這種作法顯然得到了政府的鼓勵。然而，很難想像市場經濟會自然地轉變成集體經濟，在現行的體制下，市場經濟正在人們之間產生著巨大的社會經濟差別，創造出了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在日益兩極分化的農村社會中，在越來越多的人受到競爭和市場觀念的薰陶的情況下，無論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地重新實行集體化，勢必要引起社會的暴力衝突。一個以社會安定和諧為驕傲、強烈批判毛的階級鬥爭理論的政權，又為不可避免地導致真正的階級鬥爭創造了社會條件，這無疑是最具有諷刺意義的事件了。

城市工業和勞動力的商品化

批准實行「市場調節」的三中全會剛一結束，鄧小平陣營中的經濟改革家就向這位最高領導人提交了關於如何用資本主義改造中國龐大、低效、技術落後的城市國有企業的具體建議。他們認為，至少在

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上，如果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不再由北京的中央計劃者決定，而是由「自由的」市場力量進行調節，會更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他們建議，把經濟決策權下放到各個企業，他們的經營活動將以盈利為目標，採取關停併轉的方式解決虧損企業的問題，後面這點以後沒有再強調。企業自由權意味著在國家的宏觀指導下，企業根據市場需要自主決定生產計劃、工資水平和產品價格，企業有權支配盈利部分(如果有的話)。此外，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是管理者有權根據市場條件和生產效率標準招收或解僱工人，當時稱為「打破鐵飯碗」，即是說，結束國家正式職工的終身工作制。改革家們稱，這樣做可以有效地解決出工不出力的現象，提高勞動生產率。²⁹

概括起來，這些就是1979年提出的對城市工業按資本主義模式進行改造建議的基本內容。鄧小平和其他黨的領導人對這一建議很感興趣，這當然不是他們欣賞資本主義，而是因為這種模式可以為民族利益服務。市場經濟能夠提高經濟效益，能加快中國實現「繁榮富強」的步伐。因此，1979年下半年，政府選擇了數千家企業作為試點，把它們作為自負盈虧的、有自主權的資本主義經濟單位，開始了市場模式的試驗。1980年代初期，這種做法進一步推廣，佔國家財政撥款總數16%的工廠和其他企業被納入這一計劃。³⁰

對工業進行這種資本主義式的初期改造未能持續很長時間。1980年代末期，由於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嚴重的財政和社會問題，政府被迫放棄了這一計劃。在前不久開始在農村和城市地區實行的市場取向的改革政策，導致了意料之外的嚴重通貨膨脹。儘管根據國際標準來看，官方宣佈的物價漲幅(根據官方有保留的數字，全國約為7%，城市偏高一些)並不算高，通貨膨脹震驚了三十多年來已經習慣了平穩物價的中國人。在毛時代的27年中，消費品物價平均每年上漲的幅度不超過0.5%。國家的財政赤字也到了警戒線，這對一直循規蹈矩地奉行財政平衡政策的中國政府構成極大壓力。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赤字，包括大幅度壓縮基本建設投資、關閉效益太差的工廠等，但這些措施反過來又加劇了長期性的城市失業問題，政府現在承認城市勞動力的失業率達20%以上。³¹

1980年，在政府全力對付通貨膨脹、失業和財政赤字時，它又面臨著重工業產值急劇下降的問題。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過分熱衷於糾正重工業生產與消費工業生產之間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是因為政府把重點放在企業的利潤指標上——但事實上基礎重工業在市場經濟中是不可能盈利的。1981年，根據官方數字，重工業產量下降了幾乎5%，但外國分析家的計算是在8%以上。³² 為了解決經濟危機，政府採取了被稱之為「重新調整」的政策，中央政府重新對價格、工資、投資和原材料分配實行嚴格的控制，實際上是在城市工業中又重新建立了「指令經濟」。在恢復了中央計劃體制後，工業生產回升。1983年，重工業產量增長了12.4%，輕工業只增長了8.7%。³³ 這種增長速度以及重工業與輕工業之間的比例，與毛澤東時代後期基本相同。

如上所述，1980年代初期，在對城市工業部門實行「重新調整」的同時，政府把注意力放到農業經濟的非集體化、促進對外貿易和在沿海地區大力吸收外資方面。不過，政府並沒有完全放棄把市場機制引入城市經濟的努力。在對城市工業實行中央計劃控制的同時，政府大力鼓勵私人 and 「集體」企業的發展，鼓勵外商在城市和經濟特區建立合資企業。在城市工業經濟中，迅速發展的非國有制企業的所有者和管理模式五花八門，但它們卻有一個基本的共同點：它們僱用的工人來自迅速擴大的勞動力自由市場。在「集體」企業中勞動的工人（從1981年到1983年，僱用的工人增長到700萬）和在新的私人企業中勞動的工人（在1980年代初期，僱用的工人從100萬增加到超過300萬），拿到的工資遠遠低於國有企業的工人，而且他們沒有國有企業職工享受的職業保障和福利保障（如醫療保障和退休金），企業老闆可以根據經濟發展情況，任意僱用或解僱這些工人。他們與鄉鎮企業以合同制形式僱用的為數更多的領取薪水的工人一起，構成了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的成員。在非集體化後，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成為流動勞動力，他們在城市之間漂泊，尋找他們能幹的臨時工作，從而使勞動力市場更加龐大。因此，雖然對城市工業進行大範圍改革的計劃暫時擱置，但在1980年代初期，「鐵飯碗」已經開始動搖，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改革者的基本目標之一。

1984年，隨著工業生產的穩定，加上受到農村改革成功的鼓舞，

政府又雄心勃勃地重新開始對城市工業進行資本主義改造。1984年初，鄧小平視察了深圳經濟特區，媒體對此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官方媒體稱，鄧宣佈深圳的改革是成功的，為中國城市改革樹立了榜樣。鄧的視察為城市改革提供了動力。隨後，政府制定了與1979改革計劃基本相似的改革方案，但這一次改革的廣度和深度都遠非當時可比，政府進行改革的熱情和決心也更大。

改革方案有三個主要部分：第一，制定和頒佈了企業盈利的主要資本主義原則，相應地，約有四十萬個國有企業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工資、價格和投資的自主權。至少在理論上，衡量這些企業的成敗就看其在市場中是盈利還是虧損。

第二，1984年改革方案的目標是建立普遍的勞動力市場。在過去五年時間裏，中國已經朝著建立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的方向發展。現在，鄧政權提出要「打破」國有企業固定工人手中的「鐵飯碗」（借用當時改革理論家的用語），1984年，國有企業職工佔中國產業工人階級人數的40%。然而，這種「改革」遭到了激烈的反對和尖銳的批評，不僅是直接受到改革影響的那些相對有特權的工人反對，而且相當多的黨內老幹部也表示反對，對他們來說，工人終身的職業保障是革命取得的偉大成就之一。最後，政府作出了妥協：已經進入國有企業的職工依然享受終身職業保障和各項福利，但對新入廠的職工將實行合同工制。在隨後幾年裏，各種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合同制形式紛紛出台，逐漸取代了日益不穩當的「鐵飯碗」。³⁴

1984年改革方案的第三部分是「價格改革」，三級價格結構取代了政府制定的官方價格的舊體制。關鍵的工業產品（如鋼鐵和石油）價格仍然由政府確定；允許其他工業產品價格在政府規定的範圍內上下浮動；絕大多數消費品和農產品價格不再由政府控制，允許根據市場行情自由浮動。

城市改革方案，伴隨著農業經濟的市場化，使中國進入一個動盪不定的五年期，一方面是工業經濟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另一方面是社會日益加劇的分裂。僅在1985年，本來就已十分龐大的工業經濟又增長了20%左右，城市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的工業發展的高速度持續到1980年代末期。雖然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但城市居民的總體生

活水平在1980年代持續提高，不過，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是由於1980年代初農村改革的成功（糧食和其他農產品成本相對較低），而不是因為城市工業的效益得到改進。³⁵無論原因是什麼，在鄧小平改革的第一個十年裏，城市工人的收入翻了一番多。人們的飲食結構也有明顯的改進，特別是肉類消費數量持續增加，衣服的数量、款式和質量也得到改進。家庭消費的大件，如彩色電視機、縫紉機和電冰箱，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增加了一倍，到處是大興土木的場面，城市居住環境日益改變。

物質進步是真實的，而且當然地受到了中國人民的衷心歡迎，但是，伴隨著這種進步的，還有反覆出現的社會和心理的震蕩。繁榮和蕭條（官方術語是「過熱」和「緊縮」）的交替出現，頻率加快而程度加深，給城市居民帶來困苦和恐慌。特別是自從1985年實行「價格改革」後，在繁榮階段後繼之而來的通貨膨脹造成的蕭條周期性地出現。到1989年上半年，官方承認的通貨膨脹率每年高達25%，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通貨膨脹率還要更高。已經飽受桀驁不馴的市場力量衝擊的勞動群眾，對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日甚一日的巨大不平等感到震驚。在有錢的企業精英和從「自由市場經濟」中千方百計謀取私利的官僚（他們越來越肆無忌憚地在充滿奢侈品店和夜總會的城市公開炫耀自己的財富）和那些居住在貧民窟裏靠到處打工謀生的遊民無產階級之間，其貧富差別之懸殊，與資本主義世界的任何大城市相比都不遜色。幹部的嚴重腐敗行為使民眾感到恐慌和憤怒，從高層到中下層的各級黨政官員，運用他們手中的政治權力操縱市場經濟，（與他們的親朋好友一起）率先致富。

* * *

1980年代後半期，中國經濟經歷了一連串的繁榮和蕭條的週期波動，城市人民遭受著與典型的資本主義早期時代相似的痛苦和不安。工業生產增長率依然很高，但通貨膨脹率和政府的財政赤字率也同樣高。在鄧小平時代第一個十年的後期，雖然官方的目標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很少有人懷疑，在中國城市中已經形成了基本的

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建立了勞動力的自由市場，還捧著「鐵飯碗」的工人數量越來越少；政府放開了對大多數商品價格的行政干預，商品價格根據市場環境自由浮動；大多數企業按照資本主義的盈利原則進行運作。缺少的只不過是正式由法律確認的財產私有制。但是，即使中國從根本上變成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它也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我們將扼要地概括其典型特徵。

官僚資本主義

所謂官僚資本主義，就是使用政治權力和影響、通過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方式謀取私利的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歷史上並不罕見，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歷史中，它都曾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於許多社會之中。在中國歷史上當然也並不鮮見。有權勢的官僚與依附的資產階級為在商業和經濟活動中謀取利益而狼狽為奸，是二千多年封建時期的中國社會和經濟的一個顯明特點。³⁶在現代歷史上，1930年代和1940年代，資產階級依附於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高官，就是現代世界歷史中典型的官僚資本主義例子之一。³⁷

然而，共產黨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的起源卻是非常獨特的。在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官僚資本主義是在經過了一個長期的準社會主義時期後出現的。在這段時期裏，作為一個有社會功能的中國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如我們在第六章中談到的，到1950年代中期，中國資產階級（當時用的術語是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所餘資產已為共產黨國家贖買，這個階級的成員只不過是一小批日益年邁的養老金領取者，靠不可繼承的國家債券的有限紅利為生。這個垂死階級日益減少的成員，由於人數太少、年齡過大，承擔不了鄧小平的市場改革所需要的資產階級的角色。所以，創造一個市場經濟所必須的資本主義階級的任務，便由共產黨國家承擔起來。在這個資產階級早被消滅了的國家裏，資本主義行為長期以來聲名狼藉並受到壓制，因此，新資產階級最合適的候選人，非日益膨脹的共產黨官僚機構的官員莫屬。

其中不少、也許黨的多數官僚最初對鄧小平的市場政策持反對的或最多是模稜兩可的態度。把經濟權力從國家和集體組織手中轉交給

家庭和私人老闆，似乎對官僚的權力、地位和收入構成威脅。市場經濟與共產黨領導人習慣的（許多人依然堅信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和共產主義目標難以相容。這是一種十分罕見的現象：官僚自身的利益與社會主義原則似乎完全一致。

然而，不管自己有什麼保留意見，官僚們履行著他們的職責，在「改革」和「四個現代化」的旗幟下，貫徹中央和國務院的政策。不久，幹部和官員們就發現，在市場經濟提供的為個人牟利的機會中——實際上取代資產階級留下的空位，他們佔據著獨一無二的有利政治位置。許多官員迫不及待填補了這個社會空白，最先幹上這一行的是人已中年的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子女，包括鄧小平和總理趙紫陽的孩子，他們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充當最能賺錢的買辦，主要活動於沿海城市 and 經濟特區，在外國資本和中國市場之間牽線搭橋，通過促成外國公司和國家貿易機構的生意，接受數目可觀的佣金。他們從有影響的掮客作起，很快就成立了自己的進出口公司，一些人以此為基礎，與國際金融組織和投資銀行建立了聯繫，並與香港和其他地方的龐大的資本主義跨國公司建立了關係。他們利用自己家庭的政治權力和影響獵取的財富，一部分無疑用於個人花天酒地的生活和海外投資，但他們把積累的大部分資金又投入到國內市場以牟取更大的利潤，為中國經濟在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的高速增長提供了資金幫助。人們把這些有經營頭腦、貪得無厭的共產黨統治精英的子女稱為「太子黨」，他們是1980年代後期共產黨官僚機構中普遍出現的奸商和腐敗的最典型的象徵，引起人民群眾對鄧小平政權的普遍不滿，1989年的民主運動中就是這種不滿情緒在政治上的反映。

農村的地方黨員幹部也感受到手中的政治權力和影響能為自己帶來個人財富。雖然大多數幹部在開始時反對農業的非集體化，一方面是因為意識形態的信念，另一方面也是擔心自己失去權力和收入，現在，他們中許多人感謝鄧小平使農業經濟商業化的政策。因為解散集體組織、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地方幹部有權決定讓誰在土地承包和集體財產私有化中獲利。因此，在農村的多數地區，最好的土地和經營有利可圖的企業的權利，都由黨的幹部和他們親朋好友獲得。³⁸ 他們常常成為有錢的「專業戶」的帶頭人或保護人；他們擁有著

建築豪華住宅的土地和建築材料；他們（以及親朋好友）在作生意、創辦和經營工廠企業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簡言之，黨政幹部和他們的親戚成為新的農村資產階級中最醒目的成員。

1980年代初期，隨著農村主要由官僚成分組成的農村資產階級的形成，政府的市場取向政策，特別是在1984年重新開始工業改革後的政策，也同樣有利於那些有著強烈金錢慾望和野心的城市官僚。價格改革提供了賺錢的絕好機會，它允許多種商品價格隨著市場條件浮動——但還保持著平行的政府價格體系。這在實際上使黑市合法化，為官僚們致富提供了最普通、最簡單的手段——掌握相應權力的政府官員以較低的國家定價購買商品和物資，然後再拿到市場上以高出幾倍的價格售出。

1984年後，政府積極推進城市改革，鼓勵個人和家庭建立私人企業，也給城市官僚創造了牟利的機會。雖然直到1990年代後，黨政官員搖身變為私人資本家——當時把這種現象稱為「下海」——才成為普遍現象，但在1980年代，黨政官員充當由其親朋好友經營的企業的保護傘的現象已屢見不鮮，這些企業的最初資本通常就是由官員自己提供的，做生意需要官僚的保護傘，官僚想致富也要進一步開拓生意。一些官員實際上就是這些賺錢企業的所有者，但打的旗號卻是官方所謂的「集體所有制」。1985年後趙紫陽總理的「沿海戰略」，使中央放鬆了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控制，鼓勵了地方主義，特別是在沿海地區和長江三角洲一帶，³⁹為官員致富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更多機會。

這樣，在1980年代中期，新城市資產階級逐漸形成，新階級的組成，除了官僚資本家外，還包括人數迅速增長的大小私營企業主、國家、「集體」和個體企業的管理和技術人員。這是一個其成員還沒有自覺意識到自己共同階級利益的龐大複雜的社會團體，並將會繼續如此。然而，他們在社會和經濟意義上已經明顯區別於絕大多數城市人民——工廠和商業企業的工薪階層、中下層政府職員、小生意人和流動勞動力。但是，儘管新資產階級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階級意識，但他們享受紙醉金迷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胃口卻越來越大。僅僅是他們對奢侈生活的追求這一點，就足以使他們完全與中國社會其他階

級區別開來——他們盡情享受著豪華的賓館飯店和夜總會，擁有新的豪華住宅，在林林總總的專賣店中一擲千金，這使中國在國際貿易圈中獲得了世界上奢侈品消費增長最快的市場的名聲。今天中國城市的貧富懸殊，與大多數西方和第三世界資本主義大都市一樣巨大，而且最為耀眼。鄧小平政權提倡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無疑是超額實現了。

在人民共和國，官僚資本主義的特點之一，是不只有官員個人或官員集體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經營或贊助私人盈利企業，而且是整個官僚機構本身，無論其是否情願，都捲入了市場，行使著資本主義企業的必要功能。由於中央政府大幅度削減財政支出，從小學到秘密警察部門的各種國家機構，都紛紛開辦公司或其他經濟實體——從小商店到生產出口產品的大型工廠，從居民區的小飯館到接待外國人和旅遊者的豪華賓館。下海經商大潮中的最大奇觀是人民解放軍成為國際貿易和金融的主力軍，除了生產和出口武器外，軍隊還開辦了許多民用品企業，經營著二萬多家工業、商貿和服務業的企業或公司。⁴⁰

* * *

在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如此迅速成長的市場經濟的政治含義是什麼？當然，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民主在西方是不可分割的，自由市場不但產生經濟奇跡，而且還導致政治自由。著名的英國政治經濟學家和中國研究專家、已故的戈登·懷特(Gordon White)曾預言，後毛時代中國的市場改革的長遠結果，將是「社會經濟的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進程。⁴¹然而，人們只要看一下現代歷史發展的記錄就不難發現，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⁴²資本主義可以與包括法西斯政權在內的各種各樣的政權和諧共存。實際上，後期資本主義工業化潮流總是跟隨著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稱之為「保守的現代化」的社會政治道路，明治時期的日本與卑斯麥(Otto von Bismarck)時代的德國就是明證，資本主義現代化也同樣可能導致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結果。⁴³

不過，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一個充滿活力和獨立的資產階級、特

別是一個與現存政治制度有著利益衝突的資產階級，是議會民主不可缺少的成分，正如摩爾的總結：「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⁴⁴ 如果說這一事實就是現代歷史留下的經驗，那麼這一經驗在中國並不適用。當代中國的資產階級與西方國家經典的資產階級不同，「後毛主義」的中國資產階級雖然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資產階級，但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它是由共產黨國家創造出來的階級。這個階級主要的成分是共產黨幹部及其親朋好友，他們佔據著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利用市場創造的新機會謀取財富。這個階級只有依附於共產黨國家才能發揮其經濟職能，它的成員需要國家的政治保護以免遭受工人階級和自由工會的侵犯。一句話，它是一個不具備民主素質的資產階級。對中國共產黨的專政構成嚴重威脅的，與其說是來自國家扶持的資本主義的受益人，不如說可能來自這種資本主義的受害者。在下一章中將對此作進一步的分析，追溯從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期鄧小平時代結束這段時間的中國政治歷史。

註釋

1.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26。
2. 關於十九世紀市場社會和市場觀念在英國的發展歷史，參見波拉尼（Karl Polanyi）的經典研究著作，《大轉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3. 瑞斯金，〈中國的市場、毛主義和經濟改革〉（“Market, Maoism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賽爾登和利皮特主編，《中國的社會主義過渡》，頁318。
4. 例如，胡喬木在〈遵循經濟規律，加快四化建設〉的講話中就引用了列寧的這段話。參見《北京周刊》，1978年11月10日，頁10-11。
5.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
6. 參見本書第24章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扼要討論。
7. 瑞斯金，《中國的政治經濟》，表14.1，頁355。
8. 1979年7月薛暮橋接受電台採訪的談話。引自加塞德，《復活：毛後的中國》，頁358。

9. 參見賽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
10. 關於人民共和國與普魯士的比較，參見德克爾斯 (Wolfgang Deckers) 頗有見地的文章〈毛澤東和弗裏德里克·利斯特有關脫鈎的比較〉(“Mao Zedong and Friedrich List on De-Linking”)，《現代亞洲雜誌》(*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第24卷第2期(1994年)，頁217-226。
11. 瑞斯金，《中國的政治經濟》，表9.1，頁208。
12. 有關經濟特區的產生和早期歷史的精彩扼要敘述，參見何漢理，《中國的第二場革命》(*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頁163-171；關於對特區的出色評論，參見佩珀，〈中國的經濟特區：拯救蹣跚的改革的一劑藥方〉(“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he Current Rescue Bid for a Faltering Experiment”)，文章是1986年提交的大學研究報告，刊印於《亞洲研究學術公報》(*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第20卷，第3期(1988年)，頁1-10。
13. 《每日中國消息》(*China Daily News*)，1989年4月21日，頁1，1995年1月9日，頁1。1996年，外國投資增加到400億美元，1997年也是400億美元。又見《華爾街日報》，1997年12月15日，頁A10。
14. 1995年，中國的人均外債大約為1000美元。相比之下。墨西哥的人均外債約為1.7萬美元，巴西為9000美元，匈牙利為3.1萬美元，波蘭為1.1萬美元。世界銀行，《經濟發展趨勢，1996年》(*Trend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7)。數字引自該書頁60、109-110、236-237、430-431上的統計表。
15. 雷斯 (Simon Leys)，一位對毛主義持批評態度的學者，認為中國人迷戀西方的東西是一種「不健康的心態」，他的結論是：「(民族自信心是) (毛) 政權取得的最積極的成果之一，卻受到了這樣的挫折，令人悲傷。」《紐約時報》，1979年1月3日評論版。
16. 關於大寨在毛和鄧時代的實際歷史，有許多深入的第一手研究著述，例如，參見譚讜、白瑞琪 (Marc J. Blecher)、米歇爾·邁斯納 (Mitchell Meisner)，〈昔陽縣的組織、增長與平等〉(“Organization, Growth and Equality in Xiyang County”)，《現代中國》(*Modern China*)，1979年4月，頁139-186；譚讜等，《國家農業政策：大寨榜樣與後毛時代的變革》(“National Agricultural Policy: The Dazhai Model and Local Change in the Post Mao Era”)，載賽爾登和利皮特主編，《中國的社會主義過渡》，頁266-299；譚讜，〈農業承包責任制：在昔陽與大寨的實行〉(“The

-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Agriculture: Its Implication in Xiyang and Dazhai”），《現代中國》，1982年1月，頁41–103；韓丁，《翻身》。
17. 瑞斯金，《中國的政治經濟》，頁288。
 18. 1987年，所有對私人企業僱傭工人的數量限制均被取消。
 19. 例如，參見陳佩華 (Anita Chan)、趙文詞 (Richard Madsen)、安戈 (Jonathan Unger)，《陳村：毛中國的農民共產主義歷史》(*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頁265–284。
 20. 關於非集體化，參見維維恩·舒在〈人民公社的命運〉(“The Fate of the Commune”)一文中頗有見地的分析，《現代中國》，1984年7月第3期，頁259–283。
 21. 沃克 (Kenneth R. Walker)，〈調整時期的中國農業，1979–1983〉(“Chinese Agri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Readjustment, 1979–1983”)，《中國季刊》，1984年12月第100期，表1，頁803；瑞斯金，《中國的政治經濟》，表12.1，頁291。
 22. 正如一些觀察家所指出，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建設的大規模灌溉、洪水控制和技術基礎設施，就不可能有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的農業大豐收。參見瑞斯金，《中國的政治經濟》，第296頁；韓丁，〈鳳陽之行：中國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調查〉(“A Trip to Fengyang County: Investigating China's New Family Contract System”)，《每月評論》，1983年11月第6期，頁14。
 23. 參見麻省理工學院崔之元 (Cui Zhiyuan) 教授的研究成果，崔之元認為鄉鎮企業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並對此作了清晰的有說服力的論證，例如，他的論文〈中國農村的工業化：靈活的專業化、默比烏斯 (Moebius-Strip Ownership) 的所有制和蒲魯東 (Proudhonian) 的社會主義〉(芝加哥大學研究論文，未正式發表)。有關河南農村最近的集體化和民主化情況，參見崔之元編輯的《從專制體制到民主體制的合作化：中國縣鄉級政治體制改革》(*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ressurized System to The Democratic System of Cooperation: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at the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s*,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1998)。
 24. 根據官方統計數字，從1949年到1992年，中國的可耕地面積下降了15%。一些國外學者認為實際下降數可能更高，參見斯米爾 (Vaclav

- Smil)，《中國的環境危機》(*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3)，頁57-58。
25. 關於毛時代晚期的平均主義和不平等現象，參見瑞斯金，《中國的政治經濟》，頁223-256。
 26. 在這一點上，中國加入了世界潮流。關於「農民的滅亡」，參見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在《極端時代：世界歷史1914-1991》(*The Age of Extrem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 一書中饒有趣味的探討。
 27. 例如，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在1982年召開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曾這樣預言過。1982年9月13日《北京周刊》，第37期，頁18-19。
 28. 例如，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當前中國的主要任務》(*Fundamental Issues in Present-Day China*, Beij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87)，頁53-58。
 29. 例如，參見卡恩 (Joseph Kahn) 發表於1995年3月10日《華爾街日報》A1和A4版的報道。
 30. 有關這個時期對工業企業進行調整的具體情況，參見埃德蒙·李 (Edmund Lee)，〈毛之後的中國的經濟改革：知情人的評說〉(“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An Insider's View”)，《當代亞洲研究報告》(*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983年1-2月，第15卷，第1期，頁16-25；菲爾德 (Robert Michael Field)，〈1978年後中國工業的變革〉(“Changes in Chinese Industry since 1978”)，《中國季刊》，1984年12月，第100期，頁742-761。
 31. 老資格的軍隊將領、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一次講話中說，1979年城市的失業工人約有2000萬。香港《明報》於1979年6月14日登載了這個講話。中國城市的失業問題自1950年代就已成爲周期性的問題，只不過官方未予以承認。在鄧小平時代，由於大批知青返回城市以及虧損企業的關閉，使失業問題更加嚴重。
 32. 蘇黛瑞 (Dorothy J. Solinger)，〈第五屆全國人大與決策過程：改革、調整和反對〉(“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Reform, Readjustment, and Opposition”)，《亞洲研究》(*Asian Survey*)，1982年12月，第22卷，第12期，頁1263。
 33. 國家統計局，〈1983年國民經濟計劃完成公報〉，《北京周刊》，1984年4月第14期，頁20-24。

34. 有關複雜的企業合同工形式的研究，參見白瑞琪和維維恩·舒，《被困住的鹿：中國縣級政府與改革》(*Tethered Deer: Government and Economy in a Chinese Coun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頁109–121。該書通過對中國河北省一個縣的調查，深入探討了這一問題，頗有見地。
35. 正如瑞斯金在《中國的政治經濟》中所論的，見頁372。
36. 白樂日 (Etienne Balazs) 在《中國的文明與官僚》(*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一書中對中國傳統的官僚資本主義的運作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參見該書頁1–4。《中華帝國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第3章。
37. 有關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的文獻很多。有關的英文著作，參見易勞逸 (Lloyd E. Eastman)，《流產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1937》(*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易勞逸，《毀滅的根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9》(*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柯博文 (Parks M. Coble)，《上海資產階級與國民政府1927–1937》(*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0)；白潔兒 (Marie-Claire Bergere)，《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歲月1911–1937》(*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38. 學者對廣東省一個村莊的跟蹤研究提供了極有說服力的例證，該村的黨支部非集體化中獲取了全村最好的土地和傢具，參見陳佩華、趙文詞、戈格，《陳村：毛中國的農民共產主義歷史》，頁265–284。
39. 關於趙紫陽任總理及其短暫的總書記生涯，參見第24章。
40. 有關例證，參見海耶 (Eric Hyer)，〈中國的軍火商：指令利潤〉(“China’s Arm Merchants: Profits in Command”)，《中國季刊》，1992年12月，第132期，頁1101–1118。1998年7月，黨總書記江澤民下令人民解放軍與經商徹底脫鉤。對這一命令能否真正貫徹，人們普遍持懷疑態度。參見裴覺世 (Seth Faison)，〈中國開始解開軍隊–工業之結〉(“China Moving to Untie Its Military-Industrial Knot”)，1998年7月28日《紐約時報》A1版。

41. 戈登·懷特 (Gordon White) , 《騎虎難下：後毛時代的中國經濟改革中的政治》(*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頁256。
42. 對這一複雜問題的深入分析, 參見伍德 (Ellen Meiksins Wood) , 《民主與資本主義》(*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43. 巴林頓·摩爾 (Barrington Moore) , 《專政與民主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 特別是第5、8章。
44. 前揭書, 頁418。

爭取民主的鬥爭

從1978年12月在三中全會上的勝利到1994年初——此時這位90歲的元老因太虛弱而不再公開露面——這段時期裏，鄧小平是中國無可爭議的「最高領導人」。換句話說，他是列寧式的黨和國的獨裁者和所有重大決定的最終仲裁者。

然而，在鄧小平統治中國的15年裏，與其前任不同的是，他從未謀求獲得與實際權力相匹配的最高政治頭銜。實際上，他挑選他的下屬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第一位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下屬是胡耀邦(1915-1989)。胡耀邦於1930年參加紅軍，時年15歲；作為長征的幸存者，他與鄧小平在長期的內戰歲月中建立了政治關係，他是鄧小平指揮的共產黨第二野戰軍下的一位政治委員。1949年後，他的政治生涯隨著其上司的命運而起伏。1980年，毛澤東的首位繼承人華國鋒被迫放棄了權力(隨後又放棄了頭銜)後，鄧小平選擇胡耀邦擔任重新恢復的總書記一職，即中國共產黨形式上的領導人，毛澤東長期擔任的黨主席一職也隨之不復存在。

胡耀邦是列寧式政黨中為數不多的提倡民主價值觀和民主程序的領導人之一。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有關自由理論的影響下，胡耀邦在鄧時代為毛時代受政治迫害、特別是在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的「平反」中起了關鍵作用。在最高領導人周期性(但卻是短命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特別是在1983-84年反對「精神污染」的運動中，胡耀邦雖然也受鄧小平的政策和偏好的左右，但他還是盡其所能地保護知識分子。1980年代初期，通過民主馬克思

主義者、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王若水、以報告文學見長的記者劉賓雁等人的努力，這家官方報紙曾一度提倡民主、揭露官員腐敗問題，在這期間，胡耀邦是《人民日報》的默默保護者。胡耀邦做的這些未必能使他贏得他所尋求的群眾的支持，但至少使他得到了許多知識分子和學生真誠的尊重。趙紫陽(1919-2005)是鄧小平選擇的另一位接班人，在其政治生涯結束之際，意外的事變使他扮演了類似殉道者的角色，若非如此，他遠不如胡那樣受到廣泛的尊敬。趙是湖南一個鄉紳的兒子，1930年代中期，當他還是一個少年時便參加了共產主義運動，在內戰的最後十餘年裏一直在紅軍裏做政治工作。如同這一代革命者中其他較優秀成員一樣，1949年後，趙在革命後的官僚體制中獲迅速擢升，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一度被罷黜。但當毛在1972年開始重建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粉碎了的黨時，趙恢復了他作為廣東省委書記的職務，隨後，他在廣東小心翼翼地幫助了以「李一哲」三個縮寫字而聞名的民運人士。¹然而，在1970年代後期趙所以引起鄧小平的注意，並非是他充當了青年民運人士的保護者的作用，而是他在當四川省書記時推行的市場取向的改革政策。1980年，鄧小平把趙紫陽調進北京，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曾長期擔任過的職務。身居要職的趙紫陽是鄧小平對中國農業和工業進行資本主義改造的政策、特別是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開放」政策的最積極、最有效率的執行人。

1985年，中國既感受到市場經濟帶來的經濟活力，也感受到其造成的社會負面作用。工業、商業和對外貿易處於典型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繁榮-蕭條」循環圈中的繁榮階段。僅1985年一年，工業生產增長率達到令人不可思議的20%，但是，與此同時，許多人感受到了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痛苦後果。1985年上半年，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通貨膨脹的爆發使居民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升了30%，普通城市居民、特別是工廠工人和政府下層職員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此外，隨著貨幣和商品的迅速增加，官僚腐敗現象也越來越嚴重——群眾對幹部腐敗現象的憎恨情緒更是日益高漲，揭露出來的一些特大腐敗案件進一步激化了群眾的情緒。²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在越來越商業化的農業經濟中，由於穀賤傷農，很多農民不種糧食，轉而種植有

利可圖的經濟作物，導致1985年糧食產量意外地大幅度下跌。糧食產量下降在經濟上、更在心理和政治上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強烈的衝擊，這也是1980年代後半期中國社會焦躁和不安的原因之一。事實上，許多中國人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歷史，都感到1985年是一個分水嶺，正是在這一年，疑慮和悲觀情緒取代了鄧小平時代初期的希望和樂觀情緒，³ 鄧小平的個人威望開始下降——到1989年初，這位曾享有崇高威望的領袖和改革時代的開拓者，成為城市群眾愚弄和嘲笑的对象。⁴

黨的最高領導層內對市場化的步伐和社會影響也產生了分歧，這種分歧集中表現為鄧小平與老資格的經濟計劃決策者陳雲之間的緊張關係。陳雲主張市場力量只能作為一種輔助因素。陳雲成為那些維護國有工業和中央計劃體制的官僚部門的主要代言人。無論如何，日益混亂的經濟形勢——用當時的話說，就是經濟「過熱」，迫使政府在1985年下半年實行緊縮政策，導致工廠關閉，工人失業。

然而，鄧小平、特別是趙紫陽繼續推進資本主義改造計劃。1986年，趙提出了他的「沿海戰略」，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太平洋沿海，即從東三省、山東到南方的廣東等地，大力加強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的工作。他還主張擴大經濟特區的範圍，讓工廠和其他企業作為獨立經營單位，自負盈虧，即企業實際上要按照最盈利的資本主義原則進行生產活動。政府重新強調打破以「鐵飯碗」而聞名的職業保障體系，以創造更完全的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事實上，一些與趙有密切聯繫的改革推動者，力主建立「勞動後備大軍」，就是說，始終保留一支失業工人大軍，在需要的時候廉價僱用，不需要時立刻解僱。

* * *

鄧時代的歷史與毛時代的情況相同，相對的思想和政治解放時期與政治鎮壓時期呈現出周期性的交替。1986年春季，為了紀念毛的「雙百方針」發表30週年，鄧小平時代出現了一個政治上相對寬鬆、思想上相對活躍、強調有必要進行「政治改革」的時期。一些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此作出了積極的反應，他們把重點放在馬克思主義理

論中非正統的觀點上，並且指出，理論要隨著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而發展前進，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出發點。理論界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對馬克思的異化理論 (concept of alienation) 進行了熱烈的爭論，把異化理論作為分析新中國社會與政治現實的思想武器。對異化理論的討論，在後來的反對「精神污染」運動中受到批判。以「異化學派」理論家而聞名的原《人民日報》總編輯王若水，在反對精污染的運動中被撤銷了職務。1986年夏季，他在上海的一份報紙上發表了〈論馬克思主義人的哲學〉的文章，與他在異化理論爭論初期的其他文章一樣，他在這篇文章中主要強調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關於民主和人道主義的思想。

1986年11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進行基層人大代表民主選舉的法律，這可以說是對鄧小平提倡的「政治改革」的具體(但有限)的回應。對這一選舉法的第一個考驗、也是對鄧小平政權民主誠意的考驗，來自位於省會城市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校園。科技大學是一所重點高校，在文化大革命中從北京遷到相對安靜的合肥市(安徽省會)，此後便一直在合肥。

這所學校招生要求很高，很多學生是高級幹部或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女。1986年12月5日，3000名大學生就地方選舉中缺乏對候選人的真正選擇舉行了抗議活動。大學生的民主要求得到了時任學校副校長、著名的天文物理學家方勵之以及許多與總書記胡耀邦有密切聯繫的知識分子的公開支持。在持續的抗議活動中，涉及到的問題越來越廣泛，包括對日本的民族憎恨情緒。在紀念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爆發50週年時，反日情緒達到高潮。在「一二·九運動」中，為了反對蔣介石對日本侵略實行的不抵抗政策，老一代的大學生發動了抗議活動。⁵

1986年的學生民主運動很快從合肥市擴大到長江中下游的十幾所城市，12月20日，上海市5萬名學生在市中心的人民廣場集會舉行抗議活動，並與警察發生了一些規模不大的衝突。此時，鄧小平以及其他支持他的、已經退休但依然有影響的黨的領導人已決意要制止大學生的民主運動。學生已經開始得到上海和其他城市中工人(雖然人數不多)的支持，他們與胡耀邦陣營中的某些民主知識分子似乎也有聯繫。

整個運動已超出了共產黨組織的控制範圍，實際上，運動本身就是對黨的控制的反抗。學生運動的勢頭使官方聯想到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景象，並通過媒體譴責學生運動。各大城市當局受命採取措施，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大。在政府進行鎮壓的威脅下，加上馬上要進行學期考試，學生運動在1987年1月基本上平息下來。然而，官方還是採取了報復措施。雖然為數不多的被捕學生不久就被釋放——據說他們是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欺騙，但在運動中被捕的工人依然被以各種罪名、包括「反革命」罪關在監獄。官方又開始了新一輪針對知識分子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這是鄧小平時代的第三次這類運動。方勵之被開除黨籍，撤銷了科技大學副校長職務。致力於揭露黨內腐敗現象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也成了黨的敵人，被清除出《人民日報》社，同時，又第二次被開除黨籍。⁶

但是，這場反自由化運動的最大犧牲者是胡耀邦。1987年1月，他被免去了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一職。早在數月前，鄧小平就已決定撤銷胡的總書記職務，其中部分原因，是因為胡為限制高幹子女的腐敗現象而採取的措施及胡與民主知識分子的連繫，激怒了老一代黨的領導人。原計劃是在1987年秋季召開的中共十三大上，根據黨的有關規定正式解除胡的職務，但時間表不得不提前了，作為對1986-1987年的學生抗議活動的反應，以非正常程序解除了胡的職務。胡被指責放鬆了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被迫承擔了動亂的全部責任。解除胡的職務是作為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宣佈的，但中央政治局實際並沒有開會，是鄧小平在與一批黨的領導人——後來被稱為「老人幫」——的非正式會議上決定的。野心勃勃的趙紫陽總理可能出席了這次會議，雖然他後來否認自己與胡的下台有任何關係；無論如何，趙是這一事件政治上的最大受益者。1987年1月，他接替胡被任命為中共中央代總書記，在同年秋召開的黨的十三大上，他正式就任總書記一職。胡耀邦還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地位，而且還是六名中央常委之一，但他已失去了權力和影響。李鵬接替趙擔任了國務院總理，他是一個曾在蘇聯學習過的工程師，適應既存的「黨-國家」官僚體制的風格。作為一個技術官僚，李鵬只是一個執行者而不是政策制定者，因而是忠實執行鄧小平命令的合適人選。

* * *

在趙紫陽擔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期間，資本主義的步伐明顯加快。在趙為促進出口型經濟而提出的「沿海戰略」指導下，對外貿易蓬勃發展，各項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相繼出台。典型的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迅速形成。「價格改革」進一步推進，越來越多的商品價格完全由市場決定。外資的大量流入、房地產市場的迅速發展、由易於為人操縱的「市場力量」來決定商品價格——所有這些發展都為官商和官員致富創造了新的絕好機會。

然而趙紫陽仍然感到有必要強調社會主義目標。因此，對所有人都再清楚不過的正在朝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體制，在官方那裏成了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批與趙和鄧有聯繫的知識分子，紛紛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為這一政權的市場政策的合理性進行論證。他們從馬克思的原著中發掘有關馬克思稱讚資本主義經濟的活力及其歷史進步意義的論述，反覆強調鄧小平在1956年提出的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按照這一公式，可以選擇任何能夠促進現代經濟迅速發展的方式，而不必考慮這種方式可能帶來什麼樣的直接社會後果。他們為趙紫陽發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使其成為當時的主要理論建樹。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主要點是，由於生產資料「公有制」佔主導地位和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所以中國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這兩條所謂的社會主義原則本身當然就是虛構的，而且它現在脫離社會現實的程度更甚於毛澤東時期。根據鄧小平理論的定義，中國是社會主義——但因為經濟上依然處於落後狀態，因此是不成熟的社會主義。只有在現代生產力發展到足夠高的水平後，才能實現發達的社會主義，但是這需要時間，實際上需要大半個世紀。⁷ 與此同時，要運用一切可能的有效方式，把所有的力量都完全投入到實現經濟現代化的目標上。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被用來論證使用資本主義方式的合理性。這一理論不無道理地設想，在有利的政治和國際環境中，市場經濟為迅速實現經濟現代化提供了最好的機會——因此也是奠定發達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須的物質基礎的最有效的方式。然而，「發達」社會主

義被設定在遙遠的未來，人們很難看出它與生活在現在的人所作的努力有什麼聯繫。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尚未出生的後代人的任務和目標，因此對生活在此時此地的人來說，它不過是一個超越想像的彼岸事物。此外，由於理想社會的實現被無限推遲，所謂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已經毫無意義，而社會主義的手段和目標完全被混為一談。按照本來的理解，現代經濟發展只是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手段，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主義本身被定義為完全的經濟發展過程。造成這種思想混亂的始作俑者是身為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1992年，他在其最後一次公開談話中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最終達到共同富裕。」⁸ 誠然，這種看法確實值得稱頌，但這段話也同樣可以用來形容資本主義的「本質」。

黨的領導人還常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統治等同於社會主義，它基於這樣一種理論，即無論道路有多麼曲折，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發展與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保證。這是鄧小平和趙紫陽的觀點，但人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他們更關心的是共產黨在現在的統治而不是未來的美好社會。另一個普遍的作法是把社會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混為一談，如鄧小平在1980年說（他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談到這一點）：「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使國家繁榮富強。」⁹ 最終，鄧的時代在經濟上是成功的，但從社會意義上說卻是失敗的，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價值觀念被隸屬於使中國「繁榮富強」的民族主義目標，現代經濟發展和強大的國家機器是這一目標的主要因素。

1987年10月最後一週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正式任命趙紫陽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¹⁰ 大會還批准了趙自1月繼任胡耀邦職務後實行的政策——加快中國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政策，雖然按照官方的說法，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劃的組成部分。十三大的另一個主要內容是高度評價鄧小平的成就，對鄧的歌功頌德與當年對毛的個人崇拜有諸多相似之處。實際上，趙對鄧小平思想的評價，與當時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如出一轍，是「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典範」。¹¹ 1978年的三中全會與1949年的革命勝利有著同樣重要的歷史意義，是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具體歷史條件下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¹² 這次大會對建立新的個人崇拜起了重要作用，講話、書籍和劇

作鋪天蓋地地宣傳這位最高領袖從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革命戰爭時期直到1980年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生涯和思想。

在十三大召開之前，一般都認為鄧小平（和其他老一代領導人）在這次大會上將不再擔任黨內的領導職務，不再具體過問黨和國家政策的制定。鄧和其他老一代領導人確實辭去了中央政治局的職務。在中央政治局的五名常委中，十三大後只有趙紫陽繼續留任，其他新當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要比前任年輕的多（喬石、李鵬、胡啟立和姚依林），常委的平均年齡從77歲下降到63歲。新政治局常委身著西裝，繫著領帶出現在公眾面前（沒有穿老一代領導人喜好的「毛式服裝」）——用西方輿論界的話形容，這是「精力充沛」和「現代」的象徵。

儘管人事發生了變動，但在十三大後鄧小平依然掌握著最高權力，與在十三大前沒有什麼兩樣。鄧小平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他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所享有的聲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在十三大後出人意料地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從而實際上掌握著人民解放軍。¹³ 此外，以「老人幫」而聞名的已經退休的一批老一代領導人，在長時間建立的個人關係的基礎上，通過非正式的政治網繼續對黨的政策和實踐發生著巨大的影響，他們團結在鄧小平身旁，也加強了鄧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

* * *

在十三大的決定和鄧小平關於更「大膽」地加快發展步伐的指示精神的鼓勵下，趙紫陽於1988年初加快了資本主義改造的進程。「沿海發展戰略」得到全面實施，有著2億人口的沿海地區（從東北到廣東）全面向外資開放。外資的大量湧入和擴張的財政政策，刺激工業經濟高速發展（1988年達到21%），但同時也導致腐敗現象進一步發展蔓延，最終在這個十年結束之際幾乎吞噬了鄧小平的政權。

趙紫陽市場取向的改革還包括「企業改革」，取消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財政和管理方面的控制，但這種嘗試並未見效。為了推進改革，在鄧小平的積極支持下，趙又進行了「價格改革」，逐步取消國家對大多數商品、包括成品和原材料價格的控制，由市場決定其價格，但僅是

對放開價格的預期就引發了經濟和財政混亂。在已經遭受嚴重通貨膨脹壓力的經濟狀況下，對通貨膨脹的恐懼導致人們衝向銀行提取現金、瘋狂搶購、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工商企業也趁機大幅度漲價。到1988年秋季初期，大城市的通貨膨脹率已達到年均30%。經濟已失去控制，政府不得不採取緊急的緊縮政策，防止出現災難性的社會衝突。「價格改革」甚至還沒有正式開展就已夭折，信貸受到嚴格限制，貨幣供應量和投資量大幅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已實際上已獲得自主權的企業和地區又重新加以控制。

無論是通貨膨脹政策還是限制物價的緊縮政策，都給城市多數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困難，特別是工廠的工人、政府機構中的下層官員和職員、知識分子、學生和其他依靠國家工資或補貼生活的人受影響最大。由於化肥價格昂貴、政府低價收購糧食以及腐敗官員徵收的苛捐雜稅，農民、特別是那些直接從事種植穀物和其他基本農作物生產的農民，日子十分艱難。

1988年秋季，政府採取嚴厲措施給「過熱」的經濟「降溫」，使受通貨膨脹影響的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這些措施包括嚴格控制貸款，導致工廠關閉、失業人口劇增。其中鄉鎮企業遭受打擊最大，鄉鎮企業是中國經濟中最有活力的部分，產值以年均30%的速度遞增。1980年代末期，在鄉鎮企業中的就業的人數約有1億人。然而，農村工業嚴重依賴於易於得到的貸款，而1980年代末期政府的緊縮政策，迫使一些鄉鎮企業關閉，多數鄉鎮企業縮小生產規模。數以百萬計的青年工人(特別是青年女工)失去工作，其中一些人加入了由貧困農民組成的民工「流動人口」行列，他們從農村湧向城市，然後又從一個城市流向另一個城市，尋找臨時工作。1989年春季，據估計，約有五千多萬人加入到了這支到處流動的遊民無產階級隊伍中。

儘管有通貨膨脹，或者說有時正是因為通貨膨脹，至少是在1988年經濟高漲的階段，有一些人發了橫財。這些率先致富的人包括從事對外貿易、特別是利用政治影響作外貿生意的人，他們有條件拿到國家的低價商品和物資，然後轉手在國際市場上以高價售出；迅速發展的私營或集體企業中的管理人員或老闆；農民企業家、甚至城市街頭的商販；特別是那些掌握著國家的低價商品和原材料的腐敗官員。但

是，在一個貧富差距以驚人速度拉大的社會裏，對多數人來說，通貨膨脹使生活水平每況愈下——政府於1988年下半年為抑制通貨膨脹而採取的嚴厲緊縮政策更是雪上加霜。生活水平的下降，再加上對腐敗的政府官員和其他採用不正當手段牟取暴利的人的憤怒，釀成了1989年春季的社會動盪。群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不滿迹象隨處可見：工廠工人舉行罷工或是怠工；犯罪率大幅度上升（根據官方數字，1988年的犯罪率比1987年增長了50%）；城市和鄉村出現了主要由年輕人組成的犯罪組織；吸毒、妓女、賭博和色情活動這些舊社會的沉渣迅速氾濫；大學生的政治活動從校園擴展到城市街頭，出現了非法的「大字報」；與當地農村幹部發生暴力衝突以及民工「流動人口」的急劇膨脹，反映出了農民的不滿。官方對社會動盪的現狀十分清楚，專門組建了機動武裝警察以對付預期中的動亂，派警察出國學習鎮壓城市暴亂的最新技術。

新權威主義

新權威主義為保衛共產黨國家，官方除了進行物質準備外，還發明了新的理論進行論證。當時的一個重要迹象是，與總書記趙紫陽關係密切的知識分子，為把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政治專制相結合——實際上源自鄧小平經濟改革的一種奇異組合，提供了一種理論依據，即所謂的「新權威主義」。他們提出，東亞國家，即日本、台灣、新加坡和南朝鮮經濟現代化成功的歷史經驗表明，現代經濟發展必然地、特別是在涉及控制大眾和管束勞動群眾方面，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和強有力（而且開明）的領導人。不用說，在鄧小平領導下的現存政治結構當然符合這樣的要求；但是，新權威主義者一廂情願地說，除此之外，對一個明智和強而有力的領導人來說，中國經濟的成功還需要一個有像他們這樣的知識分子參加的「決策集團」，他們可以設計未來，並且向領導人提出如何才能實現未來的建議。與此同時，中國實行不起民主，因為民主會破壞共產黨政治，使那些市場經濟的受害者上街鬧事，從而延誤中國的現代化。新權威主義者沒有完全排除政治民主，但是，他們提出，政治民主必須以高度發展的經濟

和一個有活力的資本主義階級為前提，而這樣的前提現在還不存在，因此，民主只能是遙遠未來的事情。

新權威主義理論得到了總書記趙紫陽的默許，它是基於、或如其鼓吹者宣稱的是源自鄧小平的思想。新權威主義受到了民主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批評。許多民主馬克思主義者，如蘇紹智等人，因與已下台的原總書記胡耀邦有密切關係而在政治上失意，對新權威主義的批評反映出他們對鄧小平和趙紫陽的不滿。¹⁴ 他們提出，專制方式無論對發展經濟多麼有效，都不可能導致民主的結果，他們對東亞小國家的發展經驗能否適合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政治和經濟的需要表示懷疑。

雖然圍繞新權威主義的爭論內容並無新奇之處，但它確實反映出在市場改革時期的前十年裏，政治觀點和社會理想發生的變化。1978年，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民主」前景的鼓舞下，積極地加入了支持鄧小平的陣營。十年後，在關於新權威主義的爭論中，無論是趙紫陽的理論家還是其民主派的對手，都很少提到社會主義。雙方都主張實行迅速產生資本主義經濟的市場改革，區別僅在於是在專制領導下還是在民主政治政權領導下實行市場改革，但無論是在哪種情況下，他們都認為知識分子應發揮重要的歷史作用。馬克思主義基本上被遺忘了，趙的理論家用的是保守的西方政治學理論，民主派知識分子用的是老一套的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在十年的時間裏，作為鄧小平政權的支持者和理論家的知識分子，放棄了社會主義民主的目標，轉而鼓吹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專制的新權威主義理論；知識分子的轉變幾乎與社會經濟的根本性變革同樣醒目。

《河殤》

就在一些知識分子還在圍繞新權威主義進行爭論時，1988年6月中央電視台在全國播出的電視片《河殤》，又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這兩件表面上無關的爭論有許多共同點。兩者的核心問題都是知識分子的政治作用，這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多年來一直耿耿於懷的問題；兩者都涉及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有關的政治派別鬥爭；最重要的是，兩

場爭論都反映了資本主義在思想和物質上的勝利——在鄧小平以「社會主義民主」為旗幟掌握權力後僅僅十年的時間，中國的思想理論界中就已經沒有了社會主義觀念的一席之地。

《河殤》以宏大的場面和富有激情的解說，尖銳地批判了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製片者在五四時期反傳統精神的影響下，認為中國千年來的停滯不前和近代落後的主要根源，是根深蒂固的傳統價值觀念的有害影響。《河殤》用黃河的混濁和氾濫比喻中國歷史，中國歷史呈現出周期性的社會政治制度崩潰，然後又是依據亙古不變的價值體系重建舊的社會基礎。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這種「超穩定」結構，是中國歷史中的萬惡之源，窒息了人的創造力，阻礙了社會經濟、特別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黃河是中華文化和文明的搖籃，是中國這個以農民為主的內向社會的深層保守主義和落後的象徵，這種社會只能重複生產自身及其令人窒息的傳統。

《河殤》中黃河的對立面是充滿活力的藍色大海，象徵著西方資本主義開放的海洋文化，代表著現代科學技術、工業和民主蓬勃向上的文明故鄉。與1919年五四運動時主張「全盤西化」的先驅者（參見第二章）相似，《河殤》的作者找到了所有在中國和中華文化中沒有的東西，進而描繪了一幅供中國效法的浪漫化的「西方」圖象。但是，五四運動並不是只談向西方學習。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提倡西方的科學技術，但他們還清楚地認識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威脅和西方資本主義對社會造成的危害。這種認識促使他們常常是痛苦地把西方國家中進步的方面與反動的方面區別開來，許多人由此轉向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尋找解決困境的出路。相反，在70年後，他們的所謂繼承者卻完全無視西方國家在中國現代史中既是老師又是壓迫者這一痛苦的困境，把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長期壓迫歷史，輕描淡寫地說成是充滿活力的「藍色」文明與停滯的「黃色」文明之間的「文化衝突」。

《河殤》的知識分子與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對帝國主義的看法不同，在對待資本主義的問題上，觀點也完全不同。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雖然承認先進的西方國家在物質和思想上的成就，認同西方的文明，但他們並不認同與西方科學和民主密切聯繫在一起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實際上，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普遍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久

將作為現代西方文化最先進的代表而出現。而在1980年代後期，情況正相反，中國的知識分子把「西方」看作是一個完美的整體，他們普遍認為，中國現代科學和民主的真正繁榮發展，以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為前提，無論如何，這一看法得到許多人的贊同——鄧小平的市場改革和官方的意識形態（即強調馬克思主義有關資本主義的進步性的觀點）對此當然求之不得。《河殤》的解說員的一句話最能說明問題：「馬克思很久前曾預言的資本主義的喪鐘並沒有敲響。」¹⁵

鄧小平時代後期的知識分子、或至少是那些贊成《河殤》表達的觀點的知識分子與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的共同點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兩者都把現實的社會與政治弊端歸咎於傳統文化的有害影響，但是對傳統進行批判的內容卻發生了變化。在五四運動時期，傳統是與社會保守主義聯繫在一起，傳統服務於反動的政治目的，所以，反傳統具有激進的意義。但是在革命勝利後的鄧小平時代，中國的重負與其說是傳統文化，不如說是共產黨革命產生的斯大林主義的國家官僚機器。把中國的問題歸結為「封建」文化的消極影響，實際上是為了推卸共產黨政權對中國社會中的問題應負的責任。因此，在五四時期反對傳統文化是一種社會激進思潮，而在70年後，無論是出自有意還是無意，反傳統文化代表的卻是為共產黨政權進行辯護的保守主義。得到總書記趙紫陽欣賞的《河殤》的作者，把當代中國的種種弊端都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充其量不過是重複了鄧小平政權的官方意識形態的一個主要斷言，即共產黨現在面臨的問題，主要是中國長期存在的封建傳統影響造成的，與共產主義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新的社會政治制度無關。然而，與趙紫陽不同，並不是所有的共產黨政權的高級官僚（其中許多人在文化問題上持保守態度）都精明到足以欣賞反傳統文化在政治上的功用。

《河殤》多次提到1919年，但對1949年卻不置一詞。除讚揚周恩來、鄧小平及趙紫陽的「對外開放」外，《河殤》完全不談共產黨的革命或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在《河殤》作者眼中，毛的革命對改變中國僵滯的歷史，沒有任何積極意義，不過是「封建」落後意識的反映和繼續。

《河殤》基本上無視或是否定共產主義革命，由此，也否定了承擔

革命的主體，即農民，他們批判農民是落後傳統和「封建」意識的社會載體。一位著名的西方學者在評論《河殤》時說：「在片中，農民社會簡直無可救藥。唯一採訪的一位農民在回答他作為一名多子女的父親有何感受時，這位農民大談中國人口過剩的問題。」¹⁶

然而，儘管背負著沉重歷史和傳統包袱的中國現狀不盡人意，但《河殤》最後得出了充滿希望的結論，中國最終已作好與千年「超穩定」封建結構決裂的準備。一方面，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理想現實，給中國樹立了一個明確的可以做仿的榜樣，《河殤》在最後一集中將這一有著巨大吸引力的榜樣稱為「蔚藍色」文明。另一方面，中國現在的領導人通過實行鄧小平的資本主義市場改革政策，承認做仿西方榜樣的必要性。《河殤》還特別（間接但十分明顯地）讚揚了趙紫陽和他的沿海發展戰略。但是，根據《河殤》的編導者，中國最大的希望在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智慧，他們是現代化的社會代表，真正懂得民主和科學，因此，在實行市場改革計劃中，為共產黨提供正確的指導。解說員在電視片滿懷激情地說，知識分子是歷史給予中國人民的「一個獨特的團體」。正是知識分子「掌握著摧毀無知和迷信的武器；正是他們能夠與海洋文明實行直接的對話；正是他們能夠將蔚藍而又清澈的科學民主清泉引入到黃色土地中」。¹⁷

《河殤》決不單純是一個思想和藝術作品。它的出現與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後的派別政治鬥爭有著密切的聯繫。總書記趙紫陽是《河殤》編導者的主要政治保護人，所以，片中對趙及其政策的讚揚也就不足為奇。此外，正是在趙的作用下，《河殤》電視片得以在全國範圍內播放。《河殤》在1988年6月中旬首次在電視上播放後，「老人幫」的成員和其他黨的保守領導人批判這部片子鼓吹「文化虛無主義」，7月，中央負責宣傳工作的胡啟立下令停播《河殤》。但在趙紫陽本人的干預下，8月中旬又一次在全國範圍內播放。直到9月，中共中央才召開會議，決定無限期地禁放《河殤》，但這時，《河殤》的錄像帶和編輯成書的解說詞已經在全國普遍發行。甚至有報道說，趙紫陽個人還把《河殤》的錄像帶作為禮物送給新加坡的獨裁者李光耀，後者十分讚賞「新權威主義」理論。

鄧小平政權及其批評者都普遍認為，電視片《河殤》對學生和知識

分子採取政治行動起了煽動作用，因此，是導致1989年民主運動的原因之一。例如，劉賓雁寫道，1988年的這部電視片（以及早些時代播出的電視劇《新星》），「在中國社會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說明知識分子有能力發揮比過去更大的作用。」¹⁸ 1989年6月4日悲劇發生後，共產黨領導人反復批判《河殤》煽動了官方所謂的「反革命暴亂」，通緝作者蘇曉康，他流亡到了國外。

《河殤》作者們的意圖是促進中國的民主政治改革，為此，他們幾乎不加掩飾地批評那些反對趙紫陽的經濟與政治改革（雖然政治改革十分有限）的保守的共產黨幹部。政治上保守的官僚通常在文化上也是保守的，因此，《河殤》把當代中國政治生活的專制特徵與傳統中國文化的專制內容聯繫在一起，使得多數共產黨領導人感到雙重憤怒——否定民族文化遺產是對愛國主義的背棄，在政治上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產物。

然而，《河殤》本身並沒有提出民主的要求。由於得到總書記趙紫陽的支持，編導者從一開始就出讓了自己的民主信譽。趙畢竟是列寧主義政黨的領導人，他一直支持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黨的領導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贊成新權威主義理論。此外，電視片本身對西方的讚賞，主要是它的繁榮富強，而不是其民主的德行。《河殤》中最著力表現的，是知識分子是中國社會的當然領袖這種自命不凡的信息，知識分子肩負著按照先進的西方國家的「藍色」文明模式、用資本主義改造中國的使命。這種信息迎合了造就出知識與政治精英的各種傳統和現代的力量的需要，它更符合列寧主義和新權威主義，與人民民主毫無關係。把西方浪漫化和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是1989年的民主運動最大的兩個缺陷。

民主運動（1989）

民主運動（1989）不過是由一些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在1987年胡耀邦下台後失勢的知識分子，對1989年民主運動的產生在思想上提供了幫助。一些知名的知識分子，包括方勵之（在1986-1987年冬天的學生示威後，他被開除了黨籍，撤銷了科技大學副校長職務）在內，於

1988年夏、秋在北京大學和其他高校中由學生組織的非正式論壇上發表演講。這些論壇被稱為「民主沙龍」（模仿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激進的貴族聚會時的形式），其中最著名的沙龍是由北京大學學生王丹組織的，王丹後來成為民主運動的學生領袖。

1988年12月，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鄧時代曾參與經濟決策（胡耀邦下台後，他被撤銷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一職）的蘇紹智大膽地抨擊鄧小平政權的官方意識形態是「僵化的教條」，與中國和世界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經濟現實相脫節。為了推動思想和政策的發展，蘇紹智主張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各種理論進行自由討論，而這些理論已經遠遠超出了中國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範圍。

1989年1月初，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和其他政治犯，以此來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週年和五四運動70週年——還可以再加上紀念1789年法國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博愛、人權」200週年。¹⁹ 方勵之的信對其他知名知識分子是一個極大的鼓勵，在其後的兩個月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一大批致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呼籲信，要求對所有政治犯實行大赦。

不久，學生採取的政治行動使知識分子（或更準確地說，是知識分子中的一小批人）的政治熱情相形見绌。1989年初的幾個月，在北京的幾所大學裏，1988年時還是不定期地舉行的「民主沙龍」已經變成一些學生團體定期進行討論的活動。學生團體常常在類似於「孔子研究會」這一類無關痛癢的名稱下，舉行會議，討論民主理論和其他異端思想。此外，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校園裏，學生組織了準政治性的秘密團體，策劃舉行紀念五四運動及其神聖的「科學與民主」70週年的示威活動——以此來抵制由政府組織支持的官方紀念活動。

但是，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件提前引發了大規模的政治行動。1989年4月15日，原總書記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胡雖然失去鄧小平信任，但他依然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時，因突發心臟病而去世。政治嗅覺敏銳的學生，馬上抓住了這個機會，除了真誠地悼念具有民主意識的胡之外，開始採取政治行動。學生們知道，在黨的高級領導人去世之際，當局會暫時地容忍不同政見，而胡的去世正是一次傳統的「以悼念死者來批判生者」的良機。因此，4月15日夜，中國人民大學黨

史系的學生(其中許多人出身於高幹家庭)，騎著自行車來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獻上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北京其他高校馬上紛紛行動起來，在首都街道上開始「長征」，他們唱著〈國際歌〉和其他革命歌曲，向天安門廣場和政府部門行進。

學生自發的遊行示威的規模越來越大，與政府的對抗程度的也逐日加深。一些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開始靜坐示威，要求全國人大代表接受他們的請願書，請願書呼籲結社自由、新聞自由等一些基本的權利，譴責政府官僚的腐敗行為和裙帶關係。另一些學生及一些失業青年在黨中央領導人下榻和辦公的中南海新華門前，與警察發生衝突。隨著工人和其他城市市民加入到學生民主運動的遊行示威行列，天安門廣場聚集的人數越來越多。

面對日益擴大的群眾遊行活動，政府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會舉行的當天，禁止群眾進入天安門廣場。但是政府低估了群眾的智商，當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離開人民大會堂時，約十萬名群眾在廣場上默默地表示對鄧政權的抗議。從人民大會堂到首都西郊的八寶山火葬場之間的長長街道上，逾百萬群眾佇立在街道兩旁。八寶山曾是安葬革命英雄和先烈的神聖殿堂，現在成為共產黨高級官僚的官方公墓。

在胡耀邦追悼會後幾天，學生領袖宣佈成立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統一組織協調北京地區21所大專院校學生的行動；他們正式宣佈在校園裏「罷課」；一些學生積極分子通過街頭演講等方式直接動員北京市民支持民主、譴責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鄧小平感到憤怒，但最激怒這位越來越不受歡迎的「最高領導人」的，也許莫過於對他的嘲笑，他被比作十九世紀末腐朽清政權中垂簾聽政的反動的慈禧太后。而鄧小平則把1989年參加運動的學生比作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造反派，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製造「動亂」。²⁰4月26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反映了這位最高領導人的怒氣，這一社論的作者顯然就是鄧小平本人。社論把學生示威說成是「在全國製造動亂」的「有計劃的陰謀」，是為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社論因此警告說，將嚴格禁止非法組織和未經批准的遊行，禁止學生與工人、農民和其他學校的學生串連。²¹

《人民日報》的社論激怒了學生，在此前的兩個星期的示威遊行中，學生一再表現自己對祖國、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忠誠，學生的良苦用心適得其反。社論發表後，學生並沒有像鄧預期的那樣被嚇住。相反，社論起到了在政治上動員和組織學生的效果，學生運動很快發展成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4月26日整個夜晚——從這時起，學生中開始充滿了自我犧牲的英雄主義感情，北京市二十多所高校的學生緊急地組織第二天抗議鄧小平政權的大遊行。4月27日清晨，各高校學生衝破封鎖校園的警察和民兵的阻攔，走出校門，匯聚在一起，共有約八萬名學生向天安門廣場進發。學生到達廣場後，分散成小分隊行動，他們揮舞旗幟，高唱革命歌曲，從早到晚走進北京的大街小巷，贏取公眾的支持。一些市民也加入了學生遊行隊伍，許多市民自發地給學生送水送飯、捐錢捐物，表達他們與學生休戚與共的感情。

在如何處理學生運動問題上，政府及其領導人內部產生了分歧，從鄧小平4月26日提出的毫不妥協的立場上後退，同意與學生領袖對話。在以後的三個星期裏，民主運動越來越壯大，而共產黨卻陷入派別之爭，莫衷一是。4月30日，結束了對北朝鮮一週訪問的趙紫陽返回北京，使鄧小平政權內部的混亂局面更加複雜化。

1989年初，鄧小平對自己這位門徒是否縱容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產生懷疑，兩人之間的關係開始惡化。與此同時，趙紫陽在社會上的威信每況愈下。席捲城市的通貨膨脹被歸咎於他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結果。由於他的兩個兒子在進出口貿易中大發橫財，趙氏家庭成為共產黨官僚普遍腐敗行為的具體化身，引起了群眾強烈的憤恨。毫無疑問，趙有充分的理由擔心鄧小平要把他作為當時經濟困難的替罪羔羊——像兩年前清洗胡耀邦那樣把他趕下台。

既是出於政治上自我保護的考慮，也出於自己本來的思想傾向，趙與那些主張對示威學生採取妥協政策的黨內領導人站在了一邊。這樣，在這場內部政治鬥爭中，他站在了他長期的保護人鄧小平的對立面，從而使共產黨機構在半個月的時間裏基本陷入癱瘓，放任民主運動發展壯大。

1989年5月4日，趙紫陽把學生的要求說成是「合理的」，敦促學生採取民主的方式和合法的途徑。²² 同一天，為紀念五四運動70週年，

北京三十所大專院校的6萬名學生和平地從校園遊行到天安門廣場集會。雖然遊行違反了市政府有關禁止未經批准的遊行的規定，但警察並沒有採取行動阻止手挽手、揮舞旗幟的遊行隊伍。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代表也加入了北京學生的行列，但更重要的是，非學生的團體——老知識分子、黨控制下的新聞媒體的記者、工人和其他市民也加入了學生示威的行列。這一天，總共有3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聽關於讚揚五四的民主和愛國精神的演說。一些演說者在呼籲民主的同時，又不得不痛苦地表示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截至當時為止最大的一次遊行示威，示威者高度的自我約束力以及學生的組織能力令觀察家們驚嘆不已。

然而，雖然5月4日的大規模遊行集會對學生來說是一場明顯的勝利，但它看來並沒有產生什麼效果。在其後的一星期裏，隨著許多罷課學生返回課堂，遊行的人數和次數越來越少，形勢似乎逐步恢復正常。但是，在表面的平靜之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鬥爭，鬥爭的結果將決定民主運動的最後結局。

領導層的鬥爭是總書記趙紫陽站在他從前的提攜人、「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對立面。趙為了自己政治上的生存，贊成學生提出的許多要求，儘管他小心翼翼地與學生本身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免進一步激怒鄧小平。但是，趙同意學生的要求，撤回已經聲名狼藉的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而鄧小平正是這篇社論的作者。趙讚揚學生的愛國精神，支持他們提出的許多要求，包括保證新聞自由和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趙還要求政府與學生領袖在民主的基礎上進行對話。但是鄧小平拒絕作出這樣的妥協。他從學生運動的自發性中又聽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回聲，決意懲罰向共產黨權威和後毛時代神聖不可侵犯的「穩定」提出挑戰的新一代青年人。支持鄧小平的有「老人幫」（他們與鄧一樣，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和大多數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儘管如此，鄧還是用了兩個星期的時間才確保住自己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地位。

學生內部的分裂對鄧小平在5月中旬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戰勝趙紫陽起了重要作用。在一場主要是青年人參加的自發運動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現混亂的派別衝突。學生內部在思想和組織方面有很多分

歧，有些甚至是非常瑣碎的，但其中一個根本性分歧卻事關民主運動的目標和策略問題。一方面，於4月中旬發動這場運動的年級稍大的研究生（及其支持者），想通過支持趙紫陽及與趙相聯繫的知識分子，影響中國共產黨內部政治的走向。另一方面，是人數眾多、缺乏組織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十分激進的大學本科生，他們與研究生的觀點日益相左，他們不信任任何權威和現存的官方機構，他們要擺脫共產黨的組織控制，尋求自己在社會中的定位。在他們看來，趙紫陽與鄧小平沒有什麼兩樣，對當時共產黨高層激烈的內部政治鬥爭視而不見。在5月4日大規模遊行及其後相對平靜的一段時間裏，更年輕、更激進的學生領袖，如王丹（北京大學歷史本科學生）和吾爾開希（北京師範大學學生）成為民主運動最引人注目的領導人。

新的學生領袖缺乏耐心，他們對政府的分裂及遲遲不答覆學生「對話」的要求感到憤怒，決定採取絕食行動以打破僵局，使運動不致無疾而終。5月13日下午，500名學生向天安門出發，在數千名支持者的圍觀下，開始在廣場中心舉行絕食，他們的營地恰恰就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正前方。無獨有偶，這也正是中國政府計劃在兩天後舉行歡迎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來訪儀式的地方。

1989年，戈爾巴喬夫是世界政壇上炙手可熱的風雲人物。他在中國特別受到歡迎，他的寬鬆政策、開朗的性格和他使共產黨政權民主化的努力，與鄧小平刻板的個性和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形成顯明對比。此外，戈爾巴喬夫是自從1959年赫魯曉夫與毛澤東不歡而散的會談後第一位正式訪問中國的蘇聯國家元首，他的中國之行將標誌著中蘇兩國正式結束長期而痛苦的敵對狀態。這次訪問被認為是廿一世紀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因此，全世界的電視記者都雲集北京，準備報道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的歷史性會見。也正是因為這一長期期待的重要外交事件，才使得有如此之多的電視鏡頭對準北京，向全世界現場直播了中國民主運動的興亡過程。

在戈爾巴喬夫到達的這一天，絕食學生及其支持者無視公安局的威脅，拒絕趙紫陽的呼籲，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使一向以「穩定」和「秩序」為榮的鄧小平陷入尷尬境地。5月15日，政府不得不臨時在機場為戈爾巴喬夫匆匆地舉行了官方歡迎儀式，蘇聯領導人在北京的訪問

被限於室內的會談和宴會，避開公眾視線，直到5月18日飛抵上海。在這三天時間裏，群眾對民主運動的支持行動一浪高過一浪——鄧小平動用軍隊鎮壓運動的決心也越來越堅定，動用軍隊實行戒嚴的決定，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趙紫陽反對的情況下勉強通過的。

絕食行動為學生贏得了北京市民的廣泛同情，再加上戈爾巴喬夫來訪引起的興奮情緒，從政治上動員了大批群眾參加運動。5月15日戈爾巴喬夫到華的這一天，約五十萬群眾在天安門遊行表示對學生的支持。5月17日，一百多萬群眾在天安門下面積超過一百多英畝的廣場上聚集（又從廣場出發遊行），這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週年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群眾集會。²³5月中旬遊行示威最引人注目的不僅是參加的人數之多，而且在於參加遊行的人代表了社會各行各業——他們毫不掩飾地舉著寫有自己工作機構或單位的旗幟參加遊行。在運動開始時就支持學生的知識分子和官方媒體的新聞記者，直接走上街頭參加遊行，成千上萬的工廠工人、黨政幹部、機關工作人員和教師也加入了遊行行列。在示威者中，還有政府的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編輯和記者、專門培訓黨的高級幹部的中央黨校的教員、穿警服的警察，甚至還有人民解放軍院校的學員。一位正在中國訪問的澳洲學者評論說：「他們不是匿名的示威者，而是井然有序地（儘管不是嚴密地組織進來）行進在大街上的各種社會團體。」²⁴

社會各個階層如此之多的群眾參加、並實際上得到了相當多黨政幹部支持的民主運動，對鄧小平政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但示威者的自律和輕快的舉止，在表面沖淡了這種威脅的含義。越來越多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安營扎寨，表示對絕食學生的支持，他們在廣場創造了一種反傳統的狂歡節氣氛，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這場政治運動的嚴肅性。一些美國的觀察家把廣場這種情況稱為「中國的胡士托節（Woodstock Festival）」（1969年8月在紐約州東南部舉行的一次反傳統的搖擺舞音樂節——譯註），在似乎是反文化的節日氣氛下，中國的年輕人模仿1960年代的西方激進青年的舉止。他們與幾位流行歌手和搖滾樂明星一起，在廣場跳舞唱民歌；他們自發地演講，舉行政治辯論，又模仿日本和韓國的激進學生，在頭上扎著各種顏色的布條，同時放肆地高喊嘲弄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和李鵬的口號；他們

在廣場上組織起了行使臨時市政功能的各種基本服務項目，保障食品和飲用水的供應，處理垃圾，建立醫療站，指揮救護車把脫水的絕食學生送到城市各醫院。

隨著5月中旬民主運動的規模和聲勢越來越大，鄧小平加緊了鎮壓「動亂」的準備。從5月初開始，那些從國家和軍隊領導職位上已經退下來、但依然保持著其影響的老人就在鄧小平家裏開會，討論如何處理「造反」。5月中旬，黨政幹部和產業工人加入到遊行示威行列，使他們感到震驚，「老人幫」要求立即在北京實行戒嚴。5月18日，在戈爾巴喬夫離開北京去上海的當天，總書記趙紫陽被召到鄧小平家中，得知了這一決定。同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匆忙召開會議，通過了實行戒嚴的決定，已經與鄧小平關係破裂的趙紫陽投了唯一的反對票。據說，一些中央政治局成員對在首都部署軍隊持保留意見，但沒有人願意冒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5月19日晚，在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象徵性地批准後，總理李鵬在電視講話中，宣佈了在北京主要地區實行戒嚴的決定。與此同時，趙紫陽採取了在中國共產黨政治中罕有的舉動。在5月18日深夜的會議上反對中央政治局關於戒嚴決定未果後，黨的總書記趙紫陽一人孤獨地前往天安門廣場。在過去一星期裏，趙曾稱讚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對他們的許多要求表示支持，懇求他們撤離廣場，但是他一直迴避與學生代表直接對話。現在，在5月19日黎明，在他的黨內生涯即將結束之際，他在絕食者中間漫無目標地走著，他眼含淚水承認說，「我來得太晚了。」他還說：「我們也是從年輕時過來的，那時也是精力充沛，上街遊行……不計後果。」²⁵

趙的痛悔行動，也許是他多年政治生涯中最富有人性味的片斷，卻成為6月下旬中央全會上正式解除他總書記一職時的罪狀之一。在鄧小平時代的其餘歲月裏，趙一直被軟禁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個別墅裏，過著舒適而沉寂的生活。

* * *

在北京，群眾對宣佈戒嚴的直接反映是抵制。5月19日，在李鵬宣佈戒嚴前不久，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宣佈暫停絕食，又於5月20日繼續

絕食。5月21日，一百多萬市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抗議戒嚴，5月23日，又爆發了另一次百萬人的遊行抗議。在一些工廠地區，市民們堆起路障，阻止包圍北京的解放軍部隊進城。工廠因罷工而停產，公共交通陷於癱瘓。從東北城市到廣東和香港，民主運動自發地席捲全國。一向馴服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起了支持學生要求的聲明，呼籲撤銷戒嚴令。一批退休的軍隊高級將領公開致信鄧小平，要求恢復軍隊的革命傳統，提醒這位最高領導人「人民的軍隊屬於人民……不能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實際上，第一批進入北京的年輕士兵就與他們要鎮壓的北京民眾建立了友好的關係，一些軍人還應學生之邀共同高唱革命歌曲。

年輕士兵的部隊很快就被撤走，取而代之的是由職業軍人組成的部隊。到5月下旬，北京周圍的軍隊人數已達到二十多萬，他們對鄧小平的命令無條件地服從。在重壓之下，民主運動開始解體。絕食行動第二次停止。佔據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人數急劇減少，多數學生返回了校園，一些學生加入了遲來的「走向人民」的活動。到5月底，留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數不超過五千人，大多數學生來自北京以外的大學。

隨著學生積極分子的退卻，民主運動的中心轉移到位於廣場東側數英里和北京郊區的工人階級居住區。經歷了十年市場改革後，雖然工人的物質生活條件得到改善，但工人的怨言有增無減。自1987年後，通貨膨脹困擾著全國，尤其給城市居民生活帶來嚴重影響，改革初期得到的實惠逐漸為物價上漲所抵消。鄧小平和趙紫陽麾下的新自由經濟學家，鼓吹的「自由勞動力市場」、特別是盡快打破「鐵飯碗」的改革主張，令國有企業工人害怕失去職業保障和福利待遇。目睹黨的高級幹部及其子女——從鄧小平、趙紫陽到下屬的各級黨政官員的驕奢淫逸，工人對自身職業不穩定的擔心常常轉化成對政府腐敗的憤怒。工人們對由毛時代繼承下來的工作單位對自己日常生活的官僚控制，一直採取著抵制態度。

對舊政治制度的壓制和市場改革造成的不公正社會結果的不滿，使城市工人階級成為民主運動的堅定的支持者，5月17日，大批工人引人注目地直接參加了遊行示威活動，清楚地表明了工人的態度。這一

事件使共產黨領導人的「波蘭恐懼症」復發。這正是他們十年來所害怕的，工人與知識分子結成波蘭團結工會式的聯盟，反對共產黨的統治。這種恐懼，又反過加強了官方實行戒嚴的決心。其實，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大可不必擔心工人與知識分子結成聯盟。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排除了這種發展的可能性。中國的知識分子除了抱怨工人賺錢比知識分子多以外，很少關心工人階級的其他狀況。²⁶ 這種階級偏見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學生，許多學生反對工人參加民主運動，理由是工人不守紀律，有暴力傾向。他們提出，工人參加運動，就會給政府製造動用暴力鎮壓運動的借口。因此，在運動最初的幾個星期裏，學生遊行時常常是手挽手前進，就是為了防止工人和其他市民加入到遊行行列中。學生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持他們獨特的非暴力遊行的「純潔性」。然而，到了5月中旬，由於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已明顯地接近與共產黨政權對抗的緊要關頭，學生開始歡迎工人的支持——和保護。

無論如何，鄧小平決意「教訓」這些他認為在改革中受益卻又不識好歹的群眾，而且是要動用軍隊進行教訓。由於黨和軍隊領導人在策略問題上的分歧，第38軍的士兵（最先進入北京的部隊）亦不願意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以及把部隊從基地調動到北京附近地區涉及到的後勤保障等事項，使鄧小平政權用了兩個星期的時間才完成戒嚴的部署工作。6月初，鄧已調動了大批軍隊，20萬軍隊兵臨北京城下，隨時準備出擊。中國首都好像受到了一支外國軍隊的圍困。

工人和城市市民以一種英雄主義的氣概奮起保衛城市——保護還留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他們在人民解放軍的坦克和裝甲車進入市中心的必經之路沿線堆起了各種路障，在天安門廣場周圍的交通要道，他們用推倒了的公共汽車和大卡車封鎖了街道。為了動員群眾保衛北京，工人和學生張貼大字報，在街頭散發傳單，向參加前所未有的自由政治辯論的群眾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市民與學生組織起了自行車隊和摩托車隊（後者主要由同情學生的小企業主組成），在城市各處通報軍隊的動向，提醒市民可能發生的危險。警察和其他市政當局無影無蹤，工人和學生負責維護公共秩序，指揮交通。對許多北京市民來說，他們短暫地體驗到了團結與獨立的全新意義。

* * *

6月3日晚上，軍隊開始進入北京城區。裝備著坦克和裝甲車的4萬名先頭部隊，在天安門廣場的東西兩側街道，清除路障，向市中心進軍。在廣場東側，軍隊在稠密的居民區受到大批群眾的阻擋，行動暫時受阻。在廣場西側人口分佈較少的地區——主要是政府機關的建築群，工人、學生和其他各界市民聚集在街道和路口，阻擋軍隊的前進。解放軍使用坦克、機關槍和AK47自動步槍對付用磚瓦、棍棒和汽油瓶武裝(如果這可以稱得上武裝)起來的群眾，開始了以無情殺戮為標誌的恐怖之夜。在廣場東側稠密的居民區，類似的命運也降臨到城市保衛者身上。午夜後不久，解放軍進入了天安門廣場，在他們身後留下的是死亡和毀滅。大多數傷亡事件發生在居民區(遠離對準天安門廣場的電視鏡頭)和天安門兩側的東西長安街，軍隊在向天安門廣場推進途中，用血腥的手段粉碎人體路障，射殺反抗者。學生雖有不少傷亡，但絕大多數死傷者是那些在街道上設置路障、試圖阻止軍隊前進的工人和其他居民。

天安門廣場上基本沒有發生人員傷亡。廣場上所以避免能發生流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幾位不像英雄的人物——搖滾樂明星侯德健²⁷和文學評論家劉曉波，他們是6月2日開始絕食以示對學生的支持。在軍隊進入廣場後，他們出面與軍隊指揮官談判，商定了5,000名滯留在廣場上的學生撤離的安全通道。6月5日清晨，在戴著頭盔的士兵們威脅的目光注視下，最後一批學生排隊離開了一片狼藉的廣場。他們似乎置身於一座為外國軍隊佔領的城市。他們經過的街道上，到處是磚瓦碎石，還有冒著濃煙的軍車，建築物外表上佈滿前一晚上槍擊留下的彈痕。全副武裝的士兵在街上巡邏，武裝直升飛機在低空盤旋，機上的探照燈不祥地掃向下面的街道。這天清晨從廣場的最後撤離，實際上標誌著民主運動的終結。在以後幾天裏，在北京一些地方還繼續有零星的抵抗軍隊佔領的行動，在全國其他十幾所城市裏也出現了抗議北京鎮壓活動的遊行示威(很快就遭到鎮壓)。

6月9日，鄧小平出現在電視上，他向鎮壓了他所謂的「反革命暴亂」的軍隊和警察力量表示祝賀，向數十位在鎮壓過程中遇難軍人的家

屬表示哀悼。然而，鄧對平民受害者沒有隻字的同情，在他看來，這些人都是「社會渣滓」。根據政府後來的聲明，死亡的平民人數不超過300人。一些目擊者抨擊說，官方的數字是荒謬的，據他們中的人說，僅他們看到的在市中心幾所醫院中的屍體，就超過了政府所說全部死者的總數。²⁸ 儘管確切的死亡數字難以知曉，但據當時在北京的獨立觀察家的估計，平民死亡人數在2000至7000人之間，而傷者的數量要數倍於此。然而，與槍殺本身同樣令人寒心的，是作出大規模動用武裝力量進行鎮壓決策時的冷酷無情——鄧小平和一批老人作出這一決策，他們決意懲罰年輕的示威者，恐嚇那些不識好歹的普通群眾，完全無視和平解決危機的種種機會。

在軍事鎮壓之後，出現了全國範圍的逮捕浪潮。據估計，僅在6、7兩個月，秘密警察就逮捕了約四萬人，其中數千人被判有期徒刑，數百人被處死刑。大多數被判刑的和所有被處死的都是工人和其他普通市民。除了學生領導人外，學生——其中一些人的親戚身居高位——受到了比較寬大的處理，政府對運動中的21名學生領導人發佈了通緝令，大多數年青的不同政見者或流亡國外，或被捕入獄。

* * *

在北京慘案後的歲月裏，一直到1990年代，中國的政治和思想領域比1980年代多數年份更為壓抑，對持不同政見者的迫害越來越甚，秘密警察的活動幾乎無處不在，任意捕人的現象更為普遍，黨的報紙、刊物、書籍和電視的檢查控制更加嚴厲。然而，儘管政治上越來越壓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正是因為這一原因——社會和經濟生活卻不可思議地恢復了「正常」。中國的市場改革繼續朝著資本主義方向發展，就好像1989年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實際上，在1990年代這一步伐更快了。令人不可思議和沮喪的是，造就了民主運動的強烈的政治和道義感情，如此之快地就煙消雲散——完全為政府提倡的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所淹沒。

註釋

1. 「李一哲」三個字分別代表1970年代廣東的三位民運人士姓名中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個字——李正田、陳一陽和王希哲。他們以其著名文章〈論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而聞名全國，該文以大字報的形式於1974年貼在廣州街道的牆上，長度有一百碼。
2. 其中最典型的案件是海南省的汽車走私案。1983年，按照趙紫陽總理的計劃，海南省要成為市場經濟的窗口，其發展目標是與台灣競爭。海南省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經濟自主權。海南省的官員不失時機地利用該島的特權地位，進口了10萬輛汽車、卡車和數百萬件電視機和錄像機，然後以高出三、四倍的價格在島上售出。這一活動一直持續了整整15個月，從1984年1月到1985年3月。有關這一事件的情況，參見佩珀，〈中國的經濟特區：拯救蹣跚的改革的一劑藥方〉；劉成厚 (Lau Shinghou)、羅迅之 (Louise de Rosario)，〈欺詐剖析〉 (“Anatomy of a Scam”)，〈中國貿易報告〉 (*China Trade Report*)：1985年10月，頁8–10。
3. 例如，劉賓雁在《中國的危機與希望》 (*China's Crisis, China's Hop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一書中頁103提出的。
4. 鄧小平的威望雖然在中國下降，但他在西方仍然因為他的市場改革而受到好評。例如，1985年底，他被《時代》雜誌第二次評為當年的世界風雲人物，〈國家評論〉 (*National Review*) 雜誌將其作為當年世界風雲人物。西方對鄧的好評直到1989年6月4日前才沉寂，但在1990年代初期又審慎地重新開始。
5. 有關「十二·九運動」的情況，參見易社強 (John Israel) 和克萊因 (Donald W. Klein) 在《反抗與官僚：中國的12月黨人》 (*Rebels and Bureaucrat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一書中的出色研究。
6. 1987年劉賓雁再次被開除出黨，給他精神上造成的痛苦，遠遠不如30年前他第一次被開除時的感覺，這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道德水準的下降。參見劉賓雁，〈中國的危機與希望〉，頁xv–xvi。
7. 趙和鄧都經常談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大約在2050年實現。
8. 《鄧小平文選》，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73。
9. 鄧小平在1980年11月會見羅馬尼亞一個代表團時的談話。《紐約時報》，1980年12月30日，第1版。
10. 1987年趙成為「代理」總書記。中共十三大正式任命他擔任總書記，去掉

- 了「代理」兩字。與此同時，趙辭去了國務院總理一職，他同時擔任這兩個職務的時間為十個月。李鵬繼任他任總理。
11. 歌頌鄧小平是中共十三大的主題之一。這一基調是趙紫陽在十三大前5月13日的一次講話中定的。參見1987年7月10日《人民日報》。
 12.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87年10月25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13. 由於鄧小平不再是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成員，黨章不得不作出相應修改，使鄧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一合法化。
 14. 有關爭論情況的有說服力的敘述，參見戈德曼（Merle Goldman）：《中國的民主種子：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改革》（*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頁275–282。
 15. 蘇紹智、王魯湘：《黃河的喪歌：中國電視劇「河殤」的讀者指南》（*Deathsong of the River: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hinese TV Series Heshang*,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n Program, 1991），頁183。
 16. 耿德華（Edward Gunn）：〈「河殤」的語言：從文化批判到社會行動〉（“The Rhetoric of *Heshang*”），《亞洲研究學術公報》第23卷第3期（1991年），頁19。
 17. 蘇紹智、王魯湘，〈黃河的喪歌〉，頁218。
 18. 劉賓雁，〈中國的危機與希望〉，頁xxii。
 19. 方勵之，〈致鄧小平的公開信〉（1989年1月6日），見方勵之，〈推倒長城〉，頁242–243。
 20. 鄧小平4月25日講話的英譯本，參見*FBIS*，1989年5月31日，頁35–36。
 21. 《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的英譯本，參見《中國季刊》（1989年9月）第119期，附錄A，頁717–719。
 22. 會見當時在北京舉行的亞洲開發銀行首腦會議時的講話。參見韓敏洙編撰（Han Minzhu）：《民主的呼喊：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的文章與講話》（*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頁132–134。
 23. 有關5月17日的遊行示威情況，參見李斐工（Lee Feigon）在《中國的崛起》（*China Rising*, Chicago: Ivan Dee, 1990）頁205中作了生動的描述。在有關

民主運動的產生和原因的大量著作中，李的著作無疑是其中最出色的一部。本書中關於民主運動的看法，即以李的書為依據。

24. 白傑明 (Geremie Barme)，〈北京的白天，北京的夜晚〉 (“Beijing Days, Beijing Nights”)，安戈主編：《中國的新民主運動》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1)，頁49。
25. 轉引自李斐工，《中國的崛起》，頁209-210。
26. 正如陳佩華在民主運動遭到鎮壓後不久指出的：「如果仔細閱讀過去幾年所有不同派別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著述，不難發現，幾乎沒有人談到中國工人的困難境地。」陳佩華，〈中國漫長的冬天〉，《每月評論》(1990年1月)，第41卷，第8期，頁5。
27. 侯德健是台灣人，1983年移居大陸，他是一位著名歌手和搖滾樂作曲家。
28. 舉例說，目擊了鎮壓過程的韓丁寫道：「人們(被解放軍士兵開槍打傷的人)不敢留在醫院。他們怕軍隊到醫院抓人，所以，他們在醫院草草包扎後馬上回家。許多人因此而死於家中。到第一週的星期三(6月7日)，在北京協和醫院裏，有近百具屍體無人認領，復興醫院有67具屍體無人認領，周圍其他醫院的情況也是這樣。所以，單在醫院停屍房中無人認領的屍體的數量，就已經超過了官方公佈的所有死者的總和。許多人在街上被打死，不少人受傷後去了醫院，然後死在家中」。韓丁，《巨大的反覆》 (*The Great Revers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頁183。

鄧小平時代的結束： 1990年代的中國

在1989年6月3-4日北京大屠殺後的一段時間裏，人們普遍預言，經濟停滯將是中國為其領導人的野蠻政治行動所付出的代價。當時，許多西方評論家正在歡呼西方資本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對歐洲共產主義的勝利，一些觀察家宣稱，「自由市場」的勝利，是人類進步的頂點，預示著「歷史的終結」。¹ 這種烏托邦式的預言，強化了一個長期為人們信奉的理念，即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從這一理念出發，自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下令對民主運動進行軍事鎮壓的中國共產黨「強硬派」，必然會終止曾在過去十年促進了經濟進步的市場改革。鄧小平轉瞬就成了1989年強硬派的代表人物（確實，他當時被稱為「北京的劊子手」），但這與他同時又是中國資本主義最熱心的推動者產生了明顯的矛盾，從權宜出發，人們對這種矛盾視而不見。

就鄧小平而言，他不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手段和斯大林式政治體系之間有什麼矛盾。他在6月9日祝賀解放軍鎮壓民主運動、或他說的「反革命暴亂」時的講話中，強調市場改革和向國際資本主義市場「開放」的政策不能改變；實際上，他主張改革開放的步伐還要「加快」。² 這不僅能增強國家的實力和共產黨的力量，而且會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從而淡化人們對「北京之春」的記憶，這就是鄧的邏輯。加快資本主義發展，符合民族、黨和人民的利益。因此，鄧在1989年6月28日對黨的高級幹部發表的秘密講話中提出，把追究1989年春季這場災難的政治責任的難題放在以後再說，以便於黨的領導人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發展經濟上。³

但是，天安門事件後，中國進入了一個政治上更加專制的時期。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數千名黨員幹部因為支持民主運動、或被懷疑同情民主運動的目標而被開除黨籍或撤職。知識分子也遭到清洗，他們在1980年代獲得的來之不易的有限的言論自由，也立即受到剝奪。曾經獲得一定程度（雖不穩定）自主權的報紙和刊物，又重新退回到黨和國家官方喉舌的地位。對宗教和政治異端的迫害愈演愈烈，不同政見者陷入牢獄之災，他們受到的非人待遇常招致國際輿論的抗議。

然而，也正是在政治上更加專制的1990年代初期，中國創造了令人不可思議的經濟成就，各種數字都說明了這一點。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按國民經濟總產值計算），⁴一個新的超極大國正在形成之中。

誠然，中國在1989年正處於典型的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蕭條」階段，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問題，為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所困擾。大城市中高達年30%的通貨膨脹率，是由於趙紫陽總理在1987-1988年實行的外向型經濟政策造成的，而經濟衰退則是趙在1988年下半年為遏制通貨膨脹而被迫採取的緊縮政策的結果。兩者的結合導致城市經濟的困難，這又反過來驅使城市群眾支持1989年的學生運動。1989年最後的六個月和1990年初，生產下降，失業率增加。不過，到1990年夏季，通貨膨脹的壓力減小，政府的緊縮政策開始放寬，經濟增長回升。1991年，中國國民經濟總產值增長了7.5%。在鄧小平1992年1月的南巡後，中國經濟在1990年代中期獲得了持續的高速度增長。

「南巡」

1992年初，鄧小平在中國政治領導層內沒有任何正式職務。1989年夏季，在解放軍鎮壓了民主運動後不久，他辭去了最後一個官方職務：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然而，鄧小平雖然不再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但依然保持著政治上的最高地位，他非正式地與他這一代已退下來的黨的老領導人舉行會議，決定國家最重要的事務，然後令其安排在黨和國家官僚機構的領導人執行。鄧小平選擇的接班人是

原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他於1989年6月接替被罷黜的趙紫陽出任總書記，他不折不扣地執行鄧的決策。

但是，鄧小平在1990年代初期所以能夠保持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主要是由於他本人的聲望和個性——籠罩在他和他的事業周圍的一層神秘光環。他的支持者為他營造了一種個人崇拜的環境，特別是在1989年後，他像當年的毛澤東一樣，開始凌駕於黨組織之上，繞過黨的正式程序，自上而下地按照自己的好惡干預決策。最典型的毛式干預是他著名的「南巡」。鄧的南巡改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和性質。

1992年1月18日，87歲的鄧小平開始了他五個星期的中國南方之行，他視察了廣東的一些城市、武昌、上海以及位於深圳和珠海的經濟特區。他在這次大張旗鼓視察活動的每一站，都告誡地方官員要加快經濟發展速度，「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讚揚深圳經濟特區的資本主義和廣東省實行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為全國樹立了榜樣。他警告說：「低速度就等於停步，甚至等於後退。」這只是他在巡視過程所作的評論（一些評論十分費解）之一。鄧的評論幾乎立即變成了官方的政策和實踐。就這句評論而言，意味著政府放棄天安門事件後，為了防止通貨膨脹和社會不穩定而實行的把經濟增長速度限制在6%以內的政策。

這位「最高領導人」在南方講話中，還鼓勵加快進行全面市場經濟改革的進程。針對有人對進一步市場化會在中國導致資本主義的擔心，鄧小平的回答是，只要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無論採用什麼方式，只要經濟能發展，就對社會主義有利。他安撫批評者說：「政權在我們的手裏。」

但是，鄧小平的目的不僅是要打消懷疑者的顧慮，而且是要消除懷疑論者的領導人物的權力和影響。為此，在「南巡」過程中，他宣佈黨面臨的主要危險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右」的東西——即導致1989年「反革命暴亂」的東西，而是「左」的東西。他說的「左」的東西，主要是指對他主張的資本主義改造和加快經濟發展步伐缺乏積極性。這樣，鄧小平為黨內鄧派與「保守派」最後一場思想鬥爭奠定了基調，所謂保守派，主要指強調中央經濟計劃和國有企業應發揮重要作用的

人，其主要代表是陳雲，長期以來，他和鄧棋逢對手，是鄧最堅韌的對手。1992年春季後，陳雲的思想不再為人所提，標誌著「鄧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內完全佔了上風。

1992年5月，鄧在「南巡」時的評論和談話被彙集起來，以「中共中央4號文件」的名義向全黨下發，成為全黨工作的具體指導方針。隨後，以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為主要特點、使經濟更加資本主義化的運動在全國展開。國有企業得到了更大的自主權，根據國內和國際資本主義市場需求進行生產經營，包括有權直接從事對外貿易。此外，開始了複雜而漫長的半私有化進程，一些國有企業作為試點，被允許通過發行能為個人和集體投資者購買的上市股票，逐步改變其所有制。這類股票在新成立的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進行交易，這兩個地方都是鄧「南巡」視察過的，一些股票後來在香港證券交易所成為搶手的「紅籌股」。此外，為吸引想來華擴大業務的外國銀行和外國投資者，新制訂了更優惠的政策，又「開放」了一批城市。為了讓上海成為遠東最大的貿易和金融中心，國家投入大量財力和物力，並給上海以特殊政策。據有關人士預計，上海將最終取代香港的地位。

以上這些措施再加上擴張的財政政策、鄧的「南巡」在政治上開的綠燈、地方官員和黨的官僚放手增加投資並進行金融投機(同時抓住時機給自己斂財)，使中國經濟在中國歷史上、也許在世界史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長。在經濟規模已經很大的基礎上，1992年，中國的國民經濟總產值增加了12%，實際上放棄了天安門事件後，政府關於中國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只能承受不超過6%的經濟增長速度的決策。1993年，國民經濟總產值的增長速度達到驚人的14%，1994年又達到12%，儘管政府為控制通貨膨脹採取了緊縮政策(十分有效)，但在1990年代中期，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原來被認為是烏托邦式的在1980-2000年的20年時間裏使中國經濟翻兩番的目標(鄧小平時代開始時制定的)，到1990年代中期已提前超額完成。從1991年到1997年，中國國民經濟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11%，是當時世界上所有大國經濟中發展速度最快的。

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了第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對鄧小平的政策——以及鄧小平本人——給予了高度評價。大

會同意完全採用資本主義的方式和觀念加快經濟發展，雖然大會把這種社會結果正式命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為了讓這個杜撰的自相矛盾的名稱能夠自圓其說，大會將其拔高到是鄧小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雖然不協調，但這依然是官方國家意識形態的名稱）做出的又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中共十四大不僅標誌著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政策和理論的絕對勝利，而且也是他本人在中國共產黨內政治上的絕對勝利，雖然他本人已經沒有任何官方職務。鄧小平在政治上勝利的標誌是十四大取消了以陳雲為主任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中顧委是1982年成立的（最初由鄧小平領導），它的主要作用是為退下來的黨的領導人提供一個干涉黨和國家事務的講壇——此外，也是為了保證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依然能夠享有他們長期已經習慣的物質奢侈生活和特權。鄧在政治上的另一個徹底勝利是中央領導機構人員的大調整，調整後的中央領導機構成員全部是鄧小平一派的人。雖然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中有一半委員是新當選的，但他們都是鄧最堅定的支持者。這不僅保證了黨能夠繼續忠誠於這位最高領導人及其政策，而且也使中央委員會的平均年齡下降到相對年輕的56歲，其中80%的人畢業於理工科大學。這樣，十四大就向著實現鄧小平的「政治改革」目標前進了一步，鄧的政治改革並不是指人民民主，而是使官僚統治向技術官僚方向發展，正如他在改革初期說過的，目的是使共產黨的各級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⁵

但是，西方多數人最關注的是鄧小平的經濟發展計劃，而不是他的政治方針。在整個1980年代，西方媒體讚揚鄧放棄了毛主義，是一個偉大的現代化者。不過，當他在1989年下令人民解放軍鎮壓民主運動後，他又被西方輿論普遍譴責為野蠻的共產黨獨裁者。但是，當他在1992年的「南巡」及其後積極地提倡資本主義時，西方媒體又給他平反，他再次被西方譽為是一位開明的市場改革家。

1992年加快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改革後，很快就出現了人們熟悉的發生在1980年代的「繁榮—蕭條」的周期性結果。第一個結果是通貨膨脹。1993年，在一些大城市，年度通貨膨脹率達到25%，1994年，根據官方很可能是保守的數字，全國的通貨膨脹率為24%，但在大城

市，這個數字還要更高。通貨膨脹，新一輪的政府腐敗和官僚經商浪潮，地方政府和私人企業主在房地產、股票市場的投機，中央政府失去對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特別是廣東省——的經濟控制，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造成的惡果，都轉嫁給了勞動群眾。

為了解決這種混亂局勢，鄧小平起用了他的另一位支持者、副總理朱鎔基。1989年6月時，朱是上海市市長，他妥善地保持了上海這座中國最大城市的穩定，既沒有激怒當地的群眾，也尊重了北京的權威。1992年10月，他在中共十四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鄧小平對他的經濟工作才能一直十分讚賞。朱鎔基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授權恢復經濟秩序，遏制在經濟改革中出現的地方主義傾向。朱鎔基實行了強硬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即限制信貸，壓縮政府開支和投資），以抑制通貨膨脹但又不致使經濟陷於嚴重的衰退。除了重建中央對地方財政的控制外，朱的目標，是把經濟增長率從超過12%壓低到年均8%，他認為這是社會和自然環境所能允許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速度。

然而，鄧小平卻不同意。1993年，鄧下了一個簡短有力的指示：「低速度不是社會主義。」結果，朱鎔基的嚴厲計劃作了調整，使得1994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12%。但是，朱鎔基緊縮財政政策已經見效，1994年25%的通貨膨脹率，令人吃驚地大幅度下降到1996年的6%——而國民經濟總產值依然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長速度。朱鎔基的政策取得了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中央銀行都夢寐以求的結果——「軟著陸」，即低通貨膨脹率與高經濟增長速度的完美結合。國際金融界和西方記者對朱鎔基給予高度評價。⁶ 在國內，朱鎔基成為1998年李鵬任期結束後國務院總理的首位人選。

鄧小平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1994年的春節團拜會上，中央電視台在全國播出了五分鐘這位最高領導人在上海與有關黨政領導人互致問候的境頭。根據官方的報道，正是在這次團拜會上，鄧最後一次號召加快經濟發展速度。不過，在電視播出的片斷中，沒有聽到鄧說話，實際上，他明顯的虛弱和茫然的表情，已經預示著他將不久於人世。此後三年，帕金森症（Parkinson's disease）和其他老年疾病使他在體力和精神上，都已無法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繼續發揮作用。1997年

2月19日，鄧小平逝世，終年92歲。他為中國開闢了一條經濟高速發展的道路，中國也沒有因為這位最高領導人的去世而放慢經濟發展步伐。

鄧小平是中國最後一位老革命家，是出生於五四運動革命知識分子中傑出的共產黨領導集團裏的最後一位重要成員，鄧之後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在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而鄧小平早在1920年代初期，當他還是一名青年學生時，就在法國加入了少共中國支部，在政治上開始成熟。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時期，他返回中國參加革命。在城市革命鬥爭失敗後，他轉到了農村，在國內革命戰爭中，他很快就成為毛的農民軍隊中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49年後，至少是在文化大革命他暫時被打倒之前，他是毛領導集團中的六位主要成員之一。

雖然鄧小平有著漫長的革命生涯，但他留給人們記憶的卻是他作為中國資本主義之父的形象。資本主義當然不是鄧小平的目標，他寧願相信，他創建的經濟體系只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在廿一世紀中葉將會興旺發達。然而，他發現資本主義經濟方式是實現現代化最有效的途徑——與其他許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一樣，鄧小平世界觀的核心，是使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繁榮富強的民族主義藍圖。

* * *

在某種宿命的意義上說，鄧小平辭世的方式，也為他一生中最珍視的「穩定和團結」作出了貢獻。他在病榻中度過生命的最後三年，恰恰給了他親手挑選的接班人江澤民鞏固自己及鄧後統治集團的權力的時間。在這期間，江清除了黨內可能的反對力量，把留在大陸的不同政見者關進監獄。與此同時，總書記江澤民又增加了幾個新的頭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使他同時成為國家元首、人民解放軍統帥和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

江澤民繼續執行鄧小平制定的基本方針政策：快速發展經濟、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保持列寧主義政黨的專政。即使是在實行

緊縮政策的時間裏(1994–1996)，國民經濟總產值的年均增長率也接近10%。同時繼續增加吸引外國投資，主要的跨國公司(其中以美國和日本的跨國公司為主)在中國的投資，有超過海外華人通過香港和台灣在大陸的投資規模的趨勢。⁷

江澤民最大膽的經濟舉措——也完全是鄧小平市場經濟改革計劃發展的邏輯結果，是對國有企業實行部分私有化。1997年，國有企業以及與之相關的企業佔中國工業經濟的40%以上，在國企中就業的工人達1.2億人。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特別是重工業(如鋼鐵、石油化工、礦產和機器製造業等)的骨幹企業，對新技術的採用和發展至關重要。⁸但是，根據改革家們的企業盈利標準——這已經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國有企業處於虧損狀態。按照共產黨領導人現在信奉的市場觀念來衡量，這不但消耗了國家財政，而且在理論上也是不能接受的。1980年代中期，隨著對國有企業的「鐵飯碗」、終身職業保障及福利待遇的批判，開始了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就是說，運用資本主義方式進行改革)，這項改革已進行了十多年。但是，除了一些小型的、基本上陷於破產境地的企業從政府手中剝離出去外，大型國有企業基本上還是維持原樣。黨的領導人對處理國有企業的問題畏首畏尾，一方面是考慮到放棄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會被認為是放棄了社會主義，但是，更重要的是擔心城市工人階級會因此而鬧事，因為他們是這種「改革」的主要受害者。國有企業所以「虧損」，與其說是管理不善，不如說是因為企業對職工過於大方，國企職工的工資和福利待遇遠遠高出私營和「集體」企業的工人。畢竟，非國有企業所以能夠盈利，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有廉價的、隨時可以解僱的「自由勞動力」。

但是，儘管有政治風險，日益壯大的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和要求，使江澤民成為私有化的提倡者，當然，官方是不會使用這樣的術語的。1997年春季，江總書記在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他在激烈地抨擊了「左派」的「僵化」思想後，提出了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方案。除了與國防、高科技相關的企業和糧食貿易企業仍實行國有制外，大多數企業都將私有化或至少部分地非國有化。在「抓大放小」的口號下，除了特大型和關係國計民生的骨幹企業外，其餘大多數企業

都以前所未有的步伐開始了各種非國有制形式的改制。即使是最大型的國有企業也要轉變所有制形式，包括由外國和國內的投資者——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諸如養老基金會和地方政府等）——購買股權。此外，「國有制」這一概念也重新作了定義，只要政府持有的股份達到30%，就可以說還是「公有制」。

同年夏季，江的講話發給黨內各級幹部徵求意見，隨後又於7月在《光明日報》上公開發表。⁹ 在1997年9月於北京召開的中共第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批准了江的私有化建議。

中共第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

鄧小平時代結束後的首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主要議程，是使鄧小平親手挑選的接班人江澤民的領導地位合法化，在毫無爭議的情況下，出席大會的2000名代表一致投票表示贊成。江澤民在黨內的唯一對手、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喬石，不但退出了中央政治局，而且在中央委員會的193名委員中也未有一席之地。一種解釋認為，喬石，這位前秘密警察機構的負責人，提倡民主與法制，因此，他的失勢是民主化進程的倒退。¹⁰ 離開最高領導層的還有劉華清將軍，這樣，新產生的由七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沒有一位人民解放軍的代表。在中共十五大以後，中國最有權勢的三名政治家，按其在等級中的排序慣例，依次是總書記江澤民，總理李鵬（他不久後接任喬石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金融專家朱鎔基（將繼李鵬後任總理）。十五大後，江澤民集黨的最高領導、國家元首和軍隊統帥三個最高職務為一身，他的權力和聲望大幅度上升。但是，儘管江澤民的官銜要比他的前任毛澤東和鄧小平更多，他的個人權力卻遠不如其前任，因此，他的領導方式更多地是集體領導，而不是個人專斷。不過江在十五大後在政治上居於支配地位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在取得國內政治勝利後，他旋即對美國進行了為期八天的訪問，與克林頓總統舉行了最高級會議——他刻意地、有時十分尷尬地模仿鄧小平1979年對美國凱旋式的訪問。克林頓於1998年夏季對中國進行了回訪，他的訪問頗有帝王氣勢，僅隨行人員就超過一千人。克林頓的訪問出人意

料地大大加強了中美關係——雖然美國國內一些人指責美國總統「出賣」了美國利益，給他的訪問蒙上了一層陰影。¹¹

中共十五大的另一項主要內容是批准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方案，江澤民在1997年5月的講話中提出這一方案後，曾於夏季廣泛徵求了黨內的意見。依照慣例，大會並未就這一問題再展開討論，而是一致投票通過。儘管如此，對於一直信奉生產資料的國有制是社會主義本質這一斯大林教條的許多黨的領導人來說，這一方案令人尷尬，他們無法接受黨不再為社會主義而奮鬥這個事實。因此，整個私有化問題被披上了種種冠冕堂皇的理論外衣，在定義模糊的所謂「合股方案」以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空洞含混的理論下，官方不遺餘力地強調要繼續堅持「公有制」。

不過，無論最終新出現的是什麼形式的所有制，有一點是明確的，即國有財產的私有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可能需要十幾年或更長的時間。壓縮國有經濟勢必造成大量工人失業。官方承認，在一億多國有企業職工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工人是多餘的，這樣就會造成社會和政治不穩定，這正是共產黨擔心的。此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俄羅斯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造成的災難記憶猶新。而且，中國實行私有化方案的時機也不吉利，中共十五大召開的時間正是整個東南亞和世界金融、經濟危機加劇的時刻，金融危機很快又波及到香港。雖然東南亞金融危機暫時還沒有直接影響到中國，但其對中國造成的心理壓力卻是直接和深遠的，人們對把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混亂的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在開放股票市場方面依賴外國資本投資以給新近私有化的國有企業融資是否明智產生了懷疑。

中共十五大也不是沒有協調的地方。江澤民作的政治報告，最突出的內容是把大多數國有企業出售給私人投資商——無論用什麼標準衡量，這都是向全面實現資本主義經濟邁出的一大步。在江澤民作這一報告的主席台背景上，高懸著鑲有黃色的斧頭和鐮刀的巨大的黨旗。即使出席黨代會的2000名代表中有人注意到這種不協調之處，恐怕也沒有人願意作出評論。也沒有人談到1989年的北京屠殺事件，人們呼籲官方重新評價這一事件，但它依然是政治討論的禁區。¹²

* * *

江澤民出售國有企業的方案，預示著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擴張，這是對北京政權自稱的社會主義又一個沉重打擊。從一開始就是脆弱的、也許是虛假的中國社會主義，¹³ 主要的標誌就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佔統治地位。國有財產的私有化，進一步削弱了原本就所剩無幾的中國社會主義——即常規理解的那種社會主義。

為了填補社會主義觀念消失後留下的思想真空，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共產黨政權不遺餘力地提倡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1990年代，江澤民進一步加強了這方面的努力，日益強烈的大國民族主義最終成為共產黨中國的唯一意識形態。

當然，民族主義一直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強大力量。從五四運動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直到整個革命戰爭年代，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幾乎總是交織在一起。在1920年代中期的城市革命和1930年代、1940年代毛以農村為根據地的革命中，民族主義革命和社會革命密切相關。¹⁴ 事實上，毛的革命——與日本對中國的入侵巧合——在許多方面，必然採取民族獨立和社會革命融為一體的戰爭形式。無論是在1949年之前還是之後的毛的時代，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目標以相互推進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儘管在1949年共產黨掌握政權後，兩者之間的內在矛盾越來越難以協調。

然而，只是到了鄧小平時代(1978–1997)，民族主義最終壓倒了革命理想和革命價值觀念。1978年後，社會主義理想和目標迅速衰退，最終完全讓位於單純的「繁榮富強」的民族主義目標。實際上，在鄧小平時代之初，社會主義就被認為毫無實際意義，鄧小平早就取消了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差別，1980年，他宣佈：「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使國家繁榮富強。」¹⁵

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先驅者反傳統的精神，這種精神與後來數十年人民革命鬥爭的目標是基本一致的。現在，反傳統文化的精神為讚美傳統文化和歷史遺產的保守的民族主義精神所取代，這是完全符合邏輯的；官方的歷史哲學的演變就是這種現象的反映。舊的毛主義所強調的歷史上的階級鬥爭和農民起義基本上被丟棄，取而代之的是歌頌歷史上帝王將相的成就和近代企圖使中國現代化的統治

人物——包括鎮壓了十九世紀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曾國藩，甚至還有蔣介石。與之相應的是對傳統文化不分青紅皂白的頂禮膜拜，在江澤民擔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後的這些年中，這種現象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這種保守的文化民族主義表現為1994年大張旗鼓地慶祝孔子誕辰2545週年紀念活動、在學校重新開設儒學、在北京成立「國際孔子研究會」——研究會聘請信奉新儒家學說的新加坡獨裁者李光耀擔任名譽會長，最不可思議的是由準官方組織的朝拜神話中的「黃帝陵」儀式，包括叩頭和焚香。

香港回歸

中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並不是只局限在模糊的文化民族主義領域。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在人民共和國和海外華人社團中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愛國主義熱潮，其熱烈程度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投降後所僅見，是中國民族主義精神的具體體現。

對中國所有的政治派別來說，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是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和侮辱的最典型的象徵。1839—1842年鴉片戰爭後（鴉片戰爭是為保護英國鴉片走私者和保證東印度公司——印度事實上的殖民政府——的利益而發動的），英國把香港作為戰利品而侵佔的。英國對香港的侵佔，是當時帝國主義強加給中華帝國的許多「不平等條約」中第一個產物。它很快成為十九世紀西方國家強加給亞洲和非洲殖民統治的模式。由於英國在其對香港統治快要結束之前，開始在香港建立所謂「民主」和「自治」體系，所以，需要切記的是，在英國對香港的統治歷史上，香港總督是由英方任命的擁有貴族身份的官員*擔任，他只對設在倫敦的英國外交部負責，香港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社會，一小批外國精英統治和剝削臣屬的當地居民，在這個殖民地社會裏，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遍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¹⁶

1949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的中國統一，敲響了英國對香港

* 其實近幾十年來的大多數港督都由英國外交部派出，他們退休回國後才封為貴族，進入上議院。——編者註

殖民統治的喪鐘——假設是蔣介石的國民黨贏得內戰，也將會是這個結果。但在事實上，可能正是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才延長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如果是一個非毛的政權取得勝利，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因為，在毛澤東統治期間（1949–1976），經濟上的「自力更生」使中國基本上與世隔絕，這樣，處於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得以成為中國對外經貿往來、與世界經濟聯繫和吸收先進技術的經濟紐帶。正因為如此，儘管毛政權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形象因此而受到損害，香港的政治前途問題還是被擱置起來。

然而，在後毛時代，隨著鄧小平大權在握以及在對外經濟關係上實行「開放」政策，英國統治下的香港不僅在政治上是時代錯誤，在經濟上也已變得多餘。所以，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把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請到北京來，告訴她殖民時代結束了。其後，在中方主導下雙方就此展開談判，達成了1984年中英兩國的「聯合聲明」，聲明規定，香港（大英帝國在海外最後一個有影響的殖民地）將於1997年歸還給中國。中英雙方還同意，香港的經濟制度保持50年不變，在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

在香港正式回歸中國的前幾個月，鄧小平逝世，未能目睹這一盛事；因此，江澤民能夠主持1997年7月這一民族主義的凱旋勝利，純屬他的政治運氣。雖然先前的有許多關於金融和政治混亂的猜測，但香港政權的移交進行得十分順利，只是各種儀式太多——當然是指中方，旨在顯示巨大的愛國熱情和滿足民族心理。考慮到這一舉世矚目的事件的重要歷史意義，這種愛國熱情確實是十分真實的。但是，北京早就在培養忠誠於「祖國」的愛國情操。1984年，至少是在涉及到香港問題時，鄧小平對愛國主義作了新的定義：「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他還說：「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¹⁷

香港的中國富豪最熱烈地響應北京的愛國主義呼籲，他們匆匆地加入了各種「愛國協會」。許多富有的香港資本家早就在中國大陸的企業有著巨額投資，與共產黨政權有著不可分割的金融聯繫。其中一些

資本家，例如船業大亨董建華，成為香港新政權——即由北京控制的「特別行政區」的領導人物。香港的中國大資本家的愛國主義和他們與中國共產黨精英水乳交融的關係，對理解鄧小平時代人民共和國發生的社會變革，意味深長的。

台灣

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台灣成為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最後障礙。然而，台灣與大陸的分離，無論從歷史和政治上來看，都是一個遠比結束英國在香港殖民統治更加複雜的問題。台灣問題充滿了危機。

在現代世界，根據衡量國籍的一般通行標準，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是毫無疑問的。台灣的種族、文化、語言和居民都屬於中華民族。除了少部分已逐漸消失的屬於少數民族的原住民外，台灣的居民主要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雖然在許多世紀中為數不多），大陸居民早在公元1000年就開始移居台灣。1683年，台灣正式歸屬於滿清帝國，被作為福建下屬的一個地區。現在台灣的大多數居民，都是在十八、十九世紀從海峽對岸的福建來到台灣的移民後裔。

現在有關台灣地位問題的不確定和爭議，主要是由一些歷史原因造成的。其中之一是1894–1895年的中日戰爭，台灣作為戰利品，成了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持續了半個世紀，台灣民眾與現代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和思想主流完全隔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才回歸中國。1945年，當時的中國政府是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國民黨軍隊不是把台灣當成解放了的殖民地、而是當成一塊被征服的領地對待。¹⁸ 國民黨在內戰中被共產黨打敗後，其殘軍和官僚逃到台灣，在台灣原有的1000萬人口上，又增加了200萬大陸人。台北的國民黨政權宣稱是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國對此表示支持。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事實上給台灣提供了軍事保護，美國還慷慨地給台灣提供經濟、外交以及軍事援助。雖然台灣國民黨政權的生存依靠美國的第七艦隊，但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代表全中國的政府這一虛構的基礎上。因此，國民黨政權逮捕、有時甚至處決鼓吹台灣獨立的人，這在今天看來有些不可思議，但卻完全合乎邏輯。實

際上，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任何主張台灣與中國大陸分裂的人，與同情北京的共產黨政權同樣是政治異端。

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統治的這種虛構的合法性，不可能無限地繼續下去。1970年代初期，尼克松總統開始了與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進程，¹⁹台灣的精神支柱開始倒塌。1972年中美雙方發表的「上海公報」，宣佈美軍將逐步從台灣撤出（雖然沒有承諾放棄軍事援助），台灣的未來是中國的內部事務。1979年中美係正常化後，美國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然而，由於鄧小平急於與美國關係正常化，因此同意美國堅持的在台灣保留美國「非官方的」政治與文化代表處、繼續給台灣提供先進的軍事技術的條件，從而造成了新的模糊性，為未來的衝突留下了隱患。

在近二十年後鄧小平時代即將結束的1995年，這種安排導致的衝突、實際上是戰爭的可能性以咄咄逼人的方式暴露出來。北京的立場在鄧小平時代基本上沒有變化，即實現台灣與大陸的統一，盡可能採取和平的方式，在必要的情況下不排除使用武力。但是，台灣在這些年卻發生了變化。1975年蔣介石去世，其子蔣經國於1988年去世。此後，在已經現代化和富裕的台灣，民主改革加速了政治上的「台灣化」進程。實際上，國民黨統治集團本身也逐漸由台灣人控制。1988年，台灣的副總統李登輝繼任小蔣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和國民黨主席，1996年，李登輝又成為台灣第一位經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台灣局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出於他所領導的國民黨的立場和台灣所處的國際環境的要求，李登輝在口頭上也承認一個中國的目標，但是，他逐漸放棄了「一個中國」的政策，企圖使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他採取了最聰明的方式推進台獨政策，即改善與北京共產黨政權的關係——允許台灣人訪問大陸（越來越多的台灣人湧入大陸）；鼓勵與人民共和國的貿易；允許台商在大陸投資，台商在大陸的投資不久就超過了美國，達到250億美元；與北京的代表就一些實際問題進行會談，諸如台灣與大陸的直接通航、捕魚權利和移民問題等。但是，貿易、投資和關於雙方共同利益的會談，並沒有像北京期望的那樣促進「和平統一」，反而顯出台灣作為一個小小的獨立國家，在大國支配的世界中，勇敢地為自己開闢道路。

然而，1995年6月李登輝在美國的訪問，完全揭開了他遮遮掩掩的台灣獨立運動(包括為了加入聯合國而許諾提供10億美元這一徒勞而尷尬的事件)的面紗，暴露了台灣獨立可能給國際安全帶來的威脅。自從1972年尼克松開始與中國關係正常化進程後，有關各方都理解，「一個中國」的政策，包括台灣高級官員只能以個人身份、而不是官方身份訪問美國。在二十多年裏，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都遵守了這一約定。但是，李登輝總統接受了他的母校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回校聚會的邀請，因而向美方申請入境簽證。美國國會兩院中包括開明派的民主黨黨人以及保守派的共和黨黨人，儼如過去(五十年代初替國民黨說好話的——編者)中國走廊客(China Lobby)的復活，在他們雙方的斡旋下，參眾兩院都通過決議，歡迎李登輝來美。當時面臨再次大選壓力的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很快作出妥協，不顧國務院的反對，批准給予李登輝簽證。

北京對李登輝這次大張旗鼓宣傳的所謂「私人」訪問的反應可想而知。北京中止了江澤民與李登輝間接進行的有關「和平統一」問題的談判，也中止了與台灣就捕魚權利和移民等問題進行的卓有成效的磋商。中國召回了駐美國大使。1996年6月和8月，中國在台灣附近海域進行了先進導彈的發射試驗，又在秋季再次進行導彈試驗，企圖影響台灣的總統大選。美國對此作出緊急反應，派遣了由兩艘核動力航空母艦組成的艦隊進駐靠近中國的海域。戰爭陰雲密布，令人生畏，中國和美國都作出了妥協。在克林頓總統和江澤民同意於1998年進行互訪後，兩國恢復了低級別的軍事和外交聯繫。

要為一個獨立的台灣尋找歷史根據並不是一件難事。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半個世紀裏(1895-1945)，台灣人民在現代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與中國分離，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標識，1949年後台灣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歷史道路，進一步加深了兩岸差別。²⁰然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難以作為台灣獨立的歷史例證，國民黨本身的存在就是中國統一和「一個中國」的證明。此外，在後殖民統治時期，把由於外國殖民統治製造的「國家」作為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歷史證明，是牽強附會的民族主義論點。

但是，無論借助於歷史案例或道德論據來論證台灣獨立有多強的

說服力，鐵一般的事實是，一個獨立的台灣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是行不通的。台灣目前的準獨立地位完全是在美國軍事力量的保護下才得以存在。但是，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優勢不會永遠保持下去；大多數軍事專家認為，事實上，這種優勢最多保持到新世紀的頭十年，甚至在此之前就可能不復存在。幾乎所有的亞洲國家都承認中國在東亞的支配地位，沒有一個國家支持台灣或美國對台灣的模糊政策。正如一位享有盛譽的亞洲「老資格政治家」在回答《紐約時報》記者關於為什麼沒有一個亞洲國家在1996年的台海危機中支持美國時說的：

中國在這裏存在了三千年。美國在亞洲才五十年時間。我們認為，美國在這裏還能有二十年時間。但是在美國人離開後，我們還得繼續與中國相處，我們無法跟中國抗衡。²¹

因此，無論採取什麼方式，「和平統一」是台灣最明智的選擇。1998年夏季克林頓總統在對人民共和國進行正式國事訪問時，明確闡明了自尼克松總統於1972年簽署〈中美聯合公報〉後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的具體含義，他說：「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或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我們不認為台灣應該成為任何需要以國家名義加入的組織的成員。」²²

儘管很難保證台海兩岸都能理智地解決這一問題，但人們必須要求當事的有關政府（台灣、美國和北京）要努力避免會給太平洋兩岸都帶來災難的戰爭。人們希望，和平統一進程（很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進程）將在承認台灣獨特的現代歷史的基礎上，給予台灣充分的自治權，希望在中國與其斯大林的過去徹底決裂、開始進行意義深遠的民主改革的基礎上，實現和平統一。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

鄧小平開創的市場經濟改革時代，產生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經濟成果。自從1978年開始，中國經濟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長，在現代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大國像中國這樣在這麼長的時間裏能保護如此高速度的經濟發展。中國經濟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就翻了兩番

——如果中國能繼續保持這樣的經濟發展速度，那麼在新世紀的頭幾十年時間裏，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就會接近美國。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結果卻難以讓人恭維。當然，經濟繁榮使絕大多數中國人得到了物質實惠，生活水平比鄧時代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更好的住房、改善了的飲食結構、有條件購買琳琅滿目的消費品。²³對於長期處於貧困狀態、被剝奪了自己勞動果實的人民來說，不應該低估這些物質成果在物質和心理上的意義。

然而，經濟進步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後毛時代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付出的代價和造成的後果，是中國的環境在人類歷史上以空前的規模遭到破壞，包括可耕地面積銳減、工業對空氣和水質的大範圍污染。²⁴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還有官商和政府官員嚴重的貪污腐敗，貪得無厭的官員巧取豪奪，盤剝貧困和政治上沒有反抗能力的民眾、特別是農民。事實上，正是腐敗的地方官員的橫徵暴斂，是1990年代中國農民越來越頻繁和激烈地進行反抗的主要原因。²⁵

在物質進步的同時，由於市場經濟對生產「效率」要求越來越高，絕大多數勞動群眾的生活保障越來越不穩定。市場經濟的效率要求取消毛時代的勞動者享有的社會福利和職業保障，增加了勞動者失業的威脅（現實中失業率不斷上升）。即使有工作的工人，特別是那些在草草建立的私人或「集體」企業中勞動的青年工人和女工，安全生產常常難以得到保證。在私人或「集體」企業中，許多工人在生產事故和火災中喪生或致殘，其情況之嚴重，在現代工業史上實屬罕見。正如澳大利亞著名學者陳佩華（Anita Chan）總結的，中國工人所受到的虐待，還包括「強迫勞動；限制工人的人身自由、物質虐待；只能拿到勉強維持生存甚至更低的工資；對工人的普遍施暴」。²⁶

經濟快速增長不可避免地造成社會分化，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刑事犯罪潮（根據官方數字，從1978年到1990年，犯罪率增加了十倍），城市和農村都出現了犯罪集團，僅在1997年，中國處決的罪犯就達到3000人，超過了同期全世界死刑犯的總和。²⁷1949年前的社會醜惡現象又在城市死灰復燃——妓女、吸毒、賭博和黑社會。共產黨政權在1950年代曾徹底地消滅了的這些醜惡現象，如今又氾濫成災。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不幸的社會結果，是極端的社會和

經濟不平等現象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中國從一個相對平均的社會，轉變成一個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大、最明顯的社會，其兩極分化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了作為亞洲資本主義榜樣的台灣和韓國。毛時代留下來的不平等——城鄉差別、沿海與內地的差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差別——在改革時期進一步加深。但是，更有深遠影響的，是在同一地方、同一地區內部出現的巨大的社會經濟差別，這種差別是國家推動的市場關係迅速導致社會階級分化的反映。例如，農村的商業化已經產生了一個新農村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由控制著相對大量的土地（僱用勞力耕作，或出租）的資本主義式的農民、擁有各類工商和服務企業的私人老闆、農村黨員幹部組成，新農村資產階級與黨員幹部有著密切的聯繫，其成員有許多直接就來自共產黨。²⁸

與此同時，新的市場機制已經驅使幾乎佔農村勞動人口的一半的二億多「剩餘」勞動力離開了土地。他們的命運與世界上所有經歷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農民的命運一樣，是無產階級化，而且，毫無疑問，他們也將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無產階級化進程最快的農民。這些離開土地的農民，可能約有一半的人在鄉鎮或其他企業中找到了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作。其餘的一億多農民成為流動勞動力，組成了「流動人口」，他們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地尋找一切他們能幹的工作。不用說，他們是無情剝削下的受害者——如果算上那些倒閉或將被出售的國有工廠的失業工人，他們的人數將達到2億人。

城市地區的經濟和社會差別比農村更加醒目。在清貧的毛時代，中國城市居民的生活和消費水平基本相同，現在，由共產黨腐敗的高級幹部及其利用一切市場機會發財的親戚、私營工商企業主、銀行家、領取高薪的技術人員和經理組成的精英，成為城市的主人。這些佔人中總數比例不大、但絕對數量龐大的暴發戶，支撐著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奢侈品市場²⁹——他們中一些人赤裸裸地炫耀自己在一頓晚餐上喝的進口葡萄酒的價錢，就比一名工人全年的工資還要高。至於那些在工廠裏辛苦勞作的工人——世界上最龐大的工業無產階級的成員，他們的「鐵飯碗」——為狂熱的市場改革家們冷嘲熱諷的、國有企業職工傳統上享受的一定程度上的職業保障制度——已經由於市場改造和國有企業的出售而被「砸碎」了，其結果是越來越多的城市工人被

驅趕到由流動勞動力構成的流動無產階級的行列中，這是世界最大的、人數增長最快的一支失業大軍。一方面是新生的城市資產階級精英在時裝沙龍和進品汽車商店裏揮金如土、窮奢極慾的生活，另一方面是住在貧民窟或睡在火車站的流動勞動力，中國城市的貧富兩極分化之懸殊與任何資本主義大城市都沒有什麼兩樣。就貧富的極端兩極而言，上海和廣州完全可以與紐約、倫敦、里約熱內盧、墨西哥城和加爾各達相比。

市場經濟產生的不平等現象並非完全出乎意料。畢竟，對毛的「平均主義」的激烈批判是改革時代的前奏，鄧的知識分子把「平均主義」視為中國社會的萬惡之源，是經濟落後和社會弊端的禍根。回顧歷史，為進入市場社會所作的輿論準備，當首推鄧小平對個人慾望和貪婪的鼓勵以及他對不平等的預先認可，這反映在他的兩句名言中：「致富光榮」、「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而，雖然出現社會經濟差別沒有出乎人們的意料，但無論市場經濟的支持者（甚至是反對者）都沒有預見到貧富之間的實際差別會如此懸殊。當然，鄧小平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導致的不平等和其他社會後果，並不僅僅是中國獨有的現象。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特點。但是，這些現象在中國卻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其發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堪稱世界歷史之最。中國的資本主義給經濟帶來的活力和給社會造成的破壞，是此前的任何國家都難以比擬的。

事實上，作為後繼者的中國的資本主義，已經達到馬克思當年極富遠見的預言的頂點，即它導致「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係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³⁰這是一個苦澀的歷史嘲諷，難以駕馭的資本主義發展進程及其造成的所有不可避免的社會後果，卻是在共產黨政權領導下實現的，而植根於近一個世紀中國思想傳統的共產黨意識形態，恰恰主張避免資本主義邪惡的社會弊端。³¹

不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雖然開創和促進了——並且從中獲利——資本主義在中國的野蠻發展進程，但他們仍感到有必要宣稱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在正式批准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的中共十五大上，總書記江澤民多次提到中國正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宣稱中國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概念在

1989年趙紫陽下台後就很少提及)，³² 把自己擺在從馬克思到毛澤東、鄧小平的革命領袖行列中。他還(似是而非地)大談「社會主義民主」。20年前，他的保護人鄧小平在自己的復出過程中，曾嫻熟地運用了「社會主義民主」這一概念。

猜測這些含混不清的理論概念對江和鄧後的其他領導人在思想和心理上有什麼影響(如果有的話)是徒勞的。但是，這些概念的政治含義卻是再明白不過的。與馬克思主義傳統及其在中國的主要信徒一脈相承的思想形式，為江澤民作為1949年革命的捍衛者提供了法統依據，因為正是這場革命創造了江如今統治的這個國家。此外，這層薄弱的思想外衣，也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即專政)提供了根據，因為正是在黨的領導下才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創建了人民共和國——也正是中國共產黨依然宣稱自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目標的忠誠實踐者。

社會主義與民主

江澤民重提「社會主義民主」這一概念不免令人費解。在國家的推動下，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經緊鑼密鼓地發展了近二十年，與此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是政治專制，即使是民主社會主義的觀念都已是官方所不能接受的異端。江澤民畢竟與鄧小平的遺產緊緊捆在一起，實際上，他把鄧小平的思想和政策，冠之以「鄧小平理論」，上升到國家官方的意識形態高度。但是，他所謂的「鄧小平理論」，只不過意味著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與政治專政的結合。在中國的這一發展理論中，更多地是民族主義的內容，與社會主義幾乎毫不相干。不過，北京政權依然含含糊糊地保證要實現社會主義，這顯然是建立在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信念的基礎上，即經濟和技術發展到一定的高水平階段，社會主義就會自動降臨。如同鄧小平反覆強調的，只要生產發展了，就必然會出現社會主義，³³ 雖然他沒有解釋怎樣出現。而這也正是他的繼承人理解的「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原則。然而，按照鄧小平的觀點，建設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向「發達的」社會主義轉變所必需的物質基礎，至少要到2050年才可能實現。他的繼承人又進一步發展了這個理論，把

社會主義實現的時間又向後推遲了半個世紀。江澤民預言，社會主義社會將在廿一世紀末實現。³⁴ 無論是那個時間實現，社會主義都被推到將來，在事實上與現在的希望和行動沒有任何聯繫，因而也是毫無意義的。

任何可以想像的中國社會主義的真正源泉，不可能是在遙遠未來共產黨體制下的發達經濟之中，而是存在於此時此地反對共產黨政權的民主鬥爭中。社會主義既需要理想，也需要社會實踐者。社會主義的理想不可能由偉大導師自上而下地灌輸，只能是在與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造成的社會邪惡進行鬥爭的過程中自然產生。而社會主義的實踐者，很可能就是無產階級，這並不是因為馬克思的正統教義中是這樣規定的，而是因為工業化正在迅速使中國工人成為人數最多、受剝削最深、政治上最重要的社會階級——也是中國共產黨最害怕的階級。

從中國歷史的特點上來看，中國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至今還宣稱是這個階級的代表——並不是共產黨政權的主要威脅。畢竟，這種情況只是發生在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東歐共產黨國家（在較低程度上，也包括蘇聯）中。在中國存在著一個悖論，即任何真正的中國社會主義運動，在反對資本主義的同時必然地要反對共產黨，這是一個運動的參加者和觀察家都不得不面對的悖論。這種明顯的自相矛盾是源於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資本主義基本上是共產黨國家創造出來的，共產黨領導人和幹部是建設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角，在這種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主義體制依靠於共產黨國家的權力保護，而許多黨的官員則在資本主義體制中獲得巨額利益。共產黨與資本主義這種看來怪異的聯盟（如果回顧一下共產黨國家是如何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也許人們對這種聯盟就不會感到吃驚），使中國的新資產階級完全不可能成為民主變革的熱心推動者。相反，對共產黨國家的挑戰將來自中國資本主義的受害者，而不是其受益者，將來自日益壯大的、深受剝削的工人階級及其同盟。因此，在當代中國的政治中，能否自由地組織成立獨立的工會將成為最根本的問題，這是爭取民主和人權鬥爭的關鍵一環。

在鄧小平後的中國進行民主變革的前景如何？隨著1978年後中國令人眼花繚亂的巨大經濟變革和後毛時代的有著重要意義的政治變

革，已很少有人還執著於一度十分流行的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形象，即一個一成不變地實行獨裁專政、沒有能力進行內部調整的共產黨政權。誠然，鄧小平一旦大權在握，便毫不猶豫地背棄了他關於「社會主義民主」的諾言，也背棄了曾是他同盟的1978-1981年西單民主牆運動的參加者（有時甚至把他們投入監獄）。然而，早期的鄧小平政權曾經在很大程度上糾正了毛時代的專制實踐，釋放了成千上萬被關押在監獄或勞改農場的政治犯，其中絕大多數是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為他們「平反昭雪」。在1980年代，儘管情況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思想文化界的多元化在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雖然實際數字難以確定，但所有的觀察家都同意，在1980年代初期，因所謂政治罪行而入獄的人數（用《人權觀察》報告中的話說）「驚人地下降了」。³⁵ 總的來看，國家對社會日常生活的控制也顯著放寬。

然而，斯大林式的政治體制依然如舊，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進一步加強了這種體制，³⁶ 鄧的繼承者也如同鄧一樣，把這四項基本原則當成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一黨統治（更準確地說，是列寧主義等級制中處於核心的一個委員會的統治）繼續保持不變，不允許任何形式的政治組織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提出挑戰。宣稱有6000萬黨員（這也不過只佔總人口的5%）的共產黨本身，拒絕在內部等級中進行任何民主化的嘗試。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沒有就任何重要事項進行公開的辯論或爭論，沒有一個代表對江澤民或黨的其他領導人提出批評意見，所有的決定都按照慣例一致通過。這正是斯大林主義的傳統。

中國共產黨保持著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它作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而存在，其官僚觸角從首都一直延伸到全國所有的角落，政治警察（由數量龐大的秘密警察組織構成）的權力沒有絲毫削弱。這不由不使人們對正在進行的村級選舉的民主意義產生疑問。在鄧小平時代剛開始的1979年，選舉法中就規定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採取直選形式，1986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此又作了修改。但是，當民主積極分子提出要在地方選舉中增加一定程度的民主內容時，1980年和1986年的兩次民主選舉試驗又被中止。³⁷ 1990年代中期的早些時候，又恢復了村級民主選舉。隨後，江澤民許諾要盡快把民主選舉推廣到鄉鎮一級（即人口不超過十萬的小城市）。村和鄉鎮的選舉也許有助於反映群眾

對地方事務的意見和對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的監督，但無論地方選舉有多少長處，它對於總的民主進程並沒有多大影響。村和鄉鎮中的黨組織和警察機構，將使地方選舉只能涉及純粹的地方事務。

自從1980年代中期後，農村一些(部分工業化了的)地區悄然開始了自己的民主創新，比起官方組織的村級民主選舉，這種民主創新更有意義，它使群眾對當地黨政幹部有了一定程度的監督權，同時也促進了半集體制的經濟生活，一些參與了民主創新的知識分子將這種發展稱之為「合作制式的民主體制」。³⁸

雖然中國共產黨對社會的控制，在1980年代明顯放鬆，但在1989年6月軍隊鎮壓了民主運動後，中國又開始了一個新的漫長的政治專制時期。在解放軍鎮壓了民主運動後，秘密警察機構進行了大規模的搜捕，除此之外，對社會又重新實行了鄧小平時代之前的政治控制和思想鉗制。知識分子、記者和大學生是政治警察的主要目標，不過，共產黨內部也進行了清洗，數千名黨員幹部因同情學生運動被開除出黨或受到紀律處分。參加「北京之春」的工人受到了最野蠻和殘酷的對待，許多工人在草草審訊後即被處死或被判處漫長的刑期。對報紙、刊物和書籍實行了更為嚴厲的檢查制度。

當然，1989年的民主運動及對運動的血腥鎮壓，是鄧小平時代後期和江澤民「集體領導」初期實行這些極端的壓制政策的直接原因。但是，東歐和蘇聯共產主義的解體造成的恐懼也是導致專制氣氛的原因之一。鄧小平和中國其他領導人從蘇聯的解體中得出的教訓是，必須加強列寧式的國家和黨的專政權力，像戈爾巴喬夫所推行的這些民主政策，對共產黨政權的生存是極其危險的。他們得出的另一個教訓是，必須「深化」市場經濟改革，以加快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從而緩解人民的不滿情緒。1989年後，正是這種資本主義發展與政治專政的結合，成為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指導原則，1980年後期在一些知識分子中極有影響的新權威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就已預示著這一原則。正是這一原則，滿足了鄧小平害怕發生「動亂」的心理。對鄧小平來說，任何動亂都會使他聯想到毛的文化大革命和後毛時代的民主運動。1990年代初、中期資本主義的繁榮發展，幸運地為鄧及其繼承人堅持的自相矛盾的「社會主義制度」撐起了門面。

在成千上萬名政治專制的受害者中，最著名的是鄧小平的老對手魏京生。魏在1979年就曾提出警惕鄧小平「蛻變為獨裁者」，³⁹ 他因這類言論而於1979年3月29日被捕，自此開始了對民主牆運動的鎮壓。在經過僅一天的審判後，魏被以「反革命」行動罪名判處15年徒刑。魏是中國受迫害的許多持不同政見者中第一位著名的受害者。對不同政見者的鎮壓在中國一直未曾中止過，雖然鎮壓的程度隨著共產黨領導人的政治利益和傾向的變化而有所不同。

1993年9月，還差六個月就滿15年刑期時，魏京生被釋放出獄。但是，在現在中國狂熱的資本主義世界中，這位44歲的民運人士的「自由」時期卻十分短暫。雖然面臨再次入獄的威脅，但魏在1993年時如同在1979年時一樣，沒有向當局低頭。他抓緊時間發表呼籲政治改革和民主改革的文章。為此，他又一次被捕入獄，1995年12月，他被指控參加「陰謀顛覆政府」的活動而被判刑14年。魏京生第二次服刑時間不到兩年。在越來越強大的國際輿論的壓力下，北京政權於1997年11月，即江澤民即將訪問美國之前，釋放了魏京生，並讓他流亡國外。

在兩次刑期之間的短暫時間裏，魏京生曾寫信給王丹，建議中國分散的不同政見者要「互相幫助」。後來這一建議被國家檢察官當作魏京生和王丹陰謀顛覆政府的罪證。王丹是北京大學的學生，1989年民主運動的學生領導人，他因「反革命宣傳」罪而入獄，在服刑四年後，被假釋出獄。獲得自由後，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為其他政治犯的家庭提供人道援助的活動中。他還撰寫文章，呼籲進行民主改革，一些文章刊登在香港和台灣的媒體上。他被控與「境外敵對勢力」相勾結，從事「顛覆政府的陰謀活動」。⁴⁰ 1995年5月，王丹受到「住所監視」，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不得與外界有任何聯繫，直到1996年10月，他被指控犯有「顛覆」罪，隨後被判刑11年。但在服刑不到兩年後，他於1998年4月，即克林頓總統正式訪華前不久被釋放出獄，被迫流亡海外。

在第二次審判中，無論是魏京生還是王丹都沒有被指控犯有過去說的「反革命」罪，這與對他們的第一次審判不同。他們現在是以參加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的罪名被捕入獄。這一用語的變化是因為共產黨決定取消《刑法》中的反革命罪，一方面是為了避免給國際輿論以中國進行政治迫害的口實，另一方面純粹是為了從法律上正式承認革命

早已結束，雖然這種承認來得太晚。1997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決定制定新的刑法，刪除原刑法中的「反革命」罪，給那些已經在牢裏的犯人新增了一條「危害國家安全」罪。這種改變不過是概念遊戲。對那些原來被作為「反革命分子」關押的犯人來說，對新的「國家安全」範圍的解釋，已足以包含過去所有的「反革命活動」。

法律的這種改變，並沒有改變北京長期以來以普通刑事罪名來關押政治犯的實踐，特別是政治犯常被籠統地加上「流氓」或「小偷」的罪名。從刑法中刪除了「反革命」罪，也沒有減少通過行政手段而不是司法程序判決入獄的政治犯的人數。劉曉波的命運就是如此。1989年6月4日凌晨，他也在天安門廣場參加了與解放軍的談判，為廣場上的學生爭取到安全撤離的通道。⁴¹ 他因此而被以「反革命煽動」罪入獄兩年。1990年代中期，劉寫呼籲書和公開信要求進行民主改革、與台灣和平統一、與達賴喇嘛就西藏的地位進行談判。其結果是，1996年10月7日，他在北京的家中被捕，公安局判他進行三年的「勞教」，就是說，把他送到勞改農場。

許多不同政見者為避免入獄而逃亡海外，特別是在1989年以後。其中一人是王希哲，他在1996年下半年逃到美國之前已經坐了近二十年監獄。王是筆名為「李一哲」的三位年輕知識分子中的一位，他們是1970年代初期十分有影響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一文的作者，這篇文章激勵了1978-1981年的民主牆運動的知識分子。但早在此之前，文章的三位作者就已被捕。1975年3月，在毛政權最後一年拜占庭式的派別政治鬥爭中，王希哲和其他兩位作者被送進了監獄。1979年2月，鄧小平已經復出，「李一哲」三人被釋放出獄和「平反」。其中兩人適應後毛時代的潮流，利用鄧小平政權提供的新機會作生意。但是王希哲作為一個獨立的民主馬克思主義者，繼續致力於自己的事業。他發表了大量文章批評毛和鄧時代缺乏社會主義和民主，在魏京生被捕後，他更加尖銳地批評鄧小平，不久，他得出結論，認為中國共產黨本身已經成為一個官僚統治階級，他的這一結論是鄧小平時代最異端的思想罪。1981年4月，他被作為「反革命分子」再次被捕入獄，刑期14年。1993年，王希哲被假釋。擔心由於繼續發表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而被抓，儘管他的觀點在日益非政治化的中國基本上沒有引起什麼反

響，王希哲還是決定躲藏起來，最終也流亡海外，1996年下半年，他到了美國。

* * *

1989年後，對工人階級的政治鎮壓是最殘忍的。在整個1980年代，中國領導人一直懷有「波蘭恐懼症」，他們害怕出現由工人和知識分子組成的團結工會式的聯盟，這將對共產黨政權構成嚴重的政治威脅。雖然很少有知識分子有意與工人聯盟，政府還是對可能導致這種結果的工人的任何不滿或騷動迅速採取鎮壓行動。參加1989年民主運動的工人受到的懲罰，遠遠比學生積極分子要嚴厲得多。1989年6月，許多工人因所謂的暴力活動在短暫的審訊後即被處決。⁴²被捕的工人數量遠遠超過學生數量，在同一罪名下，工人被判的刑期比學生更長。即使是政府通緝令中所列的學生要犯，受到的待遇相對也是比較寬大的。例如，通緝令中最引人注目的王丹，被判處四年徒刑，而參加民主運動的工人積極分子，通常受到的懲罰最低是15年徒刑直到死刑。⁴³

對那些在民主運動中企圖組織工會但未能成功的工人，政府特別採取了最殘酷的懲罰。1989年6月，一些組織者被公開判處死刑，其他一些參加了完全是和平的工會活動的工人，被政府加上從事暴力活動罪而判處漫長的徒刑。在一些情況下，工會組織者被關進監獄，既不審訊也不提出任何指控，韓東方就是一個例子。韓東方是北京鐵路局的一名維修工，是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組織者之一。1989年6月他被捕入獄，官方沒有提出任何指控，直到1991年，因害怕他因肺結核死於獄中，才被從獄中放出。獲釋之後，雖然患有疾病、身無分文並常受到警察的騷擾，但韓東方繼續他組織工人的運動。他解釋說，正是因為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才有必要成立自由工會，「如果中國現在允許這些資本主義組織迅速發展，為什麼不能允許成立自由工會以保護工人的利益？我希望黨的工會能保護工人，但是他們的行動令我失望。他們沒有盡他們的職責。」⁴⁴

1992年5月，在國際輿論的強烈批評下，北京政權允許韓東方以

到美國學習的方式流亡。但是，1993年夏季，韓東方回國時，在海關被拒絕入境，實際上他成了永久流亡。

中國共產黨當局在鎮壓致力於組織自由工會（尚無成功先例）的工人活動家時，粗暴地踐踏工人基本的人權，這是中國人權記錄最差的領域。由於事關根本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秘密警察和國家安全機構特別致力於處理「勞工問題」。這種政治擔心由來已久，即對任何不受共產黨組織控制的團體或組織的列寧式的擔擾。正是出於這種夢魘，共產黨領導人決意鎮壓對中華全國總工會——堅定地在黨的控制之下——的壟斷地位任何可能的政治威脅。鄧小平市場經濟改革所產生的經濟利益，使得共產黨國家的生存日益依賴於它所創造的官僚資本主義體制的成功。中國的資本主義反過來又依靠共產黨國家向其提供足夠量的勞動力，以壓低工資和制約工人。正是這些功能，是人民共和國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以能夠如此吸引國內和國際投資者的主要因素，也是經濟迅速增長的主要因素。這些「特色」與自由和獨立的工會是不相容的，因此，成立自由工會就成為中國最大逆不道、最危險的政見。

總的來說，共產黨國家把獨立工會作為非法組織、在這類勞工組織處於萌芽狀態時便堅決鎮壓、逮捕工人活動家（或令其流亡國外），最大限度地滿足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利益（特別是企業官僚們的利益）。

對工人的壓制正是在中國城市工人階級處於最艱難的時期進行的。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觀念和實踐統治著弱小的、收入菲薄的勞動群眾的時期；是政府計劃把部分國有企業私有化、從而給已經十分龐大的失業大軍再增加4000萬人之多的時期；是「市場經濟」要求基本上取消毛時代留下的社會福利體制、使企業和政府減少在失業救濟、養老金和醫療等方面的開支的時期；是許多城市工人家庭因家中的女性成員、特別是年過30歲女性成員不得不下崗而收入下降的時期。⁴⁵此外，新官僚們名目繁多的橫徵暴斂，例如公立小學的亂收費等，使工人階級家庭的生活雪上加霜。大城市中官方公共建築的速度放慢，減少了外出打工的就業機會，而中國的「流動人口」已發展成世界歷史上人數最多的「勞動力後備軍」。

由於國內經濟發展速度不可避免地逐漸放慢，城市和農村勞動群

眾在經濟上的窘境已經持續了幾年時間，而在千禧年末突然爆發的席捲世界的金融危機，又給中國經濟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影響。自1980年代初期，中國為了在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上謀取經濟利益，開始加入世界經濟，現在，人民共和國不得不同時也經歷世界體系中不那麼令人愉快的動盪起伏。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首先於1997年春季在泰國和韓國爆發，不久便影響到中國的沿海地區。由於出口下降、外資減少以及亞洲其他國家更便宜的商品競爭，中國經濟在1998年上半年的增長速度降到7%，隨後又進一步下降。⁴⁶ 從世界經濟來看，7%的速度不能算低，但中國經濟在前幾年的增長率是在12%到14%之間。朱鎔基和其他中國領導人曾反復強調，中國經濟最低也必須保持8%的增長率，才能減輕失業的壓力，保持社會的穩定。

因此，7%的增長率顯然太低了。中國工人階級面臨著來自三個方面的夾擊：中國國內的「市場經濟」、共產黨國家和動盪的世界經濟。他們還被剝奪了建立自己工會的自由，實際上處於毫無自我保護能力的境地，只能進行一些自發的、零散的反抗。進入1990年代後，工人的這種反抗活動迅速增加，他們在當地罷工、怠工，越來越多的失業者、面臨失業危險的工人、領不到工資的工人、拿不到退休金的老工人走上街頭舉行遊行示威。這些分散的反抗活動是否能匯成有組織的反抗共產黨統治的運動，人們還將拭目以待——實際上很難想像能發展到這一步。但是，十分清楚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最害怕的正是工人階級會對其利潤頗豐的專制政治權力構成最大的威脅。他們也許陰鬱地回想起年輕時讀到過的馬克思的預言，資本主義創造了自身的掘墓人——現代無產階級。假若馬克思這一久遠的、幾乎被人遺忘的預言未能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應驗，卻在中國——在反對一個仍然自稱代表著現代產業工人階級的利益、渴望和歷史使命的執政的共產黨鬥爭中——得到證實，那將是歷史上最大的嘲諷。

註釋

1. 其中最著名的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2. 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04。
3. 《遠東經濟評論》，1989年8月10日，頁13。
4.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93年夏季發表的報告，按照新的「購買力平價」標準來衡量，當時的中國經濟在經濟總量上居世界第三位，略低於日本，儘管與美國的差距還很大。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向國會同時提交的年度報告，中國經濟規模已接近或即將超過日本，日本經濟自從1990年起就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韋納(Tim Weiner)，〈中情局以為中國經濟逼近日本經濟〉(“CIA Says Chinese Economy Rivals Japan’s”)，《紐約時報》，1993年8月1日，A版頁6。根據不同的計算標準和變動假設，中國經濟在世界上的排名分別為第2位、第3位和第4位。
5. 鄧小平，〈關於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326。關於中共十四大的主要文件的英譯本，參見《北京周刊》，1992年10月26日–11月1日。
6. 例如，參見裴覺世，〈中國經濟修正案〉(“China Economy’s Class Act”)，《紐約時報》，1996年11月14日，頁C18；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中國預測下年度GDP增長為10.5%〉(“China Expects GDP to Expand 10.5% over Coming Year”)，《華爾街日報》，1996年12月31日，頁4。1997年，中國實際的國民生產總值為8.8%，大大低於官方的預期。
7. 布勞希利(Marcus W. Brauchili)，〈外國在華投資繼續攀升〉(“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Still Climbs”)，《華爾街日報》，1997年1月14日，頁A14。
8. 有關中國國有企業的客觀公正的評價，參見辛格(Ajit Singh)，〈計劃、市場和漸進的經濟改革〉(“The Plan, The Market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研究論文》(*UNCTAD Discussion Papers*)，第76號，1993年12月。
9.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的理論旗幟〉，《北京週刊》，1997年8月25–31日，頁10–13。
10. 例如，劉賓雁，〈江的利益，黨的損失〉，《中國焦點》，第5卷，第10期（1997年10月1日），頁1。
11. 關於克林頓訪華扼要敘述，參見莫里斯·邁斯納，〈超越對中國的老生常談〉，《洛杉磯時報》，1998年6月5日，第M1版。

12. 趙紫陽在致中共十五大的信中，呼籲對1989年民主運動重新進行評價，據說這封信為江澤民扣壓。參見劉賓雁，〈江的利益，黨的損失〉，頁1。
13. 有關毛時代與鄧時代的「社會主義」的分析，參見本書第21章。
14. 參見本書第3-4章。
15. 鄧小平1980年11月會見一個羅馬尼亞代表團時的講話。《紐約時報》，1980年12月30日，第2版。
16. 種族主義在社會生活和住房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1904年，英國殖民當局在香港實行住房隔離政策，而且使其成為法律，在「山丘地區保護條例」中，禁止中國人（不管多麼有錢）居住在「半山地區」（the Peak），即香港島中心拔地而起的美麗山丘的上半部分。
17. 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61。
18. 國民黨權對台灣的殘暴統治，導致1947年2月28日台灣人民在台北起義，起義時間持續一個星期，迅速擴大到整個台灣島。國民黨軍隊血腥地鎮壓了這次起義，數千台灣人被殺害，還有幾千人被捕。在這場事變後，台灣中產階級的領導層不復存在。參見葛超智 (George Kerr)：《被出賣的福摩薩》 (*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65)，特別是該書中的第12-16章；格克蒂克 (Ong Joktik)，〈一個福摩薩人關於福摩薩的獨立運動的觀點〉 (“A Formosan View of 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Movement”)，曼考爾 (Mark Marshall) 主編，〈今日福摩薩〉 (*Formosa Today*, New York: Praeger, 1964)，頁163-170。
19. 參見本書第20章。
20. 我在過去曾對兩岸較早時期不同的政治環境作過較詳細的敘述。參見莫里斯·邁斯納：〈福摩薩民族主義的發展〉，曼考爾主編，〈今日福摩薩〉，頁147-162。
21. 引自弗裏德曼 (Thomas L. Friedman)，〈應徵：交易者〉 (“Help Wanted: Deal Maker”)，〈紐約時報〉，1996年3月24日，第1部份，頁15。
22. 卡爾姆斯 (Jack Calmes)、克雷格·史密夫，〈克林頓在台灣問題上明確表示支持中國〉 (“Clinton Backs China on Taiwan, Loud and Clear”)，〈華爾街日報〉，1998年7月1日，A13版。
23. 聯合國發展計劃署在《中國：人類發展報告，1997》 (*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Beijing: 1998) 中，提供了關於近二十年來中國人民由於經濟發展而受益的大量的數字證明。

24. 有關中國市場經濟對環境的影響，理查德·史密斯 (Richard Smith) 曾進行了詳細和深刻的評論，參見理查德·史密斯，〈製造毀滅：資本主義的發展與中國的環境〉(“Creative Destruction”)，〈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 第222期 (1997年3-4月)，頁3-41。
25. 有關農民在1997年夏季的抗議情況，參見程木 (Cheng Mu)，〈湖北與江西農民的反抗〉(“Peasant Riots Erupt in Hubei and Jingxi”)，〈中國焦點〉(*China Focus*) 第5卷，第10期 (1997年10月1日)，頁1。
26. 有關基於第一手資料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和調查，參見陳佩華，〈工人權利就是人權〉(“Worker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中國人權論壇〉(*China Human Rights Forum*) (1997年夏季)，頁4-7。
27. 美聯社刊載的大赦國際的報告，〈威斯康星州雜誌〉(*Wisconsin State Journal*) (1998年9月4日)，頁8A。
28. 關於中國近年來迅速發展的不平等現象，參見阿齊茲·拉赫曼·汗 (Azizur Rahman Khan)、瑞斯金，〈中國裏的收入跟不平等的關係：家庭收入的構成、分配與增長〉(“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Composition,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of the Household Income, 1988-1995”)，〈中國季刊〉第154期 (1998年6月)，第221-251頁。
29. 據《華爾街日報》1993年1月13日A版，頁10報道。
30.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頁254。
31. 自1890年以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中的一個主要信念之一，是相信中國可以在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產生的社會弊端的情況下，獲得現代科學技術和工業發展的成果。與此相關的另一個信念是中國「可以利用落後為優勢」。關於對中國知識分子這種認識的深刻分析，參見王彥一 (Wang Yan-ic)，〈中國理念〉(“The Chinese Idea”)，博士論文，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歷史系，1997年。
32. 本書第24章曾敘述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
33. 例如，可參見鄧小平，〈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4年6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62-66。
34.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35. 雖然政治犯的總數是保密的，但從一個省中獲得的數字有助於說明發生

的這種變化。1959年末，黑龍江省犯人總數為97,332人，其中57,933人（約佔60%）是作為「反革命分子」而被關押。1981年，該省的犯人總數為23,685人，其中只有577人（不到3%）是「反革命分子」。《黑龍江檢察誌》（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由「人權觀察/亞洲部份」（*Human Rights Watch/Asia*），第9卷，4期（1997年4月），頁31轉載。

36. 參見本書第22章。
37. 關於1980年的選舉，參見黎安友（Andrew Nathan），《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頁193–223。關於1986年的選舉，參見莫里斯·邁斯納：《鄧小平時代》，頁360–361。
38. 關於河南新密縣民主變革的說情，參見榮靜彬（Rong Jing-ben）、崔之元（Cui Zhiyuan）等主編，《從強制到民主合作制的轉變：縣鄉兩級政治體制改革》（*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ressurized System to a Democratic System of Cooperation: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t the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s*）（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1998）。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區，許多所有制形式並不明確的農村企業，允許工人及社區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企業管理。
39. 魏京生，〈要民主還是新的獨裁？〉，《美國聯合出版物研究處》（JPRS）第73421期，頁28–30。
40. 北京市中級人民檢察院，〈對王丹的起訴書〉，（1996年10月7日）。其英譯本作為《人權觀察/亞洲部份》（第8卷第10期，1996年11月）的附錄，頁11–13。
41. 參見本書第24章。
42. 已知的因參加民主運動而被處死的工人為60人，實際人數無疑要更多。《亞洲觀察》，第4卷，第17期（1992年5月28日），頁2。
43. 例如，1994年，在北京市第二監獄關押的因參加1989年6月4日事件的犯人共104人，其中大多數被官方認定為是工人，他們的刑期最長。見《人權觀察/亞洲部份》，第6卷，第11期（1994年10月），頁7–13。
44. 合眾國際社，1992年3月25日。引自《亞洲觀察》，第4卷，第17期（1992年5月28日），頁6。
45. 根據半官方的全國婦女聯合會的統計，婦女佔國有企業勞動力總數的39%，但在1998年春季時，60%的下崗工人是女工（多數年齡超過35歲）。珍妮花·林（Jennifer Lin），〈死要面子：歧視婦女的中國經濟改革〉

（“About Face: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it Hardest against Women”），
《芝加哥論壇報》，1998年4月26日，第13部份，頁9。

46. 《華爾街日報》，1998年7月20日，頁A15。